



鳥

以文学之名

卷四十四 2024. 8

丢失词词典

皮普·威廉姆斯

阿涅斯的海滩 | T.杰斐逊·克兰

疼痛帝国 | 帕特里克·拉登·基夫

宇宙高速驾驶员 | 胡里奥·科塔萨尔





## 小 说

- 新书试读 | P.05 玛丽安娜的漫长人生 达契亚·玛拉依尼  
P.11 每个人 让 – 保罗·杜波瓦  
P.19 我不知道这该怎么念 苏万康·塔玛冯萨  
P.23 迟湖 黄昶  
P.31 丢失词典 皮普·威廉姆斯

## 非虚构

- 新书试读 | P.39 阿涅斯·瓦尔达：作为女权主义者，我们必须宽容 鲁斯·麦考密克  
P.47 150 年前，他们认为这是与中国和平共处的一种平行文明 皇甫峥嵘  
P.53 一个人得了癌症，你不应该对 ta 说什么？ 刘绍华  
P.61 本应帮人止痛，为何成为药物成瘾的始作俑者？ 帕特里克·拉登·基夫  
P.67 现实版《南方高速》，科塔萨尔最后的疯狂之旅 胡里奥·科塔萨尔、卡罗尔·邓洛普



题图为电影《玩乐时间》(1967)剧照

# 《一人公司》



这个观点由来已久，现代性的研究者乌尔里希·贝克曾经为“阶级矛盾转化为个人痛苦”作出分析：

不平等绝没有消失。不平等以社会风险的个体化的名义得到了重新界定。于是，人们逐渐从心理倾向的角度来理解社会问题：个人无能、内疚感、焦虑、冲突以及神经官能症。吊诡的是，在个体和社会之间出现了一种新的直观性，亦即危机和疾病的直接关联。社会危机以个体危机的面貌示人，这些危机再也不能（或极为间接地）以它扎根于社会领域的状况来理解。这或许可以用来说明当今心理学的复兴。个体获致取向因此而变得重要起来。我们现在就可以预测，围绕获致型社会以及社会不平等在其中不断实现（伪）正当化的各种问题不久之后就会浮现。

v

它们的共同点都是心理学的应用。我们更多地用心理学来解释我们与世界的关系，这在一定程度上也在重新塑造这个社会。以往求助于社会、团体和某个人群组织的，现在求助于个人的内心。

vi

注意到这个问题是我们身边不乏这样的转变。我们身边随时会发生很多事，或大或小，我们以往的社会观察视角会更在意这些事件之间的因果关系，逻辑，矛盾主体，或者愿意多想一步，解决问题的关键在哪里，治标或者治本……而现在当各种事情发生的时候，似乎更愿意诉诸于个体“感受”——你是否感受到了“我的感受”，“我的感受”是否被看见、被尊重、被回应……

韩炳哲在《仪式的消失》中提及在这个由“新自由主义”塑造的社会制度中，人们陷于孤立，同时又召唤“共情”。“正是在一个原子化的社会中，对共情的呼吁才变得响亮。目前的共情炒作首先由经济决定，共情被当作一种有效的生产手段。它被用来在情绪上影响和控制他人。”

在新自由主义制度下，被剥削的不仅仅是工作时间，而且是整个人。事实证明，情绪管理比理性管理更有效，后者比前者更深入地渗透到人体内。新自由主义的精神政治致力于激发肯定的情绪并充分剥削它。最终，连自由本身也被剥削殆尽。在这一点上，新自由主义的精神政治与工业现代主义的生命政治有所不同，后者的运作具有纪律强制和命令的味道。



i

一位学者说到家暴，旁观者、外人往往义愤填膺，反倒是那个不幸的被施暴者更容易原谅施暴者。学者说，原因之一是旁观者通常以道德和法律的常见社会视角来看待这种暴行，家人往往更容易得出施暴者有心理疾病的原因。学者还说，这是一个趋势，“心理学越来越多地被用来解释社会现象，我们过去用来作为标准的道德很有可能借着更有‘科学’内涵的心理学而退场，或者变得不那么重要。”这是一个观点，我们觉得值得探讨。

ii

西蒙娜·薇依在 1930 年代说到泰勒 - 福特的流水线工作体系。

该体系还将工人的地位降至分子，即把他们变成工厂中的一类原子结构。这导致工人遭到孤立。单独和工人交流，这是泰勒所提出的一个主要方法。要将他们视为单独的个体。否则，他们之间就是竞争。正是这一点使工人产生了孤独感，或许这也是现行管理制度下工厂最突出的特点。当然，这种精神上的孤独感已被六月的罢工运动所减弱。福特坦率地表示，工人们相处融洽是很好，但他们不能相处得太好，因为这样会削弱生产中不可或缺的竞争精神和好胜心。

iii

《一人公司：失业潮中的高新技术工作者》中，卡丽·莱恩引述凯瑟琳·纽曼的一个社会观察：

1980 年代的失业经理人一直在根据一种“工作并成功”的文化模式努力理解自身的职业经历，而这种模式正在数十年来不断变化的就业结构的重压下渐趋瓦解。由于深陷精英个人主义的管理文化之中，这些白领会将职业成败归因于个人能力，一旦失去工作，他们只会责怪自己。

齐格蒙特·鲍曼说：

对世界如何运转的关注，转变为对自我管理的关注。我们所忧虑和关心的，不再是世界及其栖居者的境况，而是世界中的暴行、愚蠢和不公正带来的精神不适和心理眩晕。按照最早发现并阐明这种现象的克里斯托弗·拉什的说法，这或许是“把集体性不满转化为易于治疗的个人问题”的结果。拉什给这样的“新型自恋者”取了一个令人印象深刻的名字，“心理人”(psychological men)。“心理人”只能通过个人问题的棱镜去观察、审视和评估世界状况，他们“不是被内疚而是被焦虑困扰”。在记录他们的“内在”体验时，他们“不是为了提供对现实的客观描述，而是为了吸引他人”，获得“他人的关注，赞扬或同情”，以支撑他们摇摇欲坠的自我意识。个人生活变得像市场一样好战，充满压力。鸡尾酒会“把社交活动变为社交战争”。

vii

我们并没有答案。我们只是觉得这些问题有趣。

这世界上每天都有很多变化，琢磨一下它们比重复那些流行句子要有趣得多，可能也有意义，有价值得多。

viii

布考斯基说，“我很高兴看到你也想到要守护好灵魂，这一点被很多人完全遗忘了，或被当成了某种失效的过去时代的浪漫垃圾——那时候我们似乎还没有像现在这么了解自己。但是有一点始终没变：当你在屎里面滚了太长时间，你看起来就会像屎一样。我们唯一要做的事情就是看清楚哪些东西是屎，好让自己不去里面打滚”。

ix

上面这句话或许可以作为“历史进入垃圾时间”的回应。

本期封面的鸟是橙腹拟鹂。

微博留言 @ 小鸟文学，微信公众号“小鸟与好奇心”，或写邮件到 info@aves.art

小鸟

一份新文学杂志。注意，不是文艺杂志。  
我们最大的愿望是找到最好的文学作品和作者，并呈现出来。

小鸟问答

这个栏目每月一次，回答来自读者的各种问题。  
它放在每月的第一篇，兼有告知功能。





题图为电影《玛丽安娜·乌克里亚》(1997)剧照

## 小说

# 玛丽安娜的漫长人生

达契亚·玛拉依尼 | 新书推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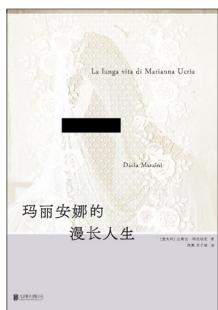
诺贝尔文学奖热门候选人  
达契亚·玛拉依尼代表作

《玛丽安娜的漫长人生》是达契亚·玛拉依尼的长篇小说代表作，首次出版于1990年，讲述了聋哑公爵夫人玛丽安娜的一生，呈现了一个被压抑的女性如何探寻自我，抵达自由。玛丽安娜出生于十八世纪的一个意大利贵族家庭，幼年受到一次惊吓后，失去了听力，且再也无法开口说话。十三岁时，父母将玛丽安娜许配给了她的舅舅皮耶罗公爵。

她生下五个孩子，逃过了瘟疫，目睹过数次死亡。她为家族贡献了自己的身体，在几十年里沉默地见证着这个家族的荣耀与败落。沉默占据了她，也给她庇护，让她得以在其中探索内心深处的真实自我。

在无声的世界里，玛丽安娜追求一种充满活力的精神生活。她经常待在图书室里看书，把自己的想法写在纸上与他人进行交流。在一次与哥哥的相聚中，玛丽安娜无意中知晓了导致自己聋哑的缘由，也揭开了这个家族最黑暗的秘密……

以下经“光尘”授权发布。



智慧按照它最普通的原则，单独发挥作用，这也会摧毁自己……我们只有凭借想象——虽然它很特别，表面上看起来很庸俗——才能把自己从彻底的怀疑论中拯救出来。因为只有通过想象的特性，我们才能艰难地进入事物最隐秘的层面……

玛丽安娜手撑着下巴在看书，腿上盖着被子，双脚互相蹭着取暖。虽然窗子关着，但寒气还是能渗进来。不知道是谁把这个硬皮笔记本留在了图书室。这是西诺雷托兄长从伦敦带过来的吗？他几个月前回来了，到巴盖里亚拜访了两次，拿着从英国带回来的礼物，但她从来没有见过这个笔记本。是不是马里亚诺的朋友把它遗落在这里了？那是一个父母都是英国人，但生于威尼斯，个子很小，有些驼背，徒步游行了半个世界的年轻人。

他之前在巴盖里亚住了一些时日，睡在玛丽安娜的房间里。他是一个不同寻常的小伙子，总是中午才起来，因为大半个晚上都在看书，早上，床单上总是滴着很多蜡油。他从图书室里拿了书总是忘记放回原位，床边的书堆得有几尺高。他吃得也很多，尤其喜欢吃西西里地方菜：炖茄子、沙丁鱼面、洋葱和牛至做成的大饼，还有茉莉味和甜葡萄味的冰激凌。

他头发乌黑，但皮肤很白，只消太阳晒一会儿，鼻子就会脱皮。他叫什么名字来着？迪克、吉尔波特，还是杰罗姆？玛丽安娜记不清了。就连马里亚诺都是叫他的姓：格拉斯，他每次叫格拉斯时，都会在“斯”上停留很长时间。

这个笔记本肯定是格拉斯的，那个来自伦敦、要去墨西拿游览的人，像他自己说的那样，这是一次求索之旅。伊诺琴不喜欢他把蜡烛放在床单上、在床上看书的习惯，不过舅父大人可以包容他，但也对他存有戒心。舅父大人小时候也学过英语，但他总是抗拒说英语，所以差不多已经忘了。

格拉斯偶尔会通过字条和玛丽安娜交流，他的字迹干净，写得很工整。到了快要离开的时候，他才发现自己和玛丽安娜喜欢看的书都一样，于是他们的交流突然变得很密切。

玛丽安娜翻着笔记本，在第一页就惊讶地怔住了，因为在下面有一段钢笔写的小字：赠给那位不说话的公爵夫人，让我喜欢的思想也进入她那浩瀚的脑子里。

不过他为什么把这个笔记本藏在图书室的书中间？格拉斯知道只有她会来看这些书，但他也知道，舅父大人时不时也会过来查看一下。这是一份藏起来的秘密礼物，在客人离开后，她才能收到这份礼物。

一个人能感知到美德的意义，这只是意味着，在看到某些品质时，会感到一种特别的满意……正是这种满意，构成了我们对一种品质的称赞和钦佩。我们不会向前一步，探究那种满意的原凶。我们判断一种品质是好的，并不是因为我们喜欢，而是因为我们觉得，喜欢的方式很特别，我们觉得那些品质很好。在我们判断美、品味、感觉时，也会出现这样的情况。我们的赞许就蕴含在它们传达给我们的直接快乐中。在这段话下面，他用绿色墨水写了一个名字：大卫·休谟，字很小。

公爵夫人不习惯用这种严格深入的方式思索，这些分析在她有些凌乱的脑子里逐渐开辟了道路。她必须反复读这段话才能慢慢地跟上这位哲学家的思路，这与她之前习惯的那些思想截然不同。

讨论理性和激情的斗争时，我们既不严格，也没有运用到哲学。理性乃是且应当是情感的奴隶，在任何情况下，理性都应该遵从激情的召唤。

这与玛丽安娜从小所接受的教育截然相反。激情难道不是个巨大的包袱吗？从这个包袱里会冒出那些需要隐藏、像箭栝一样的贪欲？而理性难道不像每个人都佩戴在身侧的一把剑，当欲望的幽灵出现时，人们就以美德的名义，拔剑砍断它的脑袋？舅父大人如果看到这本书，一定会一句话都受不了。在独立战争的那些年，他就已经说了：“世风日下，越来越让人厌恶。”并且他认为这全都怪伽利略、牛顿和笛卡尔这些人，他们企图以科学的名义改变自然，但实际上，他们想把自然放在口袋里，按照自己的方式运转，真是一群自以为是、背信弃义的疯子。

玛丽安娜突然合上笔记本，本能地把它藏进裙褶里。后来她才想起来，皮耶罗公爵昨天就已经去巴勒莫了，于是她又把本子掏出来，放到鼻子下面，闻到一股新纸和高级墨水的味道。她打开笔记本，发现本子里夹着一幅彩色画像。那是一位三十岁的男人，头上包着柔软的丝绒头巾，盖住了鬓角，脸宽宽的、很圆润，目光投向地面，就好像在说，所有知识都来源于脚下这片土地。

他的嘴唇半张着，眉毛浓密，紧锁眉头思考时，像是很痛苦的样子。他的双下巴让人联想到他是个爱吃爱喝的男人，他穿着一件花马甲，白色领子里包裹着优雅的脖子，外面穿着一件外套，上面是宽大的骨纽扣。

这幅画下面也有格拉斯小小的名字：大卫·休谟，一位朋友，一个非常不安的哲学家，其他人很难喜欢他，除非是他的朋友，我想那位不会说话的夫人也包括在这些朋友中。

这个格拉斯真的很古怪，为什么他不把笔记本直接送到她手里，而是让玛丽安娜在他

离开一个月后，在一堆和旅行相关的书籍中找到？

当我们得知，我们的思想、感情、力量之间的联系都在自己内部，只是我们脑子的机制，会产生什么样的抵触？

天哪，这位休漠先生真是大胆！这就像说上帝是“我们脑子的产物”。玛丽安娜感到一阵心慌，又把笔记本藏进裙褶里去了。类似这种想法，如果谁大声说出来的话，按照宗教裁判所神父的意思，一定会在滨海广场上的监狱前被活活烧死。

习惯会让我们产生既定的思想……玛丽安娜在父亲写的小字条里读过类似的话。虽然他是一个遵循传统的男人，但有时候，他会开这些传统的玩笑，只是为了好玩儿。他会弯起嘴角，露出一个调皮的、难以置信的笑容。

每只蚂蚁都爱自己的巢穴……会在巢里放入自己的所有，灵魂的、物质的，所有的东西都融为一体：精神的和物质的，父亲和儿子。

母亲大人看了一眼丈夫写给女儿的话，她当时吸了一下鼻烟，咳着痰，往身上倒了半瓶橙花水，想去掉烟草黏糊糊的感觉。不知道那个总是无精打采、头耷拉在肩膀上、温柔的母亲大人的脑子里在想些什么！她是不是真的悄无声息，从一扇门进来，又从另一扇门出去呢？难道她是“习惯产生的既定思想”的牺牲品？她的人生消磨在散乱的床上、沙发上，甚至深陷锦衣绸缎里，她柔软的肉体依附在鲸骨、挂钩、锁眼上，越来越懒惰。这种懒惰比井更深，她整个人好像被昏庸包裹起来，就像角豆荚里包着硬硬的、软软的、深色的籽一样。在她黑色的果皮里，母亲大人还是很甜蜜，就像角豆树里的一粒籽，永远处在家庭这个小天地里，她深爱父亲，以至于忘了自己。她的人生停了下来，一只脚还没有落下来，于是为了不让自己跌倒，她坐下来，欣赏面前这一片迷人的荒芜。

不知道母亲大人的声音是怎样的？在玛丽安娜的想象中，她的声音深沉，说话时会发出低低的颤音。如果没有听过一个人的声音，是很难爱上这个人的。父亲虽然从来都没有听到过玛丽安娜讲话，但还是深爱着她。她的舌头有一股淡淡的苦涩味道，蔓延到口腔：这是不是懊悔的味道？

如果我们把不断重复之前的东西，不经任何反思、没有任何改变和更新的行为称为习惯，我们就可以肯定一个确凿的事实：每种顺应第一印象的信仰，都是习惯的产物。

这就好像说，以前所有确信的事，现在都应该摒弃，一直都是习惯在引导我们，教导我们。习惯带来的乐趣，重复带来的福祉，这些难道就是人们思想的光辉吗？

她很想认识这位休漠先生，这个戴着深绿色头巾，双下巴，眉毛浓密，眼带笑意，穿着花马甲的先生。

伴随着记忆和感官的信念与观念，不是出于别的，而是产生于清晰、鲜活的感知，这和想象不同，在这种情况下，信仰就有一种直接印象，或者是重复记忆里的印象。

这个逻辑简直太严密、考究了！看到这样的文字，你不得不露出赞赏的微笑。这对于玛丽安娜简直是迎头一棒，因为她平日只是读一些冒险小说、爱情小说、历史故事、诗集、年鉴和童话故事。她只是全盘接受古代的思想，那些不容置疑的思想，是的，就像传统的糖醋茄子的味道。或许是因为她不停地拷问自己的命运——为什么聋哑的偏偏是她，才使得她无暇顾及别的更有深度和内涵的思考？

对一个物体存在的简单看法，和对它的信仰是截然不同的。因为这种不同之处，并不存在于我们感知的整体或者部分，它应该存在于我们感知方式的不同。

她琢磨着休漠的思想，有一种大胆的东西在推动着她默默地沉迷其中。这位莽撞的格拉斯先生，可以说是个名副其实的青年学者，开始践踏她脑中的那片草地。他一个人还不够，还带来了一位朋友：戴着奇怪头巾的大卫·休漠先生，现在，他们想要搞乱她的思想，但他们不会得逞的。

与此同时，门那边怎么会有裙子在晃动？在她没有觉察到的情况下，有人进图书室了。玛丽安娜想，还是把这个硬皮笔记本藏起来为好，但她发现已经晚了。

菲拉端着一个托盘走到面前来，托盘上有一个杯子和一把水壶，她轻轻地行了个屈膝礼，把托盘放在铺满纸的桌子上。她故意掀起厚重的裙边，想让玛丽安娜看到她穿了鞋，然后靠在门边，等着主人的指令和吩咐。

玛丽安娜注视着那张圆润、鲜活的脸，还有她苗条的身段。菲拉已经快三十岁了，却还像个小女孩。我把她送给你，她是你的了。父亲曾这么给她写道。可是谁说人可以像小狗或鸟一样被送来送去的，甚至可以被丢弃？你说的是什么傻话？舅父大人知道她这么想，肯定会这么回答她，上帝难道不是创造了贵族和贱民，马和羊吗？这不就是她对于平等问题做出的反思吗？这难道不就是从格拉斯笔记本上冒出来的火种，扰乱了哑女迟笨的脑袋吗？

她的脑子里到底有什么？难道不是其他人的头脑，其他如同星群一样的思想、意愿和

兴趣激起一点点反思吗？她只是在记忆中，不断重复着那些看起来像真实的幻影，这些幻影就像怪异的蜥蜴一样，在日常经验的阳光下，扭动着身体。

玛丽安娜回过神来看向笔记本，不准确来说，她看向拿着笔记本的手。那只手未老先衰了：指甲已经开裂，指关节凹凸不平，青筋暴起。然而这是一双十指不沾阳春水的手，一双习惯下指令的手。可她也习惯于听天由命，任凭自己被捆绑在她认定的责任与义务的锁链中。对于这双如此大胆、却又如此畏缩的手，那位戴着东方头巾的休漠先生会说什么？

玛丽安娜此刻翻着旧箱子、装油的玻璃瓶子，忽然发现了一张满是灰尘、有些掉色的画布。她把画布拿起来，用衣袖擦干净，才发现这不是别的，正是她给几个兄弟姐妹画的画像，那是在她十三岁时画的，在那个遥远的早晨，在老宅子的庭院里，图涂乙来表演木偶剧，这幅画就中断了，也正是在同一天，母亲大人让她嫁给皮耶罗舅舅。

上面的灰被擦掉之后，画布上浮现出几张明亮、已经有些褪色的脸：西诺雷托、杰拉尔多、卡尔洛菲亚梅塔和阿加塔——美极了的阿加塔，她那时的容颜简直就像一个未来的王后。

二十五年过去了，杰拉尔多因一场车祸意外身亡，他乘坐的马车撞到墙上了，身体被甩到空中，后来摔到地上，一辆马车的车轮从他的胸膛碾过。这全都是由于在马路上抢道引发的：“你们让一让，我有优先权。”“什么权，我是西班牙王族，给我记住了。”最后当他被送回家时，衣服上没有一丝血迹，只是脖子上的骨头断了。

西诺雷托如愿以偿地成了参议员。经过多年的单身生活之后，他结婚了，妻子是一位女侯爵，是个寡妇，比他大十岁，这场婚姻在家里掀起了轩然大波。可他是风塔纳萨尔萨的乌克里亚家族的继承人，他可以这么做。

这个嫂子很喜欢玛丽安娜，她根本就不管别人的闲言碎语，也没有什么偏见，会经常引用伏尔泰、塞维涅夫人的话，她的衣服都是从巴黎买来的。她还请了一位音乐老师，所有人都传言说，那是她的“男宠”。那个小伙子会说法语和英语，也会希腊语，为人风趣幽默。玛丽安娜在巴勒莫的几次舞会上见过他们在一起，那是她丈夫硬拉着她去的。她总是穿着带花边的缎袍，而那位小伙子穿着蓝色袍子，上面缝着银白色的盘扣。

西诺雷托对妻子的交往一点儿也不生气，相反，他为妻子有一位私人陪同而感到自豪。他想让别人明白，这不过是他安置到妻子身边的人，就像“十七世纪的名伶”，也就是阉伶。但这到底是不是真的，很多人都很怀疑。

菲亚梅塔已经是圣·特蕾莎的加尔默罗会修道院的正式修女了。她那一头浓密的栗色头发总是包在修女帽里面；有时她会把帽子摘下来，尤其是做菜时她的双手也变得很粗大。她已经习惯了把生的炒熟、冷的煮热的生活。她的牙齿参差不齐，但让人觉得很快乐，她也很爱笑。

阿加塔日渐憔悴，她生了太多孩子。算上活下来的和夭折的，玛丽安娜甚至都不知道她到底生了多少个。她从十二岁就开始生，到现在还没有停止。她每年都怀孕，要不是很多都胎死腹中，她现在可能都生出一个部队了。

玛丽安娜嗅到颜料的味道，她把画布移到窗户边，又用袖子擦画布，想把上面那层绿锈给擦掉。很遗憾，她那时放弃画画了，没有一个具体的原因，在她生下第一个孩子之后，她就没有再画画。可能是舅父大人责备的目光，也可能是母亲大人的一句讽刺，或者是孩子的一声啼哭。她把画笔和颜料放进父亲送给自己的漆盒子里，束之高阁。她很多年都没有再把它拿出来过，现在她的手已经生疏了。

龙胆蓝——龙胆蓝到底是什么味道？在松节油和沾满颜料的抹布的味道中，龙胆蓝的味道会冒出来，那是一种独特的味道。她闭上眼睛，感受那种味道进入自己的嘴里，在舌头上停留，留下一种很神奇的味道，像碎杏仁，像春雨，也像海风。

还有白色，差不多是亮光白，有一点儿颗粒状的白，那是一种什么样的味道？在那幅色调暗沉的画里，眼白的那种白色，可能是杰拉尔多肆无忌惮的眼睛，也可能是阿加塔雪白细嫩的手，这些被遗忘的白色，定格在这张脏脏的画布中。而现在，经过袖子的擦拭以后，画里的那些眼睛都显得很羞怯，不知不觉成了过去的见证者。

玛丽安娜画那幅画时，这栋别墅还没修建起来。对她来说，之前那栋老宅是曾祖父修建的，是打猎时用的“乡间住宅”，这几乎是一个世纪之前的事了。那时候，从宅子的花园到橄榄园，人们必须穿过一条羊肠小道。那时巴盖里亚还不是个村子，这里只有一些马厩、“石屋”和王公贵族建的小教堂，零散地住着布黛拉别墅的一些仆人，而后每年都会增加新的马厩、新的“石屋”、新的教堂，还有巴勒莫的亲戚朋友建的新别墅。

巴盖里亚诞生于一场叛变。玛丽安娜的奶奶曾这样写道，当时她决定要让这个聋哑小孙女了解一些西西里的历史。费利佩四世在位期间，不，是在他死之后，西班牙开始出现了

继承王位的斗争。因为这个国王没有儿子，在众多的侄子中，人们不知道该选谁继任王位。

奶奶的字很小歪扭的她就像那个年代的大多数女人一样是个半文盲甚至可以说，奶奶学写字，就是为了和这个聋哑小孙女交流。

当时的面包越卖越贵。丫头啊，你是不知道饥饿的感觉。为了能填饱肚子，大家都吃土，像猪一样吃糟糠、橡子，还会像你这个不懂事的女娃娃一样啃指甲。我们现在没闹饥荒，你就不要再啃指甲了！

有时，她会用两根手指打开玛丽安娜的嘴巴，盯着她的牙齿看一会儿，写道为什么不说话，你是傻子吗？你有红通通的嘴、坚固的牙齿和美丽的双唇，但你为什么一句话都不会说？

但玛丽安娜只想从奶奶那儿听故事，而朱塞帕奶奶为了不让她跑掉，开始用钢笔在小孙女的笔记本上写字。

当时的巴勒莫，在人行道上，走着走着就会被绊住。你不知道绊住你的人是在睡觉、做梦，还是正在痛苦地死去。在大主教的号召下，大家在广场中央赎罪，有人跪在玻璃上，有人鞭打自己，还有一些公主为了赎罪，在家里接待那些娼妓，用已经少得可怜的面包供养她们。

我父母逃到了菲乌梅弗雷多庄园，他们双双感染了天花，为了不让我也感染。他们让我和保姆一起回了巴勒莫，反正他们觉得，那些人能对一个小孩做什么？

当“面包起义”爆发时，我一个人在巴勒莫空荡荡的房子里。有个叫拉比洛萨的人大喊，穷人反抗富人的战争爆发了。他们开始放火烧房子。

他们到处放火，所有人的脸都被烟熏得黑黑的。拉比洛萨的脸是最黑的，他看着就像一头西班牙公牛，低着头反抗王公贵族。女仆跟我说，她特别害怕那些人会到曼苏埃托家族的房子来。事实上，他们后来来了。大胖子门卫拉索内对那些人说：“里面没有人。”“这样最好，”他们这样说，“这样也就不需要我们对着殿下脱帽敬礼了。”于是，他们戴着帽子冲上楼来，收走了所有地毯、银器、珐琅钟表、画像、衣服和书籍，然后放火把那些东西烧了，烧得一干二净。

玛丽安娜想象着房子前升起的火焰，奶奶当时一定很害怕，但她不敢问。要是奶奶真的在那时死了，那么现在和她说话的就只是个幽灵，就像在许多静谧的夜晚，母亲大人梦见的幽灵一样。

但朱塞帕奶奶就好像猜到了孙女的想法一样，大笑了几声，那是她特有的笑声，然后她继续激动地写道：

保姆吓得逃跑了。但是，我什么也不知道，当那些人踹开门，走到我床边时，我还安稳地睡在床上。“你是谁？”他们问。“我是曼苏埃托家族的朱塞帕·加尔比公主。”我这样回答。当时，我真是个比你还蠢的笨蛋。这都是他们教给我的，我要表现得很骄傲，我的身份就像银手表一样，时时戴在手上，让人们欣赏。他们看着我说：“啊，是啊，我们现在可以把公主的脑袋砍下来，带回去邀功了。”然后，我更蠢地说：“你们这些贱民，如果还不走的话，我就要叫父亲大人的士兵来了。”

所幸的是，他们开始大笑，一边说“您等着您的圣殿骑士吧”，一边笑得更大声了，后来他们就到处吐痰。直至今日，在卡萨罗的加尔比楼里，依然可以在挂毯上找到那些痕迹。

写到这里，她自己也笑了，笑得前俯后仰。她想到了孙女的聋哑，又写道：你漂亮的耳朵是有洞的啊，我试着朝里面吹气，你什么也感觉不到吗？

小孙女摇摇头，奶奶的笑容感染到她，她也笑了。然后奶奶写道：你这是没有声音的笑。你得吹气，吹，张开嘴巴，从喉咙里发出声音，像这样，啊，啊，啊……我的姑娘啊，你真是折磨人，你这样永远学不会的。

奶奶用了极大的耐心写下这些，但其实她性格很急，一点儿耐心都没有。她喜欢跑来跑去，喜欢跳舞，睡得很少，花很多时间待在厨房，看厨师做饭，有时她也会卷起袖子自己干。她喜欢和仆人聊天，让他们讲述自己的爱情故事。她会拉小提琴，吹长笛，这就是朱塞帕奶奶，她是个奇人。

但是，朱塞帕奶奶也有“但是”的时候，就像家族所有人都知道的那样，有几天她会把自己关在房子里面，谁也不见，那是非常糟糕的日子。她躺在床上，用床单盖住头，不吃不喝。等她出来时，就像喝醉了一样，让爷爷搀着。

玛丽安娜很难把这两个人放在一起，对她来说，这是两个截然不同的女人，一个是朋友，一个是敌人。在经历那些黑暗的日子时，朱塞帕奶奶变得很陌生，也有些粗暴。与此同时，她还拒绝说话或写字。如果小孙女拉她的衣袖，她会生气地抓起笔，很潦草地写道：这个哑巴哪儿来的，最好去死吧。或是：你会落得和拉比洛萨一样的下场，烦人的哑巴。以及：大家都很同情那些天生残疾的人，但我没有这种同情心。奶奶会把这些字条扔到她脸上。

此时此刻，玛丽安娜觉得很遗憾，她没有把那些充满恶意的字条保存下来。只有在奶奶去世后，她才真正明白，那两个截然不同的女人，其实就是同一个人。因为两个她都失

去了，而失去她们的感受是一样的。



达契亚·玛拉依尼

意大利最负盛名的作家之一，其作品多聚焦妇女问题，著有多部小说和戏剧，且多次获奖。其中，《惶惑的年代》（1963）获福门托国际文学奖；《伊索丽娜》（1985）获弗雷杰内国际文学奖；《玛丽安娜的漫长人生》（1990）获坎皮耶罗文学奖及该年度意大利畅销书奖；《声音》（1994）获那不勒斯文学奖和西比拉·阿莱拉莫文学奖；《黑暗》（1999）获斯特雷加文学奖。2011年，玛拉依尼入围布克国际奖决选名单。2012年后，她多次获得诺贝尔文学奖提名。

#### 新书试读

来自新近好书的试读章节，由小鸟文学编辑部从近期出版物中挑选而来。祝阅读愉快。



题图来自 [Daniel Ghio](#) on Unsplash

## 小说

# 每个人

让 - 保罗·杜波瓦 | 新书推荐

在绝望与诙谐中刻画普通人缓慢崩塌的生活，  
安抚失败人生的每一道伤口

《每个人》是当代法语文坛桂冠作家 让 - 保罗·杜波瓦的代表作。故事从主人公保罗·汉森在蒙特利尔监狱服刑开始写起，当下的监狱生活与保罗对过去生活的追忆交叉并进，直到最后才揭开他被捕入狱的原因。平静克制的叙事中蕴藏着浓烈的哀伤与孤独，但也不乏种种幽默诙谐的细节。

保罗出生在法国图卢兹。他的父亲约翰内斯·汉森是一名丹麦牧师，来自日德兰半岛上一个只有八千居民的小镇，母亲安娜就出生在图卢兹，继承了家里经营的小影院，在新浪潮时期是当地有名的“艺术和实验”类影院。保罗度过了幸福的童年，但先锋派的母亲与捍卫传统宗教信仰的父亲之间的分歧越来越难以弥合。最终，这个家庭以约翰内斯牧师只身出走加拿大而宣告终结。

父亲离开的第二年，保罗也飞往了加拿大。在一场意外变故后，他搬到了蒙特利尔生活，成为一栋公寓楼的管理员。但随着业主更替，这栋曾让他忙碌又快乐的公寓变成了一间冷漠的牢笼。过分严苛的要求、不近人情的新任业委会主席、无情的解雇、恋人的死都将保罗推向了崩溃的边缘，直到某日午后，在面对又一次苛责时，他终于情绪失控……

经“世纪文景”授权，我们摘选了本书的《深喉》一章分享给读者。



我很早就意识到，我父亲永远都不会成为一个真正的法国人，成为那些相信英国终究是堕落之地而世界其他地方无非是缺乏教养的偏远郊区的家伙当中的一员。

他难以习惯这个国家，难以理解它并接受它的风俗习惯，这令我母亲非常不快，以至于他们关于这个问题的对话动不动就会引爆其他矛盾。尽管已经在法国待了十六年，但约翰内斯汉森依然是一个不可救药的丹麦人，喜欢吃开放式三明治，一个来自北日德兰的人，说话硬邦邦的，会直勾勾盯着对方的眼睛，缺乏在我们这里很流行的那种骑墙的态度，轻易就否认明摆着的事实，背弃自己的承诺。

在这个接纳他的国度，他最喜欢的是它的语言，使用它的时候怀着无限敬意，非常注重语法的准确。除此之外，他似乎很难找到一种适合他的生活。他经常说，在他所知道的所有国家中，法国是最爱要求别人拥有共和精神和高尚品德却很少用这一标准来要求自己的国家，尤其是平等和博爱。“你们的总统和小侯爵们戴着特权王冠，比我们可怜的女王玛格丽特二世更像君主。”这是他经常喜欢在餐桌上重复的话，用来惹恼我母亲。他还很看不惯傲慢、善于撒谎和不忠行为，说我们的政府充斥着这些恶习。至于我们的政治家，他只能想象他们在腐败和妥协的浴池中尽情嬉戏的样子。

安娜随即打断了这一连串的责难：“你为什么在这里生活？你是自由的，你可以回老家呀。”我父亲从不接茬，但我们都能听到他温柔的声音：“因为我儿子在这里，而且我爱你。”

尽管我在法国出生、接受教育，但很多时候我同意父亲对我们国家的负面看法和感受。我完全理解，他这样一个在和平主义和国际主义浪潮中成长起来的身材高大的男人，在人们试图将他套进法式紧身衣时，注定会感到束手束脚。而且他儿子在这里，因此，尽管情况越来越复杂，但他对妻子的爱依然如故。

斯帕戈电影院已经恢复了最初的平静，上座率的高低和电影是否成功息息相关。《红圈》、《特丽丝塔娜》、《小巨人》、《屠夫》、《陆军野战医院》和《大迫供》，1970年的这些电影让我母亲度过了最好的年头之一。影片制作中充满了精彩的新点子，它们完美地融入了我们“艺术与实验”的小影院，看电影依然是一件高雅的事情。在高中，得益于我母亲的身份和当时在年轻人中风靡的电影热，我很快就成了学校里的红人。

至于我，所有这些电影，一部接一部，我都是在斯帕戈看的。有时，在白天，但通常是在傍晚，因为一个特殊的场合、一部特别棒的电影，母亲会组织一场家庭观影会。整个电影院就只有我们一家三口。父亲、母亲和我并排坐在一起，在大屏幕上看一部故事片。我在那里度过了一些难忘的时光，当三醋酸纤维素酯电影胶卷上的画面连续播放时，在这个巨大的放映厅里，我们一家人其乐融融。

我父亲很少跟我们提起教堂和他在那里做的事情。他的表演远不如在丹麦那样受到热烈欢迎，他在这里似乎是用礼貌的冷漠提供一种尽可能少的服务。他一如既往认真地写他的布道文，但他内心的东西似乎熄灭了。母亲从来没有去望过他的弥撒，而我，我已经很久没去听他那些陈词滥调了，这些废话跟他的同事和死对头们讲的话一样，听起来像一张在先知们的留声机上转了好几个世纪的唱片。

有些夜晚，约翰内斯会坐在面对河流的大窗户前，自斟自饮一杯，等我的母亲回家。夏天，下雨的时候，他打开百叶窗，倾听倾盆大雨的声音，感受从人行道上升起的生命湿漉漉的味道。对于这样一个有时忧郁有时看破一切的神职人员来说，人们以为他会选择巴赫或亨德尔来装点这些孤独的夜晚。事实上，在那些幻灭的时刻，我父亲听的音乐唱片毫无规律可言，好像它们是自己从架子上掉下来的：李·科尼兹，爱默生、雷克与帕玛乐队，斯坦·盖茨，柯蒂斯·梅菲尔德或齐柏林飞艇乐队在我们的马兰士牌高保真音响和与之配套的JBL环绕音响上轮番播放，这组JBL音响是我母亲亲自挑选的。在我父母那个年代，音质极为重要，而现在音质的意义已大不如前。那时，为了弥补唱片压制的缺陷、制作的拙劣和33转唱片磨损造成的杂音，人们对音响性能的追求到了令人瞠目结舌的地步。对牧师来说，这种音乐或许来自天堂，通过这些由詹姆斯·布洛·兰辛设计发明并在加利福尼亚州北岭地区组装的高音、中音和低音扬声器的神奇纽带传递。

如果约翰内斯还活在世上，如果他知道我方才生活中的不幸，或许当他读到这条关于我们家扬声器来历的无用但准确的注释时，至少会感到一丝欣慰吧！如今世界变得太复杂，无法满足于差不多、模糊的解释和泛泛的评论。我从未如此相信要力求精准、确切，要说出细节。以前你用一幅圣像就可以收买一个人的灵魂——他只想要神灵的庇佑而不求其他。而如今为了得到他的灵魂，你就得陪伴他，回答他的问题，抚慰他的焦虑，像一名匿名戒酒会上疲惫的导师那样耐心地陪在他身旁。

我父亲就是这么说的。对雨小酌一两杯后，有时他会开始给我讲他的爱好，那些“在尽善尽美的信仰中度过的”时光。有天晚上，我母亲迟迟没有踏上回家的台阶，雨水淅淅沥沥，轻轻拍打着房间的窗户。这次，在喝完第三杯后，他突然失控了，一直支撑他的信仰崩塌了。

“我不再有信仰了。

一天都没有了。哪怕偶尔的几个小时都没有了。再没有完美，什么都没有了。我们上次去斯卡恩的时候，我和老牧师聊了很久这个问题。沉默了一会儿，他对我说：‘可是约翰内斯，我也不再信了，什么都不信，除了这瓶威士忌，每次空了我就再换一瓶。信仰是脆弱的，就像魔术一样，它建立在虚无之上。一个优秀的魔术师需要什么呢？一只兔子和一顶帽子。以前这两样东西我手上都有，而今天，没有了兔子，没有了帽子，也不再有魔法了。’正是这样，孩子。什么都没有了。你和你妈妈从不来看我，对这一切也从不感兴趣，你们是对的。我真羡慕你们。我呢，为了谋生只得继续登台变我的老戏法，我只学过这个。而且没有女人，没有兔子，没有帽子。”

那晚，父亲为我们准备了干酪焗茄子。晚餐放在烤箱里温着，等我们回来享用。母亲回来时小心翼翼，避免弄出开门的声响。父亲已经睡着了。

一大早，仿佛夜里什么事都没发生过一样，帕特里克·霍顿还是踮着脚尖小心翼翼地回到了我们的牢房。之后，当我们吃完早餐回来，一个狱警从门缝里探出头。“我把你的事儿跟头儿说了。问题解决了。维修的人一小时后会过来。”的确，大约中午时分，一名维修工走进孔多，他带着一把猫舌状镘刀、一些金属屑以及一种速干涂料。为了制作混合填缝料，他用一点水稀释粉末，并加入钢屑。然后他开始填补墙壁上的所有裂缝。在他作业时，霍顿像影子一样紧紧跟在他身后，检查每一处修补的质量。“你确定混合填缝料里的金属够了吗？你这镘刀够锋利吗？要手一碰到就会被割破才行，否则一点用也没有。它要过多久才能完全变硬？24小时？妈的，没办法让它干得快点吗？”这个监狱里的维修工花了一个多小时把孔多全都刮了个遍，然后填补裂缝。他还得去拿另一袋涂料和其他金属屑。完工后，他在我们的洗手池里洗手，他看了看马桶上的盖布，随后又打量了我们一会儿。“你们中谁怕老鼠？”霍顿好半天才承认是他。男人笑着整理东西。“妈的，我猜肯定是你。”

1月是蒙特利尔一年中最冷的时候。这一周，气温降至-32°C。尽管房间内有暖气，可室温不过14°C而已，于是给我们加了几床被子。这些被子是聚丙烯纤维做的，有一股奇怪的气味，让人想起某些以旧轮胎为原料制作的再生橡胶的味道。夜里，我们和衣而卧；白天，我们套上两三件毛衣来御寒。

老鼠们或许已经冻僵在管道里，又失去了它们习惯出没的鼠洞，所以没来我们这里光顾。正因为如此，霍顿的情绪也明显有了改变。他又找回了他的英雄气概，想把很多人都劈成两半。他对我说：“今天进来的几个家伙，我认识其中一个。他可是个实打实的摩托车高手。整个蒙特利尔都找不到另一个像他这样的人了。他能为你快速改装他偷来的几辆摩托车，并且，只用一下午，就能干完你给他的活儿。不过，你记着，当你知道他想从你那里得到什么时，你就会明白这家伙不是吃素的。此外，他奸诈得很，散步的时候都不忘带一个刀片在身上。不出24小时，他就可以在这儿做出一个刀片。你瞧吧，他呀，毫无疑问，会死得很惨。我跟你说，有朝一日，这个家伙会碰到一个硬茬，把他劈成两半。就像《圣经》里面说的那样，凡动刀的，必死在刀下。”说到这里，我最喜欢的《圣经》阐释者裹上厚厚的毯子，开始巡逻，检查掺了金属屑补的那些老鼠洞是否堵严实了。

无论气温高低，给我们提供的伙食总是很差。今天，我们只有用微波炉热了热甚至没有完全解冻的褐色鸡胸肉配豌豆。在监狱里，吃饭常常是这一天最重要的时刻之一，在这些对饭菜兴味索然的时刻，我没有想到我母亲做的饭菜我不记得看过她用新鲜食材做饭，却想到我祖父斯文做的美味的斯卡恩鲽鱼配越橘，那种甜和咸在口腔中简直是绝配。

那天晚上，天冷得我无法入睡。我听到管道咔咔作响，还有人咳嗽的声音。有时候一连串的咳嗽声从另一层楼的牢房中传来。这些由于距离而变调减弱的噪声让我想起野兽的叫声和呻吟。

我的父亲刚才来过。我们瞎聊了一些事儿，他在我们的谈话中自然而然地提起Ro80汽车。他特别想知道当他在1975年底离开图卢兹之后，这辆车变成什么样子了。我知道答案，但我宁可把它烂在肚子里。我知道答案会让他伤心。薇诺娜和努克稍后加入了我们。这是一段宁静的时光。无论生与死我们都待在一起，紧紧地靠在一起，试图给彼此带来我们迫切需要的东西：一点温暖和慰藉。

监狱总伴随着令人不快的气息，消极的想法散发出一股霉味，邪念的恶臭四处泛滥，往昔的遗憾泛起阵阵酸涩。显然，自由的新鲜空气从来不会出现在这里。我们在这密不透风的环境中呼吸着，共同闻到夹杂着褐色鸡肉和阴谋的气息。最后，甚至我们的衣服、毛巾和皮肤都会被这种气味浸染，让我们永远都无法习惯。每一次，在我们放风回来的路上，当外界的空气在十字转门处戛然而止时，内外环境的过渡总是粗暴而残酷的。一阵隐隐的恶心马上提醒我们，我们正在一个不断蠕动的胃里生活和呼吸着，在很长一段时间里，

这里会把我们消化掉，然后等到时机成熟就把我们排出去，为了给它自己减减负，而不是为了还我们自由。

我十八岁拿到高中毕业文凭，这并非易事。那次考试很多人都挂了，我全凭偶然被捞了上来。1968年“五月风暴”时代的宽松已远去，当时每个学生只需提交居住地证明就可以顺利毕业，而在接下来的几年时间里，图卢兹学区大大提高了合格的要求和标准。幸亏我的体育和地理成绩优异，又在其他一些科目上耍了小聪明，最终得以把毕业证书拿给牧师看，并且听到他用安徒生的语言，以一种庄严的口吻对我说：“Min sön, jeg er stolt af dig.”意思是：“我的孩子，我为你感到自豪。”

事实上，我从来不知道自己在父亲眼里是什么样，有时我会感觉自己像个小混血儿，会不会让他后悔当初没有和一个真正的斯卡恩女人结婚，那样她就会按丹麦人的方式思考、相爱、吃喝、游泳、亲热并且生一个健壮的丹麦小孩。每个人都会称赞这孩子长得健壮、生得俊俏，而他，一睁开眼睛，就会对赞美他的亲人们说：“Smigger er som en skygge: det gor du, eller større, eller mindre.”意思是：“奉承就像影子：它不会让你变大，也不会让你变小。”

我完全能理解约翰内斯，那个不信律法的牧师，有时会在晚上看雨的时候，幻想他从未有过的孩子。

凭借外来移民的身份，我入读了大学。地理系认为教授我有关丹麦的知识正合适。如果不考虑格陵兰岛和法罗群岛这两块属地，丹麦的本土面积仅为42924平方公里，是斯堪的纳维亚半岛上最小的国家。但如果加上那两个地区，它就会一跃成为面积2210579平方公里的庞然大物。

我喜欢和旅行有关的地理，那种徒步穿行、顺坡而上时目之所及的风景；喜欢双腿的疲倦酸胀和天空的变幻无常。但我对那些图文并茂的地理书却提不起兴趣。在学校的日子归总起来便是一连串的闲逛、查缺补漏的测验、放映室里影印图片与讲义交织的无尽时光，让我在晚上回家时满心欢喜却浑身疲惫。

家里的情况还是老样子，耐心和爱意却与日俱增。隆巴尔堤岸的这间公寓里，冷漠的痕迹像一层层灰尘渐渐积攒。牧师依旧准备饭菜，而我母亲依旧晚归。大部分时候，他们的时间是错开的，各自用餐。

安娜自己挣钱自己花，提前做好规划，尽情享受眼前的世界。而约翰内斯依旧恪尽职守，默默誊写《圣经》，粉饰表面的太平，或利用手头上的东西即兴变一场小魔术，但这场魔术从来都没有帽子也没有小兔子。

1975年，我二十岁那年，一个世界终结了，我们的世界，汉森夫妇的世界，南方人和北方人的世界。他们曾做出那么多隐忍和牺牲，跨越如此长的距离走到一起，学习陌生语言，买下不可思议的汽车，用他们的方式尽情接吻——一个闭着眼另一个睁着眼，生了一个孩子却不太清楚为什么生或为谁生。他们传播上帝的教义，编排魔鬼的故事，也像保证过的那样每天打扫门前堆积的沙子，他们忍受着这一切，直到筋疲力尽，最终还是走向分手、疏远、离异、撕裂和破碎。

那一年的4月24日，临近中午时分，因为年头久了，尤其因为油价大幅调整，作为时尚坏品位牺牲品的最后一辆DS离开了雅威威尔堤岸的雪铁龙工厂。这是一场工业的、没有人落泪的葬礼。公司管理层、政府官员和媒体人或其代表，或许还有我外公外婆的在天之灵，站在生产这台车的车间里，这个以前用来生产大量有毒的次氯酸钠的地方。马尔热里夫妇坚持要出席这场葬礼，来见证被他们视作马路杀手的最后一位代表的消亡。他们丝毫没有忘记瑙鲁兹的那场车祸，更别提原谅什么了。

后来，当我回想起汉森一家的分崩离析却找不到类比的时候，就总把它和雪铁龙的破产联系在一起，和雪铁龙卖掉品牌并离开雅威威尔的情形联系在一起。

然而，我们之所以离开隆巴尔堤岸的家并从家族中消失，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一个叫杰拉德·达米亚诺的人。他是土生土长的布朗克斯人，虔诚的天主教徒，曾在放射科做过助手，后来成了附近街区的理发师。某一天，他拿着黑手党控告的教区里的好心人捐赠的25000美元，决定拍摄第二部由美国专业电影公司制作的真正的色情电影。剧情和对白写在庆祝节日用的彩纸上。故事仅仅讲述由琳达·洛夫莱斯饰演的女主角咽喉里的奇事，在她身旁围绕着一些时刻准备慷慨献身的业余男演员。电影是和一个住在甲壳虫汽车里的团队一起鼓捣出来的。那次拍摄是在迈阿密温暖的冬天里，只用了6天就完成了。1972年春天，电影在美国上映。其中一名演员哈里·里姆斯在此之前只演过莎士比亚的戏剧，而在《深喉》这部电影中，他兼任演员和灯光师。司法机关以涉嫌传播淫秽物品罪对他提起诉讼。有27个州禁止放映这部影片，纽约州将它定性为“彻头彻尾的淫秽电影”。

它引起了狂风暴雨般的轰动、铺天盖地的批评以及令人头晕目眩的道德评判。然而，能放映这部电影的影院里总是挤满了观众。上映期间，《深喉》这部小成本电影收获了超过6亿美元的票房。但要注意一点：这位理发师导演达米亚诺和这些参演的新人演员一样，为期6天的工作当时只让他们收获了这座金山上的几粒小石子而已。实际上，绝大部分票房收入以现金的形式日复一日被全国各大影院的售票窗口抽走了，是黑手党安插的收款员搜刮了导演和演员们的钱财。

不过次年，杰拉德·达米亚诺故技重施，拍摄了《琼斯小姐内心的魔鬼》，该片以7700000美元的票房成为1973年最受欢迎的影片。在32年的导演生涯中，这位传奇人物拍摄的电影作品多达48部，片名都直截了当、夺人眼球，如《屁眼开花》，让人对其剧情的风格、特点以及内容一目了然。

我之所以还记得这些细节，是因为《深喉》这部电影直到1975年8月27日才得以突破重重审查在法国上映。也因为在漫长的等待期间，关于“改革”和“艺术与实验”的争论在我家一度很激烈。

距离这部电影在美国上映已经过去了三年。这三年间，耳鼻喉科医生和影评家们对深喉的不同寻常之处大费唇舌，其中有关于导演的生平介绍，他对待天主教的弹性态度，以及像帽子里的兔子一样变没了的电影票房收入。这些趣闻随大西洋彼岸的海浪漂来，以至于《深喉》在法国的院线上映时，大家都有种似曾相识的熟悉感。

因此，1975年8月27日对我而言是一个难忘的日子，命中注定我们的生活要天翻地覆的一天，长期以来我预感的事终于公开了。

从6月开始，外交部部长米歇尔·居伊解除了进口电影到法国的禁令。我母亲，作为独立影院的经理，联系了法国阿尔法影视公司，为了在斯帕戈电影院放映这部电影。当这一消息传到隆巴尔堤岸，牧师气急败坏，露出他谨慎保守的一面，他还放出狠话：“你觉得我介意的是那个可怜的故事、可笑的阴蒂，还有那些让人给他口交一小时的家伙吗？你觉得是这些让我震惊吗？你真这么认为？不，安娜，让我恼火的，是作为牧师的妻子，你从来没有考虑过你愚蠢的选片对我的影响。如果你在你的电影院放映这部电影，我就完了，我再也没脸去教堂了。众人、报纸和我的信徒们显然会把闹出丑闻的人与那个在周日向他们吹嘘哥林多人美德的人联系起来：‘身体不是用来淫乱的，而是用来献给主的。’你知道你会把我弄得有多难堪吗？你甚至不跟我商量，不问我的意见。我是在接电话的时候碰巧发现的。一个法国阿尔法影视公司的家伙对我说：‘汉森夫人不在？您是汉森先生吗？我有个好消息要告诉您。《深喉》没问题。电影上映后就可以在你们的电影院排片。我们将通知你们具体日期和电影胶片什么时候到。我给你们提个醒，这会改变你们平时的排片风格。’如果你放这部电影，我的整个人生都会改变，安娜，我们的整个人生。”

母亲突然站起来，手掌重重地拍在桌子上。“你只是一个外省的小牧师，一个畏首畏尾的新教徒，保守，对改变视而不见。你什么也看不见，什么也不懂，你武断，爱评判，拿着你的《圣经》，就像挥舞着刑法典一样。你仍然生活在19世纪，还沉浸在你的鱼粉和被沙掩埋的半岛的故事里。你让我感到厌恶，约翰内斯·汉森。在世界各地，所有人都去看这部电影，它或许是一部烂片，但它标志着我所从事的行业的一个转折点。我不知道它意味着怎样的转折，但我肯定它是一个事件。所以我告诉你，我不会放弃这一切来平息一个不顾妻子工作的丈夫的职业焦虑。放电影，这是我的工作，约翰内斯，你明白吗。当我拿到的是一部伯格曼或塔可夫斯基的片子时，我放映的就是形而上学和神秘主义；当它是一部达米亚诺的影片时，我放映的就是口交，口交和阴蒂。如果女性喉咙里的这点小事让你陷入这样的境地，我真的很抱歉。”

说完，安娜走出房间，离开公寓时砰的一声关上了前门。

那天晚上，我意识到从某种意义上说，我和父亲就像最后一批离开装配线的DS车型的雪铁龙汽车，在我们的前后都有孤独和不确定的深渊。在这场家庭冲突中，尽管我显然赞同母亲自由主义、实用主义和现代主义的观点，但我仍立即站在了约翰内斯这一边。或许是因为某种丹麦血统内在的团结，也因为看到父亲的绝望、失去了信仰，忘记了他所有的魔法，一边等我母亲回家一边无言地看着倾盆大雨落下，这深深震动了我。他的生活与我看过的所有电影、我们周围的世界背道而驰。就像他的NSU的汪克尔发动机一样，尽管在转但并没有真正前进，油门踩得不够用力，没办法让车如脱缰之马奔驰而去。

该来的还是来了。一份专门刊载演出和即将上映的电影信息的免费出版物将斯帕戈列入了计划放映《深喉》的电影院名单。随着该片放映日期的临近，媒体上出现了越来越多的争议，一些卫道士联盟强烈批评喉咙深处这种违背自然的用途。在新教圈子里，每个人最终都把这家电影院不择手段的谋利者和汉森牧师联系在一起，人们越来越难找到一个合适的答案来回复来自社区中最保守的那一部分人的尖锐问题。

1975年8月22日，那是个星期五，我父亲被教区理事会叫去，理事会跟他解释说，因为这种非常特殊的情况会让双方都处于尴尬的境地，所以他们已经决定暂停他的职务，这一措施立竿见影。

如今，我在家里看到的是一个沉默寡言、魂不守舍的男人。

8月24日星期天上午，约翰内斯待在家里。之后他出门去加龙河河畔走走，打了几通电话，其中一通是用英语打的。他没有拨任何一个丹麦号码，想必是希望让他的家人远离所有流言蜚语，免得要跟他母亲解释他的不幸。自从周五和教区理事会谈话后，父亲就知道他被彻底扫地出门了，他再也找不到自己的教堂了。此外，如果安娜的现代主义随后又促使她在次年引进《琼斯小姐内心的魔鬼》，之后是《屁眼开花》，那他要怎么为自己回归教会和留在教会任职申辩呢？

毋庸置疑，8月25日的票全部售罄，接下来的几天和几周亦是如此。当然，这部电影没什么好深究的，当地的一个评论家在观影后认为它只是为“沉迷视觉享乐的饕餮之徒”准备的。

除了隆巴尔堤岸，父亲很少去其他地方。他似乎接受了自己的失败。我注意到他花了不少时间打电话，用英语和法语与对方交谈。他和我母亲已经不再争吵了，只有在解决一些棘手的家庭日常事务时才会彼此沟通一下。再也没有提到达米亚诺或琳达·洛夫莱斯。外界的喧嚣渐渐平息了。有一段时间，因为丈夫的事业突然一落千丈，安娜有些心烦意乱，但她很快又恢复了光彩，名利双收，而且从来没有黑帮过来搜刮她的钱财。

9月中旬的一天，晚饭时间，外面暴风雨大作，我父亲平静而洪亮的声音轻易就盖过了轰隆隆的雷声。“现在，我只想告诉你两件事：第一，教区理事会一周前召见我，确认了我不可能复职，但没有详细说明原因；第二，我找到了一份新工作，我将被任命为塞特福德矿山卫理公会教堂的主牧师。那是加拿大魁北克省的一个小城。我将于11月1日上任就职。我10月中旬就会去那里定居。在那之前，我将努力从行政意义上抹去我在这个城市和这个家里的所有痕迹——我知道你们法国人在这点上就喜欢拖拖拉拉。在这种情况下，安娜，在我看来，我们离婚在所难免。离婚条件你说了算，当然，我走之前会签署你需要的所有文件。不必多说，那个小城永远欢迎你们的到来，我对小城几乎一无所知，除了知道它是靠石棉矿发展起来的。”

用一个真正的丹麦女人的决绝，我母亲从桌边站起来，傲慢而愤怒地盯着约翰内斯·汉森的蓝眼睛，在那一刻，她一定觉得汉森是个自私自利的小牧师。“离婚文件已经准备好了。你可以在门厅柜子的抽屉里找到它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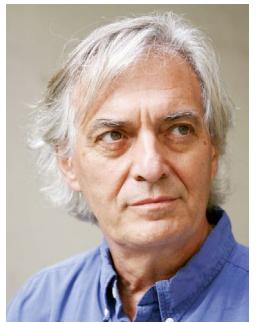
“你在想什么呢，twit？”我没想到霍顿会问我这样的问题，也没想到他会友好地用“twit”来称呼我，法语中与这个英文单词意思最接近的是“白痴”。我本来可以告诉他我正沉浸在一个多年来埋藏在我心底的世界里无法自拔，一个旧世界，在那里人们可以因为一部烂片分手，我在那里住了快二十年，那里还有我的位置，坐在桌前，在父母中间，那天晚上，我最后一次看见他俩难得坐在一起。那个世界，今天什么也没有留下。牧师就死在我眼前。安娜与一个不知名的瑞士电影出品人同居生活了很长一段时间，五年前，她死于故意过量服药。在我父亲走后不久，NSU就被偷了，并在一起交通事故中撞得稀巴烂，最终进了废旧汽车清理场。至于斯帕戈电影院，它的命运符合市场潮流的变化，渐渐萧条，之后被我母亲卖给了一个马赛的年轻人，他抛弃了“艺术与实验”的标签，把电影院变成了色情电影的乐园，更名为“草地”，之后又更名为“锯齿线”，最后变成了一家连锁眼镜店，跟这个地方的过去再无瓜葛。

这就是“白痴”在1月的这个晚上的所思所想，气温一直在下降。很快，新添的被子也嫌不够了。锅炉暖气虽然开到了最大，但设备太旧了，抵挡不了冬日的严寒。

“你看到昨天在纽约和世界上许多城市发生的事情了吗？3000个家伙同时脱掉了他们的裤子。一下子就有3000人，你信吗？这似乎是‘无裤日’的庆祝活动。发言人解释说：‘俱乐部的成员这样做是为了感受不穿裤子更自由，而且，这一天，他们仍然正常工作上班，但只穿内裤。’……开玩笑，简直是天方夜谭！想象一下，一个穿着丁字裤的狱警出现在孔多，对着你大喊：‘汉森来接待室！’或者法庭上的法官，穿着内裤对着你高谈阔论。妈的，‘无裤日’太劲爆了。我跟你说，哥们儿，我们正生活在一个疯狂的世界里。话说回来，我完全不介意他们在外面招摇。但在1月，这个气温，这成了一项要命的极限运动。”

一种阴暗而令人尴尬的东西，忧愁像一条厚厚的披肩裹住了我的肩膀。霍顿继续滔滔不绝地播报他从广播中听到的有关新文化的重大消息，但他的消息在飘进我的耳朵前就乱作一团。

我经常觉察到这种心不在焉，这种不自在。尤其在回想起所有死去的人时，我越发感到自己的孤独。现在，我是南方汉森家族的最后一人了。



让 - 保罗·杜波瓦

出生于法国图卢兹。曾是《西南报》(*Sud-Ouest*)的体育记者，后任职于《巴黎晨报》(*Matin de Paris*)和《新观察家》(*Nouvel Observateur*)杂志。2004年获得费米娜文学奖，2019年又凭借《每个人》斩获龚古尔文学奖。

**新书试读**

来自新近好书的试读章节，由小鸟文学编辑部  
从近期出版物中挑选而来。祝阅读愉快。



题图来自 [Juliane Liebermann](#) on Unsplash

## 小说

# 我不知道这该怎么念

苏万康·塔玛冯萨 | 新书推荐

十四则富有洞察力的速写，  
呈现老挝难民的日常工作和私人生活。

过气拳击手改行做美甲，却意外大受欢迎。

养鸡场里靠给鸡拔毛为生的女工，幻想着隆鼻手术能改变她平庸的生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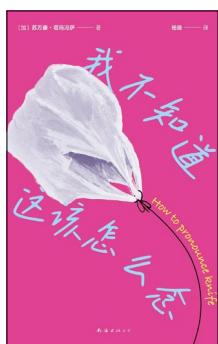
七十岁的寡妇与三十岁的邻居，陷入一段疯狂而悲伤的爱情。

认真对待每一份卑微工作的母亲，哪怕是捉虫也要捉得又快又好。

一年级小女孩面对她不会念的单词，为了父亲的尊严而与老师据理力争。

加拿大籍老挝裔女作家苏万康·塔玛冯萨首部短篇小说集《我不知道这该怎么念》由十四个短小而锐利的故事组成，聚焦身处城市底层的老挝移民，以及他们奋力为自己争取一席之地的过程。塔玛冯萨以洗练而轻盈的笔法勾勒出人们努力生活的状态，照亮他们往往不被看见的挣扎、失落、希望与爱。

经新经典文化授权，我们摘选了同名的短篇小说分享给读者。



字条被打印出来，对折两次，别在孩子胸前。这样就不会被漏掉。她母亲摘掉别针，像对待孩子带回家的其他所有字条一样，把它扔掉。如果留言重要，一通电话会打到家里。还没有来过这样的电话。

这家人住的小公寓有两间房。大一点的墙上有一幅小小的画，画中心有一道棕色的弯。那道棕色的弯代表一座桥，刷在它周围的点点红和橙代表树。这是她父亲画的，但他早已不再画画。他下班回到家，第一件事总是踢掉鞋子。然后他会递给孩子的报纸，孩子把纸页摊开在地上，铺成一个正方形，他们围坐在正方形四周吃晚饭。

晚饭，就是卷心菜和猪小肠。肉贩既不把这玩意儿扔掉，也不摆出来贱卖，于是孩子的母亲从他那儿成袋成袋地买来冻进冰箱。它们有那么多的做法：跟姜和面条一起做成汤，在炭火上炙烤，和鲜时蔬一起慢炖，还有孩子最喜欢的一加柠檬草和盐进烤箱烤。她把这些食物带去学校的时候，其他孩子会因为那股味嘲笑她。她还口说：“就算往你们脸上招呼五百磅好东西，你们也不识货。”

他们坐下来吃晚餐的时候，孩子想到她母亲扔掉的那些字条，想到拿给她父亲一张。上周有好多，也许有重要的事。她听着父亲担忧他的薪水、他的朋友们，担忧他们如何在这个新国家谋生。他说他的朋友们，在老挝受过教育又有优越工作，如今却做着捉虫的活计，或者受满脸雀斑的小年轻支使。他们不得不从头来过，仿佛以前过的日子不算数。

孩子站起来，从垃圾桶里找到那张字条，拿给她父亲。

他摆手拒绝。“晚点儿。”这话是用老挝语说的。接着，仿佛想起了什么重要的事，他又加上一句：“别说老挝语，别告诉任何人你是老挝人。告诉别人你是从哪儿来的没好处。”孩子看了看她父亲前胸正中央，T恤衫上，四个字母并排而立：LAOS[1]。

几天后，教室里有些骚动。女孩们来的时候全都是浓淡各异的一身粉，男孩们身穿深色西装还扎着小领结。蔡小姐，一年级老师，则穿了印着点点小白花的紫色连衣裙和小跟鞋。孩子低头看看自己的绿色运动服。那绿是深绿，像西蓝花，膝盖处的布料要浅几个色度，就连她站直的时候也保持着原来的形状。在这满眼亮闪闪的粉色、搭配的手包、黑领结、笔挺的衣领中，她看出自己和别人不一样。

蔡小姐一如既往地扫视教室，检查是否有什么格格不入的，她注意到孩子的那一身绿，瞪大了眼睛。她跑过来，说：“乔伊，我们让你带回家的字条，你给你父母看过了吗？”

“没。”她撒谎道，眼睛盯着地面，她的蓝色鞋子刚好嵌在一块小地砖的方形空间里。她不想撒谎，但没必要让她的父母难堪。这一天按计划进行。在班级合照中，孩子坐得略微靠边，写有年级和年份的牌子摆在她前面。虽然牌子总是位于这些照片的正中央，但摄影师不得不做点什么挡住孩子鞋上的泥。牌子上方，她露出了微笑。

放学后母亲来接她，问她为什么别的孩子全都是这副盛装打扮，孩子没有告诉她。她撒了个谎，是用老挝语说的：“我不知道。瞧瞧他们，一个个花里胡哨的。只不过是寻常的一天。”

孩子带回家一本书，是专门给她自己练习阅读的。这本书里有一些图片和几个单词，图片用来解释单词是怎么一回事，但有这么一个单词没配图片，这一页上只有它自己。当她一一发出每个字母的读音，这单词听起来什么也不像。她不知道该怎么念。

晚饭后，他们三个一起挨坐在光秃秃的地面上看电视。孩子知道，从后面看的话，她就像她父亲。头发短短的理成碗形，双肩耷拉着，脊梁弯得好像扛着什么重负，好像她明白什么叫出了一天苦力。

不一会儿，电视图像变成了彩虹色的竖条，她父母很快就要上床睡觉了。大多数晚上，孩子都会跟去，但今晚那个不认识的词让她心烦意乱，她想认识它。她翻开书，开始寻找那个词，那个不像她听过的任何发音的词。

那个词。

这是她父亲睡觉之前最后的机会。他是他们家唯一会认字的。她把书拿给他，指指那个词，问他是什么。他俯身凑近那个词，念道：“卡——耐——夫 (Kah-nnn-eye-ffff)。是‘卡耐夫’ (Kahneyff)。”对他来说就是这样，应该是这个音。

第二天，蔡小姐让全班集合，围坐在教室前部的绿地毯上。她想找人大声朗读的时候

就会这么做。有时会有学生自告奋勇，有时她会点一个人，不过这一天，蔡小姐环视四周，发现了孩子。

“乔伊，你还没读过。不如拿出你的书来给我们读读。”

孩子开始朗读，一切进展得还算顺利，直到读到那个词。它只有五个字母，但就算二十个也没什么两样。她照她父亲告诉她的读了出来，但她知道读错了，因为蔡小姐不肯翻页。她指指那个词，敲敲书页，仿佛这样就能让正确的读音溅出。但孩子不知道该怎么发音。敲。敲。敲。终于，班上一个黄发女孩喊道：“是 knife！k 不发音。”[2] 然后她翻了个白眼，仿佛世上再没有比这更容易知道的事了。

这个女孩有一双蓝眼睛，鼻子周围长着点点雀斑。放学后总能在停车场里看见女孩的母亲坐在一部黑亮的大轿车里按喇叭，车身上一个 V 和一个 W 套在圆圈里，彼此相连。她母亲有一件黑色毛皮大衣，踩着高跟鞋的模样仿佛每天都是合影的日子。女孩像班上其他所有人一样，读得洪亮、清晰，拿得到奖。孩子是唯一还没拿过奖的。就在这一天，蔡小姐往口袋里掖了一只红色悠悠球。要是孩子知道那个词是什么，那只红色悠悠球本该是她的，而现在，它要被继续锁在蔡小姐办公桌的顶层抽屉里。

那天晚上孩子晚饭时一直望着她父亲，望着他是怎样用筷子一粒不掉地夹起每个米粒。他是怎样把碗里的东西吃得一干二净。他看起来是怎样瘦小而干瘪。

孩子没有告诉他 knife 中的 k 不发音。没有告诉他去校长办公室，去听人讲规则，讲事情如何本就如此。只是个字母而已，他们告诉她。但要不是那个单独的字母孤零零地立在前面，她也不会来到这间办公室。她没有说自己是怎样咬定字母 k 发音的，它不可能不发音。她一次次地争辩：“它在前面！第一个！它应该有声音！”然后她尖叫起来，好像他们夺走了什么重要的东西。她始终没有放弃她父亲念的，那其中的第一个音。而他们读了一辈子书，受了一辈子良好教育，却没有一个能解释这件事。

她一面看她父亲吃晚饭，一面想着其他他不知道的事。她只能靠自己去发现的事。她想告诉她父亲，有些字母虽然在那儿，但我们不读，不过她断定现在不是说这种事的时候。所以，她只告诉她父亲自己赢了件东西。

有天快放学的时候，蔡小姐在门口等她。她让孩子跟她到办公桌前，打开顶层抽屉的锁，拉出那只红色天鹅绒口袋。挑一个。她说。孩子伸进手去，抓住她的手指碰到的第一样东西。那是一副拼图，拼图上是一架天空中的飞机。

她给她父亲看奖品的时候，他很高兴，因为某种程度上，那也是他赢得的。他们拿起奖品，它所有小小的碎块，开始拼成四边，蓝天，其他碎块，中央。后来，他们填充出完整的画面。

[1] 意为老挝。

[2] 根据英语发音规则，以字母组合 kn 开头的单词词首的 k 不发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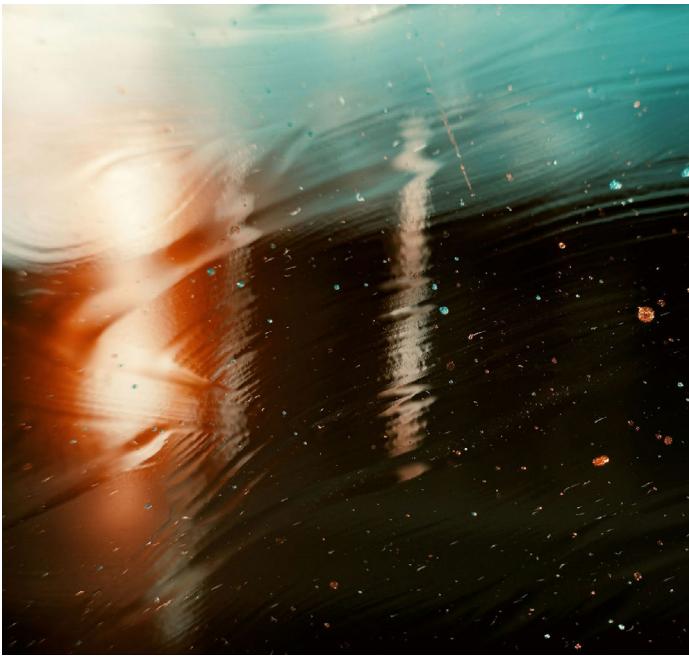


苏万康·塔玛冯萨

加拿大籍老挝裔女作家。1978 年出生于泰国廊开的老挝难民营，在加拿大长大并接受教育，学习英文。冲突与多元的成长背景成为她创作的养分，促使她寻找并捕捉属于自己的故事。她著有诗集《小争论》(Small Arguments)、《找到》(Found)、《光》(Light)。她的第一部短篇小说集《我不知道这该怎么念》于 2020 年 11 月 9 日获加拿大最高文学吉勒奖。

#### 新书试读

来自新近好书的试读章节，由小鸟文学编辑部从近期出版物中挑选而来。祝阅读愉快。



题图来自 [Jr Korpa](#) ón Unsplash

小说

## 迟湖

黄昶 | 新书推荐

“一切都太迟了，而且即便你发现了又怎么样呢，  
你走不出去。”

《迟湖》是 00 后写作者黄昶的第一部短篇小说集。

在湖中找一个寻不到的人，在洛阳村中遇见洛阳，在夜半呼唤一条龙，在台风天追踪无雨的台风眼，在棋局中找生命的疑问，在迷途中重构一个过去的故事，在美梦星寻找另一个现实的家……

在一个个似真亦幻的世界中，他总在找寻那个不见的人、遗失的梦。

经“艺文志 eons”授权，我们摘选了同名短篇故事，分享给读者。



我阿爷生病那阵，我正待业在家，从我家打车到市人医要花三十五块，我骑单车去，到路口再拎两袋水果，我妈每天给的一百五花销，我能省下一百到口袋里，所谓失业即就业。

私底下问过医生，我阿爷当时情况已经明朗：前几年患的心梗，吃抗凝药勉强给疏通了，只是又有血管变薄的后遗，现在头顶上的血管已如蝉翼，停药继续心梗，不停药就要脑出血。医生说，能做的治疗我们都会做。我懂他意思，对他说，我阿爷小时候浸过水，体弱，

长一岁靠的是一岁的毅力，很不容易。他拍拍我的肩膀，转身离开。我也就回病房去。

见到阿爷还在睡，只敢轻手轻脚地进去。其实他清醒也与睡着无甚差异，据说是管控言语的神经受脑血管挤压过强，完整的话已经说不出来，有时能咿咿呀呀地说上几个词，也是零碎得难以向句子拼凑。那双眼睛却十足有神，瞪大了，多数还携一些泪水，看上去比常人更要精神些。我看不得久，每十五分钟就要到阳台关上门抽一支烟，等听得里面有声响再推门进去。

到阳台上，我二爷爷正面向我，一只手扶着烟纸，另一只从栏杆上摆放着的盐巴袋子里抓出烟丝来卷。见到我也不说话，仍是扶着费力地卷动，仿佛手上拿着厚铁皮。

我阿爷在屋头排第三，我管他的两个哥哥叫大爷爷和二爷爷，还有一位排老四的小爷爷，从最大到最小，中间落差近二十岁。我二爷爷是这样的，听说以前当过生产队的小干部，本来爱笑，但为能撑住场面，苦练成了一张严肃的脸。

我用两只眼睛盯住二爷爷手上的烟卷，他留意到了，卷完就递给我。我接过来点上，深吸一口，这种自家粗制的烟丝，烟雾又辣又沉，兜到肺里再甩出来，眼眶里早已挂上一层的泪水。我到阳台来就是为了这支烟，仿佛在里头积压的那些不能言说的事物也能随着雾气被一并带出来。这时二爷爷也给自己卷好了一支，我替他点上，我们寻常就是这样，并排站五分钟，中间不说话。

等他抽完了烟，我问他，今天这么早过来，肉都卖完了没。他挤挤嘴唇，说句，今天猪场东家做寿，找不到地方进货，就不卖了。我听完，一时也想不到答复的，二爷爷九十年代初就在城北市场包下一格档口来，卖猪肉，我家算是老主顾。据我妈所说，我二爷爷对顾客永远是冷脸，哪怕在时常帮衬及亲戚身份的双重关系下，仍然不打折扣，况且仅仅对人僵硬，开档时间却灵活至极，哪天不想开就不开，最后总结：早晚要拾档走人。我爸每听到这，就咳嗽两声，把话题支开，过段时间又说，老婆，都是一家人，能到他处买，就别益别人了。

有阵凉风穿过我裹了裹身子，看到他穿得比我要单薄，便对他说二爷爷这两天突然冷了，你穿得少，要不进去坐会儿，或者回家歇歇，这里我看着就行。他听完似乎有些不乐意，把眉毛胡子一拧，说是用不着，你们年轻人不懂春捂秋寒，一味穿多，对身体不好的。

我讨了个没趣，本不想再开口，但又想从他的盐巴袋子里取烟来抽，怕他说我空口吃白食，就问他，最近还有钓鱼吗？

我听说他从当干部往前就爱钓鱼，卖猪肉后不开档的日子也是钓鱼去。我二奶奶的说法是也就个爱钓，钓几十年，一条鱼拿不回家，要么就是没那个水平，要么就是有第二头家。显然是玩笑话，二爷爷听完不乐，也不生气，就那样坐着，谁也不看，第二天照例拿上鱼竿钓鱼去。

他告诉我，你阿爷生病后就少了，但也不是不钓，通常是夜钓。我说夜钓这事有说法，讲究个技巧，晚上鱼也要睡觉，打窝也不来吃了，戴个头灯，开就惊鱼，不开就看不清，懂得夜钓的都是师傅。他听我夸他，可能也乐，但是嘴上不笑，问我今晚要不要和他一起去钓鱼。我想了想，说我得看着阿爷，有时候要换纸尿裤，请的护工力气小，没我管用。他说这事情好办，我给杨方打电话，叫他先过来看一晚。杨方是我堂弟，重点大学毕业，今年刚入职公务员，第二天还要上班。我这堂弟和我二爷爷几乎是一个性格，不苟言笑，谁要亲近他，就说谁有意来巴结，我在他那碰过不少壁。我告诉二爷爷，最近都在失眠，不去钓鱼绝对是可惜，晚上有我弟看着我放心，饭后随时可以出发。

夜晚，我同杨方坐在病房里，大约有一个半小时，除开寒暄那两句，没说话。

我只觉坐着肩膀直发沉，杨方也无所事事，看着钟表发愣，中间我阿爷翻了几次身子，他想帮忙，我都让他坐下，说来我就可以。眼看是等不到二爷爷的电话，似乎要爽约，我在脑中打草稿，想着用什么理由将杨方支回去合适。这时候楼下响起一阵急促的哔哔声，声音一截截的，像是患了肺病。我听出来是二爷爷那辆老摩托，于是向杨方招招手，下楼去了。

我迎着二爷爷的远光车灯走向他，他认出我也不关，只由我一步步踱过来上车。我扶到他的车后座坐下，感觉不对，一摸裤腿，是蹭了一裤子的猪油。我问他，这位置平常是猪坐还是人坐。他说都有，猪坐得多些。还说年轻人不要娇气，等下钓鱼，始终要沾上泥巴，结果都一样的。

我不与他争辩，只问他具体要到哪里钓鱼。他说是迟湖。

我从未听过这地方，便问他是否是新规划出的水域。他说，一直都有，从我和你几个爷爷小时候就有了，只是地方偏僻，加上旁边几个山峰围住，没什么人知道。我向他问清了方位，取来地图看，果然找到个米粒大的蓝点，落在峰群中间。只是没有任何标注，迟湖是否为真名也说不清楚，或许有别人知道，叫的却是另外一个名字。

二爷爷把油门拧得吱吱作响，车速非常年轻，小半个钟头，就驶出了城郊。两侧由水田向野地转变，蛙声蟋蟀声也逐步紧密，回声渐渐朦胧，想来是走入山间。夜雾浓得惊人，仿佛四周都是路。

停车后，我用脚撑住地，有如从梦中醒来。他的车灯呈柱状，打碎了一片视野，前方什么都看不见。我走上前将他的引擎拧上，灯熄灭了，星光漫落下来，周遭景物方才回归：前方的确是湖，星月映在湖面上，波动着，频频地闪出斑纹，两侧一棵树也没有，我们在山谷里，在湖边，整个世界就像碎裂的宝石，迟湖像飞溅到桌底的寻不见的一块，安静沉稳地发着亮。

我还在发愣，二爷爷把鱼竿扔过来，是自制的短杆，看着很有些年头。我走到湖边舀上一些水，熟练地和弄鱼饵，理钩，抛竿，一气呵成。本意是在二爷爷面前展露，但没想到早在我弄完以前，他就已经提着竿坐在湖边了。

我有些置气，想着要在上鱼数目上压他一头，如果真同我二奶奶所说，他今晚未必能上成一条。我仍穿着早上那件薄风衣，手指一阵阵地打颤，竿子也随着发抖，无怪枯坐了近两个小时，一条鱼也未上。我索性将鱼竿支到地面，掏出烟盒来点烟。先给自己点上，随后到二爷爷面前派发。等我走到他跟前，才发现，他的钓桶里已经盛了十数条鱼，清一色的非洲鲫，大的眼看有两三斤。

他只盯着湖面，两眼像失了焦，头发上沾有几层雾水，显得花白，仿佛现出老态。只等我将香烟递到他眼前，他才晃晃脑袋接过。点上后，我问他，二爷爷，是不是带了我来容易上鱼，我那边一条鱼不上，原来全被我赶这边来了。他说，你的手把水波搞浑了，你上来更多。我说，那怎么一条鱼也不往家里带呢，是不是真有小家，太能藏了。

我是当笑话讲的，自认为玩笑的神态也做到位了，可惜他不笑。我站着没趣，抽完了烟，就回到钓竿旁侧，直到天蒙蒙亮，桶里才多出零星几条小鱼。

我没了兴致，闲得慌，起身四处晃荡，想着天再亮一些就唤他离去。从远些看二爷爷，好似立在湖边的雕像，睁着眼睛一动不动。等有鱼咬了钩，又如一架精准的机器，连贯地抬手，扯竿，收鱼，摘钩，一连串的动作毫不停顿，精确有力。

太阳露头，我走上前去，看见他头上的雾水消去一些，佝偻着腰，老态却是依然。我想催他走人，不料是他先开口。

“你们读过大学的，和我们是不一样。”

“没有没有，读了个破学校，现在出来连工作都难找。”

“别扮懵，读过大学的，多少有点抱负，苦力活不愿意干，只想坐办公室。”

“真没扮，我读什么大学你还不清楚。”

“听说你们那个专业，出来有很多人考警局的是不是？”

“有，我有两个同学就是，不好考，考了几年，今年才考上的。”

“咱们市的吗？”

“正正咱们县。”

“熟吗？”

“熟，上学时候隔三差五拿我饭卡打饭。”

“帮我找个人，姓胡。”

“二爷爷，胡算大姓，一找一箩筐。”

“胡宗彪，戴眼镜，是大学生。”

“大学生啊，得有二十好几吧？”

“我们那会儿的大学生，比我小三岁。”

“你咋不找杨方帮你问问啊，他不也是系统里面的吗？”

“他不顶使，我用不上他，那个眼镜是这样的……”

他伸出手来向我比划，我大概算知道了，方形，金丝边儿，那个年代估计少见。我应下他，心里盘算着怎么和同学开口。自我失业，脸上挂不住，没想和他们多联系，他们似乎懂事，知道我不愿，也不太主动和我说话。

看得天完全亮了，二爷爷站起来，用力甩了甩鱼竿，竿头敲击水面，荡漾起连串的波纹，愈荡愈长，直指湖心，好似向水中的鱼儿通告自己将要离去。随后他提起钓桶，走到湖边，倾倒下去，里头的鱼儿滞了一夜，同无生命的沙石似的落去，沉下去十几秒才懂得摇动尾巴，因没见他用打氧机，初初还以为都已死掉。我不再受惊于鱼群的数量，转而对他的行为讶异。我问他，二爷爷，你每次钓完鱼都放生吗。他不朝向我，对着湖面点点头。

我不再说话，直到他做完了一切，沾沾湖水洗净手上的泥巴，我发现，他又恢复了年轻的神态，跨在摩托座椅上，腰也立直了起来。

连着好几日，我在入睡前都会想起夜钓的那片迟湖。

不是魂牵梦萦的那种想，是心里不安分而怔怔的那种想。我总想再到迟湖去，又预料到我即便再去几十次，也未必能钓到多少鱼，在迟湖，钓鱼的乐趣基本归零，况且像我二爷爷，丰收了也要放生的。我不知道自己确切想要什么，但是始终被念头牵绊着。我尝试对着地图，自行驾车到迟湖去，可每每到了那片山区，就自然地迷失方向。眼看四周都是路，却等于没有路。

我想叫二爷爷再带我去一趟，我真觉得在那里丢了东西，亟需寻回。可又不好意思开口，他叫我问的人我问了，不仅问了同学，还支使他们问了身边的同事和一些领导，可得到的答案十分统一：胡宗彪，六七十年代大学生，戴眼镜——查无此人。

我愈发不敢面对这位二爷爷，怕他认为我不出力，更怕他觉得我没用。只好躲着，但每日还需去照看阿爷。好在我摸清了他出动的规律，有益于避开他。他早上卖完猪肉会过来，我就躲到医院饭堂去，事罢也打两份饭上来，一份给护工，一份留给自己，那时也正好到饭点。

随着我阿爷的身体一天天枯萎下去，我对迟湖的念想也逐步凋亡。我清晰地感觉到阿爷迅速衰老，肌肉像是被精细的利刀剥去，剩了一层皮肤附在骨头近侧。有天他竟向我睁大了眼睛呼唤，我走到他跟前，他将我的手抓到他嘴边，奋力地蹭他的胡须。我说，干净的，刮干净的，前几天才刮完。说罢才想起来，初住院时是一天一刮，不想他的养分已然贫瘠。我感到悲伤，想落下两滴泪来，看着面前那双已然汪洋的眼珠子，唯有忍住。我对阿爷说，我到外面抽根烟，前段时间去欢喜酒，拿了包好的，我不抽完，给你留着的，等你好，全给你上缴。

走到阳台，我看那个盐巴袋子仍在，伸手到里面掏出几张烟纸来，轻轻地盘弄，可是纸张上浸满了发着腥气的猪油，怎么也使不上劲。我只好也同二爷爷一样勉力地搓，才将烟纸分开。卷上了，还没点着，我就觉得整个肺部都是苦楚，眼泪不知有没有掉，短而细地呜咽了两声才好。

我仍打算抽那支烟，但听见里头我阿爷高声叫起来，连忙推门进去。他姿势与我出去前一致，对着天花板干瞪眼。我走到他跟前，他的喊声一句比一句清晰，可是依然不成句子。他喊道：手，抓住，眼镜，抓住，抽筋，手。

我上前揉松他的肩膀对他说话他似乎好了些，身体不再发紧。我问他是不是想来喝水，他没有反应，估计就是了。我将枕头嵌到他的腰际，摇动床脚那只摇杆，他像挺起胸膛似的缓缓升高，嘴巴又张动起来，只是变得沉郁，他说，手，眼镜，手。

喂阿爷喝完水后，他好似困了，闭了闭眼皮。

我又将床摇低，取下枕头，他立刻就睡着了。我在椅子上坐了一会，天很快亮了。二爷爷到来之前，我为他卷好一支烟，也给自己卷了一支。他进门时，我将烟递给他，邀他到阳台去。我说，阿爷刚睡着。

关上门，我告诉他，我问了许多同学，可得到的结果都是查无此人。我说，你找的这个人，真像个谜，不是全知全能的，不可能猜出一个没有谜底的谜语。他好像不出奇，但有点生气，对我说，你们后生仔就喜欢扯这些没头没脑的，我叫你去找，你帮我找就是了，找不到我也不说你，你跟我说这些没用的。我说，我得确保你没有消遣我，你得确保真的有这么一个人存在。

他说，我跟他认识，认识了几十年，怎么个不存在法。我说，我没有质疑你，但我得确证，你们几十年前就认识了，现在怎么不认识了。

他不说话，拿出塑料外壳的滚轮打火机来点烟，那个滚轮上也全是油，擦了许多下，一点点火星子都不冒。我凑上前去帮他点着，他吸了一口，朝我点点头。我说，这段时间还去迟湖不，你带我去夜钓，我还帮你找人。

他不作声，应该算答应了。当晚我在医院里等他，给护工塞了点钱，告知今天可能需要晚点下班。晚饭后不久，那段潦草的哔声又在楼下响起。我这次聪明了些，从侧边绕过去，避开了他的远灯。他感觉到有人上车，也不顾是谁，就径直开走，势头依然迅猛。开过近郊，我有意保持清醒，想认清道路，只是无论我怎么看，驶过的路口都依然是同一个，我们只是不停变换方向，选择不同的分岔，随后又回到路的中心。

到了迟湖，我不敢抢先，只等二爷爷将渔具一样样摆放出来，我才学着他的行动操作。我这才看清他的动作来，他进行得相当缓慢，但看得出经过了无数遍的简化，效率很高。他的鱼钩落水前，有用竿头轻柔地摩挲湖面，仿佛又在通报。我想要学他的做法，也钓上一些鱼来，怎知他的每一步都不似眼看的简单，要做得精巧相当复杂。我留意着他的脊背，从下车起就由直转曲，等到浮标升起来，他的头顶又笼起白雾，腰也已经完全地弯下去了。

上次来时，怕惊了鱼，不敢同他说话，此时想到他的志向未必就在鱼，便开口问，二爷爷，钓鱼能说话吗？

“可以说，就怕你那块的鱼不敢过来咬钩。”

“那没事，反正我认真钓也钓不上多少，”我说，“先前还怕耽误你钓鱼，后来发现你钓了鱼也不要，就不怕了。”

“带不走的，要来干啥？”

“带走一两条也好啊，况且你那车，猪都能拉两头，鱼不能拉？”

“不是这个意思，有些东西吧，你只是借过来用一下，总归是欠了别人的，到时候还是要还的……”他说得很慢，“你小孩子，也不用想这些。”

“你现在是在借还是在还？”

“我也不知道，”他更慢了，“你和你阿爷他们一样的，什么都要问到底，总有点要当学生的意思。”

“我阿爷也爱问吗？”

“问，什么不问，我后生的时候和你大爷爷带他来这里玩，他扎到水里还要问，什么时候找个二嫂过来，我嫌他烦，闹他，把他的头按下去，他嘴还不停，咕噜咕噜，吐出一圈圈泡泡来。”

“我爷爷会水啊？他说他小时候还被淹过，然后身体就差了。”

“就在这淹的，还好给救上来了。”

“你救的吗，还是大爷爷？”

“都不是。”

我问他，那是谁呢，他没有回答，直到天亮，我们都没有再说话。这晚我竟离奇地丰收，而他却仅仅钓上来几条。我提着桶问他，需不需要放生。他说不用，你拿回家让你妈整点鱼汤带去给你阿爷补补，你不欠谁。

我有些地方听不懂，但也不想问他，随他的车到城北市场，买了一块豆腐回家混着鱼煮了。那鱼肉鲜嫩至极，我妈说，真替你二奶奶可惜，任由他钓了几十年的鱼，半口这样的汤都没喝过。拿到医院去，打算喂阿爷喝下。我说，阿爷喝点，甜得很，和放了糖没差，迟湖钓的，迟湖，二爷爷说你们以前经常去的。我阿爷其实能吃些流食，但将汤端到他嘴边，他却鼓大了眼睛，一口也不肯喝。等汤几近凉透，我拿给护工，他一口气全喝完了，骨头也不多剩下。

那天夜里从医院回去，路过河边，对岸燃起烟花来。我停下来观看烟花，不知觉自己错过了一个红绿灯。想着无论如何是个等，干脆抬头再看一响，这时有人拍我肩膀，我转过去看，是杨方。我其实有些佩服他，如果是我先见到他，我一定不叫。杨方问我，干嘛呢。我说，路过，对面放烟花。杨方说，哦。然后我们并肩站着，看了六响。我说，你爷爷跟你奶奶关系好吗？杨方说，不知道怎么说，不太吵架。我说，可能趁你没在家的时候吵。杨方说，应该不会，我奶奶说他们俩是好朋友。我觉得这个说法有点怪异，但是没多想，忽然一束火光升到河面上，迸发出耀眼的光芒来，一束绿色，两束红色，最后变化成无数颗扎眼的金色星星，等烟花落完了，声音才传过来，险些将我们震倒。我们看完这个，互相道了别，各自回家去了。

正如我答应二爷爷的，胡宗彪，那位戴眼镜的大学生还在找，可是依旧得到了许多同样的答复。同学跟我说，我交代的事，他肯定不闲着，做了些功课，那时候的大学生，能到我们这边来，肯定是来当干部的，当干部总得用实名吧。我没听懂，问他，那干什么不用实名。他说，交朋友不用实名，而且这一虚一实来回转，谁虚谁实很不好说。

除非找人，我和家里也在置备白事用品，对此我还和我妈闹了阵不愉快，我觉得人还在就准备，不失为一种诅咒。她说我还不懂，这事情一塌下来，就打得人手忙脚乱。

整屋人都淹没在浓稠的空气里，实在难以喘息。于是迟湖还是会去，甚至还要比往常勤些，这片湖水一滴滴地分解为我们赖以生存的氧气，我和二爷爷心照不宣。

半夜，有鱼咬钩。我的鱼竿愈发熟手，已经知道这是一条多么小的鱼，便不想处理，想必它能够自己挣脱。

我到二爷爷旁边派烟，看出他今晚有要说话的意思。

“二爷爷，迟湖真的叫迟湖吗？”

“不然叫什么？”

“不名湖，我查了县志，里头说叫不名湖，”我不想下他面子，“我不知道是不是真的，所以来问下你。”

“迟湖是别人告诉我的，他也有解释，不知道哪个是真的。”

“怎么解释的？”

“他说，这个湖，四面被高山包围，想走吧，走不出去，什么都不做吧，就只能慢慢地下沉，最后会蜷缩成很小很小的一片水池，甚至会变成一滴眼泪，”他吸了口烟，“等你发现的时候，一切都太迟了，而且即便你发现了又怎么样呢，你走不出去。”

“所以叫迟湖？”

“所以叫迟湖。”

我听完觉得难受，背脊直直地发凉，胸口又闷着，一冷一热淬着，仿佛要裂开。他蹲下来，用大拇指在岸边的湿土上划了一道，我留意到在这一道的上方，蔓延着千万道深浅不一的划痕，与荡漾的水波相似。

“二爷爷，这些都是你划的吗？”

“都是我，划了好多年了。”

“所以湖水真的有在下沉？”

“真的有，他很聪明，一眼就看到几十年后了。”

“那他现在呢？还叫胡宗彪吗？”

“应该还叫，但是我们找不着他。”

“就一直这样找下去？”

“那能咋办，能找就多找找呗。”

他说完，踩进湖水里，他的身形忽高忽低，我猜是湖水忽深忽浅。他向我招招手，我也走到水里。

“等你阿爷走了，水就会再落一些，那时候水位刚好，”他停顿了下，“你在岸上，我到水下，最后再好好找一回。”

“你确定他在水下？”

“我要是确定，就不用找人问了，我能活这么久，就因为什么都不确定……不确定就有股气推着，”他的背快要弯成直角，脸也快贴到水面上去了，“当时你阿爷被我闹下水，呛了几口，游不动了，他去救你阿爷，你阿爷推上岸了，他一直没上来。我们到水下去找，水太深了，钻得眼睛疼，找不到，当时就没确定，现在也不确定。”

“那就非要确定吗？有股气推着活不好吗？”

“说了你不懂，每晚都有气压着，这个人他就睡不着。”

我感觉我不该刺激我二爷爷，但身子还是不由自主地往前探，我逼近一步，他就退一步，直要退到湖心才罢休。我试着缓和语气，说，二爷爷，别动气，我睡眠也差，是这样的，一动气就更睡不着。

我说得很慢，可他仍是暴躁，扯着嗓子来吼，还带点呜声。我们扯动了浪，湖面早已不再平静，像海水一样翻滚。我害怕他那副带有弧度的骨头再支撑不住，只拼了命地往前去。总算要够着他，可是手掌被水泡过，湿得滑腻。我本要抓住他，可不知怎的，力道竟往他的方向去了，反倒像推了他一把。

他吃了我的力，自然要打滑，往水中摔去。我脑子发胀，想不到别的举措，只能潜下去抓他的身子，他的身子也往下沉，哪里提得起，加上慌忙之中下水，心里发毛，竟也呛进几口水去。我万念俱灰，不再动作，只是没想到在今天要化鱼沉湖，总该有些意外的难过。

我二爷爷刚将我救上岸，就要骂我，说我不仅成不了事，还要坏事。

我任得他说，蹲坐在岸边，回忆起刚刚湖水入肺的触感，不住打颤。歇了一会，太阳升将起来，我已经能够自足呼吸。我走到竿子边上，收起杆子，发现钩子上串住了一块儿破布，被湖水浸得发白掉色，我拿给二爷爷看，问他，这是你要的证据吗，这能说明他在水底吗？

二爷爷说，不是的，他不是穿这样的衣服。随后将那块布塞进了摩托车尾的空槽。

我们推着车子走到山前，我拉住二爷爷，提出应该和迟湖告别。他没表态。阳光从山间的缝隙照进来，看起来锋利无比，仿佛要刺穿我。我说，迟湖的迟，应该是推迟的迟，我们活着，呼吸，进食，查不清的继续查，追不到的一直追，在今天说明天见，在今年说明年见，一切都够推迟，万事都有余地。

我转过头来，对二爷爷说，我之前去欢喜酒，拿了一包好烟，抽了几根，其余留着的，等我阿爷好了，齐齐点上几支。二爷爷没说话，对我笑了一下。



黄昶

二〇〇〇年生，曾获“真金·青年文学写作选拔”总冠军、南京大学“重唱诗歌奖”、“野草文学奖”等。有短篇小说、诗歌发表于《青年文学》《青春》等。正在成为小说家。

新书试读

来自新近好书的试读章节，由小鸟文学编辑部从近期出版物中挑选而来。祝阅读愉快。



题图为《丢失词词典》舞台剧版剧照

## 小说

# 丢失词词典

皮普·威廉姆斯 | 新书推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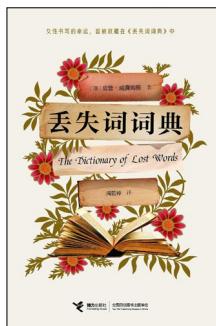
一段《牛津英语词典》编纂室的真实历史

《丢失词词典》是澳大利亚作家皮普·威廉姆斯的第一部小说，以《牛津英语词典》的诞生为题材，从中寻绎一段被遗忘的女性历史。小女孩艾丝玫出生在文字的世界，她从小失去母亲，跟着身为词典编纂师的父亲在累牍院的分类桌上长大。艾丝玫的父亲和一群词典编纂师立志编纂第一部最权威、最完整的《牛津英语词典》。她对他们心怀敬意，直到她发现一张写有“女奴”的纸条被丢弃。

父亲告诉她，词典编纂师的工作就是在词汇的使用上找到“共识”，词典中没有收录的词汇就代表人们不常使用和不重要，而它们的命运就是被遗忘。

随着艾丝玫的成长，她逐渐意识到那些词汇之所以被放弃，是因为它们谈论的是她们的身份她们的存在方式以及她们的经历于是她开始认真地搜集词汇因为她有一个梦想编纂一本女性词典，让那些被丢失的词汇得到应有的尊重。而她也必须离开这个受庇护的世界，冒险去见那些将在书中写满文字的人。为此，她必须与那些与她想法不同的人作斗争。

以下经经接力出版社授权发布。



“莉兹，你可以为我做一件事吗？”我们并肩站在水槽前。  
“要我做什么都可以，艾西玫，你应该知道的。”  
“你能不能帮我搜集词汇？”我说，侧目观察她的反应。她绷紧下巴。“不是从累牍院搜集。”我赶紧补充。

“我要在哪里找到词汇？”她问，眼睛一直盯着正在削皮的马铃薯。  
“你去的任何地方。”  
“艾西玫，这个世界跟阿牍不一样，不会到处都有词汇等着手指灵巧的女孩把它捡起来。”她转过身，对我露出安抚的笑容。

“这就是重点，莉兹。我相信周围还有很多美好的词在飘荡，而它们从来没被写在纸条上。我希望记录它们。”

“有什么用呢？”  
“因为我觉得它们跟莫瑞博士还有爸爸搜集的词一样重要。”我说。  
“它们单然”——她停住，纠正自己的发音，“我是说，它们当然没那么重要。我们用那些词，只是因为我们不懂更好的词。”  
“我不这么认为。我觉得有时候那些正式用词没有那么传神，所以大家才会创造新词，或是把旧词拿来发挥新的作用。”

莉兹轻声笑起来。“我在室内市集跟一些人说话，他们根本不知道正式用词是什么。大部分的人连字都不认识，每次有绅士停住脚步聊天，他们只会呆愣愣地站着。”

我们削完马铃薯，莉兹把它们从中间切开，然后放进大锅里。我用挂在炉灶旁的热毛巾把手擦干。

“再说，”莉兹继续道，“伺候人的女人在那些喜欢用花哨语言的人周围闲晃，这是不对的。如果被人看见我办完事还跟人聊不该聊的，会坏了莫瑞家的名声。”

我原本想象有一大堆的词，多到要用新的行李箱才装得下，但如果莉兹不肯帮忙，我能搜集到的，只用缎带绑上就够了。

“拜托嘛，莉兹。我不能一个人没有理由地在牛津市到处游荡。如果你不能为我做这件事，我只能放弃了。”

她切完最后几块马铃薯后转身看着我即使我真的待在那里偷听也只有女人会欢迎我。男人哪，即使是在驳船上工作的，也会为了我这样的人修饰说话方式。”

我心中开始浮现另一个想法。“你觉得是不是有些词只有女人会用，或是特别要用在女人身上？”

“应该是吧。”她说。  
“你能告诉我有哪些词吗？”我问。  
“把盐拿给我。”她掀开煮马铃薯的锅的盖子。  
“怎么样？”  
“我觉得不行。”她说。  
“为什么？”  
“有些我不愿意说，有些我没办法解释。”

“也许我可以跟你一起去办事，我负责听。我不会妨碍你工作，也不会让你偷懒。我只会听着，如果听到有趣的词，就写下来。”

“那好吧。”她说。  
我开始在星期六早起，陪莉兹去室内市集。我在口袋里装了许多纸条和两支铅笔，像童谣中玛丽的小羊一样跟着莉兹。我们会先买水果和蔬菜——首要任务是买到最新鲜的蔬果，然后去肉摊或鱼摊、烘焙坊和杂货铺。我们会穿梭在一条条小巷中，隔着橱窗望着在小店铺里展售的巧克力、帽子或木头玩具，然后我们会走进小小的男子服饰用品店。莉兹有时候会带着新的针线回家，我回家时多半带着失望。那些摊贩都友善又客气，他们说的每个词都是我熟悉的。

“他们希望你掏出钞票，”莉兹说，“所以不会冒险得罪你娇贵的耳朵。”  
有时候我们经过鱼摊或是一群正把满满一推车蔬菜卸下来的男人，我会听到某个字眼。可是莉兹不肯问他们那是什么意思，也不让我靠近他们。

“照这样下去，我一个词都搜集不到，莉兹。”  
她耸耸肩，继续沿着惯常的路线穿过市集。  
“也许我应该重操旧业，再从累牍院救出一些词。”如我所料，这话让她停住脚步。  
“你不会真的……”她说。  
“我也许克制不住。”

她打量我一会儿。“咱们去看看梅宝今天在卖什么吧。”

梅宝欧肖纳西就像磁铁的两端,兼具排斥力和吸引力。她拥有整个室内市集最小的摊位并排放置的两个木箱,原本装在木箱里的物品被搁在木箱上面出售。莉兹通常把我们带向另一个方向,有很长一段时间,梅宝对我来说只是路过时掠过的人影,锐利的骨架像要刺破薄如纸张的皮肤,破旧的帽子几乎遮不住光秃的头皮。

我们走近时,我可以清楚地看出莉兹和梅宝彼此熟识。

“梅宝,你今天吃饭了吗?”莉兹说。

“赚的不够,连个不新鲜的面包都买不起呀。”

莉兹伸手从我们采买的东西里拿出一个面包卷递给她。

“这是谁呀?”梅宝满嘴面包地问道。

“艾西玫,这是梅宝;梅宝,这是艾西玫。她的爸爸在为莫瑞博士工作。”她带着歉意看着我,“艾西玫也在编大词典。”

梅宝伸出手,满是脏污的长手指从破布般的无指手套里伸出来。我通常不跟人握手,我出于本能地在裙子上擦了擦我怪异的手指,仿佛能去除某种令人不快的东西。我把手伸出去时,老妇人笑起来。

“你这手再怎么擦都没用。”她说。然后她用双手捧着我的手,像医生一样检查。她满是脏污的手逐一握住我的每根手指,测试关节是否正常,并轻轻把手指拉直。我的手指弯曲而僵硬,而她的手指笔直而灵巧。

“它们能用吗?”她问。

我点点头,她似乎很满意地放开我。接着她朝她摊位的商品比了个手势:“那你可以自己动手了。”

我开始挑选她的商品。难怪她没东西吃。她卖的全是漂流物——从河里捞出来的已经破损的东西。唯一的色彩来自茶杯和茶碟,两件都缺了角,不过大体能用。她把茶杯放在茶碟上当作一套,但根本不搭。我心想:有闲钱的人绝对不会用这个杯子喝茶的,不过出于礼貌,我拿起茶杯仔细观察精致的玫瑰图案。

“那是瓷器,茶碟也是。”梅宝说,“把它们对着光线看看。”

她说得对,两件都是上等的薄瓷。我把玫瑰花杯放回蓝铃花碟上,在其他沾了泥污的棕色物品之间,这个组合有些风趣。我们相视而笑。

这还不够。梅宝又朝她的商品点点头,于是我又摸了摸,转过身,拾起一两样东西。有一根棒子,长度跟铅笔差不多,不过是扭曲的。我以为它质地粗糙,一摸才知道它跟大理石一样光滑。我把它拿近,看到扭成一团的末端有一张古老的脸庞。毕生的雕功都凝聚在老人的表情里,他的长胡子绕着扭曲的棒子延伸。我幻想它出现在爸爸的桌上,感觉胸腔里一阵兴奋紧张。

我看着梅宝。她一直在等待,现在她对我露出满是牙龈的笑容,并伸长手臂。

我从钱包里拿出一枚硬币。“很棒的作品。”

“现在没人想让咱的手握住他们那话儿,咱的手闲着也是闲着。我不确定自己是否理解。看我没有做出她预期中的反应,她看着莉兹。“她是傻瓜吗?”她问。

“不是,梅宝,她只是听不懂你说的英语。”

等我们回到向阳屋,我拿出纸条和铅笔。莉兹不肯告诉我“那话儿”(shaft)是什么意思,但她用点头和摇头来回应我的猜测。她脸上的红潮令我知道我猜中了答案。

我们成为梅宝小摊的常客。我的词汇库增加了不少词汇,我偶尔送给爸爸的小木雕令他很开心。他的书桌上一直有个旧骰盅,那些小木雕及他的钢笔和铅笔一起插在骰盅里。

梅宝每讲几个字就要咳嗽,清掉喉咙里大坨的痰液。我跟莉兹经常去看她,已经持续了大半年。我们从来没有见她安静过,我以为咳嗽能够阻止她说话,结果并没有,咳嗽只会让人更难听懂她在说什么。她再度咳起来时,我把手帕递给她,希望她别再往她凳子旁的石板地上吐痰。

她看了看手帕,却没有接过去的意思。

“免啦,咱行的,小姐。”她说。然后她身体倾向一侧,把嘴里累积的东西都啐到地上。我畏缩了一下,她得意扬扬。

我在仔细看她的木雕时,梅宝没完没了地抖搂相邻的摊贩们有什么犯罪方面、财务方面、性方面的不可告人之事。她能一边不停地讲八卦消息,一边告诉我某件东西的售价。

在梅宝充满黏液的语句中夹杂着一个我好像听过的词——莉兹否认她知道那个词,不过从她涨红的脸可以明显看出她在说谎。

“cunt。”我要梅宝重复一遍时,她说。

“走吧,艾西玫。”莉兹说,她匆匆挽起我的手臂。

“cunt。”梅宝稍微提高音量。

“艾西玫,我们该走了,我们还有好多事要办。”

“这是什么意思?”我问梅宝。

“意思是她是个‘cunt’:一个肮脏下流的贱骨头。”梅宝瞥向卖花的摊位。

“梅宝,小声点。”莉兹悄声说,“你明知道他们会因为你乱讲话而把你赶出去。”

“但这个词确切的意思是什么?”我又问梅宝。

她看着我,笑得露出牙龈。她喜欢我请她解释。“小姐,你带了铅笔和纸吧?你会想把这个写下来的哟。”

我甩掉莉兹抓着我手臂的手。“你先走,莉兹,我会追上你。”

“艾西玫,要是有人听到你说那种话……甚至在我们到家前,巴勒德太太就会知道。”

“别担心,莉兹,梅宝和我会小声地说。”我说着,同时转头严肃地看着这个老妇,“对不对,梅宝?”

她点点头,像在等人施舍一碗汤的流浪儿。她希望她的话被写下来。

我从口袋里拿出空白纸条,在左上角写下“cunt”。

“就是你的……”梅宝一边说,一边指了指身体某处。

我望着她,希望能理解她说的意思,就像有时候我会过一两秒才能领悟一样,但这次我被难住了。

“梅宝,这么说没有用。帮我用‘cunt’造句。”我说。

“我的‘cunt’很痒。”她说,挠了挠裙子前方。

这有用,但我没写下来。“跟胯下意思一样吗?”我小声问。

“小姐,你真的够笨。”梅宝说,“你有‘cunt’,我有‘cunt’,莉兹有‘cunt’,但那边那个老奈德,他没有‘cunt’,懂了吗?”

我凑近一些,梅宝身上的臭味令我不禁屏住呼吸。“是阴门吗?”我低声说。

“你是个天才,真的是天才。”

我向后退,但慢了一步,她的笑声携着浓重的气息拍到我的脸上,充满烟草和牙龈上病菌的气味。

我写下:女性的阴门:辱骂语。然后我画掉“女性的”。

“梅宝,我需要一个句子,清晰明了地解释它的意思。”我说。

她想了想,准备说什么,又停住,继续想。接着她看着我,一种孩子气的喜悦在她那张有着复杂表情的脸上荡漾开来。

“小姐,你准备好了?”她问。我靠在她的木箱上,写下她的话……

她的笑声引起一阵剧烈的咳嗽,我快速拍了拍她的背。

等她喘过气来,我在引文底下写道:梅宝·欧肖纳西,一九〇二年。

“谢谢,梅宝。”我边说边把纸条放回口袋。

“你不用我造句吗?”

“你已经造了很多句子,我回家以后会选出最好的。”我说。

“要加上我的名字。”她说。

“会的,没有人会想冒领你的句子。”

她再度笑得露出牙龈,然后给我一根木雕棒。“美人鱼。”

爸爸一定很喜欢。我从钱包里拿出两枚硬币。

“我想它应该值得多付一便士吧。”梅宝说。

我多付了两便士,一个词一便士,然后去找莉兹。

“最后梅宝说了什么?”走向阳屋时莉兹问道。

“她确实真能说,我的纸条都不够用了。”

我等着莉兹问更多问题,不过她已经学聪明了。我们到达向阳屋后,她邀我进去喝茶。

“我得去累牍院查一个东西。”我说。

“你不把新词放进行李箱吗?”

“晚一点儿再说,我想先查查大词典给‘cunt’的定义。”

“艾西玫,”莉兹急忙说道,“你不能大声讲这个词。”

“所以,你知道?”

“不。唉,我知道这个词,我知道它不礼貌。艾西玫,你不能说这个词。”

“好吧!”我说,这个词能引起这样的效果令我愉悦,

“那我们就称它为‘C 开头的那个词’好了。”

“什么称呼都别用，我们根本不会再用到它。”

“梅宝说它是个很古老的词，所以 C 分册里应该有。我想知道我给它下的定义有多精准。”  
阿牍空无一人，不过爸爸和斯威特曼先生的外套都还挂在他们的椅背上。我走到莫瑞博士书桌后的书架前，取下第二册词典。C 分册比 A 至 B 分册还厚，它历经我半个童年才编完。我查找后发现梅宝的词并不在里面。

我把词典放回去，开始搜寻放 C 开头的词的分类格。由于缺乏关注，它们积了不少灰尘。

“你有什么特定要找的目标吗？”是斯威特曼先生。

我把梅宝的纸条攥在手心里，转过身。“没有什么不能等到星期一再找的，”我说，“我爸爸跟你在一起吗？”

斯威特曼先生从椅背上拿起外套“他经过房屋时顺道跟莫瑞博士说两句话，马上就过来。”

“我去花园里等他。”我说。

“好的。我们星期一见。”

我掀起我的桌盖，把纸条夹在一本书里。

我开始一个人去室内市集。每当我必须去博德利图书馆或老阿什莫林办事时，我都会刻意绕路，穿过那些满摊贩和店铺的拥挤巷弄。我慢慢散步，我在女帽店橱窗前停留，偷听杂货店老板和他儿子在街头的对话。每逢周五，我会慢慢地挑选要买的鱼，希望能刚好听见鱼摊老板和他的妻子提到我不熟悉的字眼。

“莫瑞博士为什么不愿收录没有书写过的词呢？”有一天早晨我们走去累牍院时，我问爸爸。我口袋里装着三张新的纸条。

“如果没有书写过，我们就不能验证它的意义。”

“如果它是人人皆知的词呢？我在室内市集经常听到相同的几个词。”

“它们或许在口语里普遍使用，但只要没有普遍地出现在文章里，就不会被收录。杂货店老板史密斯先生的话实在不符合作为引文的资格。”

“但作家狄更斯先生胡诌的词就够资格吗？”

爸爸斜瞄我一眼。

我微笑。“还记得‘jog-trotty’吗？”

前两年“jog-trotty”在分类桌边引发了不小的辩论。它有十七张纸条，全都写着同一句引文。就马林先生所知，它是唯一的例句。

它颇为呆霸 (jog-trotty) 而无聊。

“这可是狄更斯写的句子。”一个助手说。“它是个乱写的词。”另一人说。“由编辑决定。”

马林先生说。当时莫瑞博士刚好不在，事情便落到新来的编辑克雷吉先生身上。他一定很崇拜狄更斯，因为这个词被收录在 H 至 K 分册里。

“一针见血。”爸爸说，“那你举个例子，你在市场听到了什么词？”

“Latch-keyed.”我说，想起了花摊老板史提斯太太曾经对一个客人说过的词，想起了她瞥向我的动作。

“你知道吗？这个词听起来有点耳熟。”他看起来很得意，“我觉得你可能会发现它已经被收录了。”

爸爸加快脚步，到达累牍院后，他走到放着分册的书架前。他取下“Lap 至 Leisurely”这一本，开始一页页地翻，同时低声念叨“latch-keyed”。

“喏，latch-key(弹簧锁钥匙)是用来打开弹簧锁的钥匙，但这里没有提到latch-keyed。”他走向分类格，我跟过去。

除了我们之外，累牍院空无一人。我感觉像回到了孩提时代。我心想：“latch-keyed”应该是放在中间的分类格，不会太高也不会太低。

“找到了。”爸爸把一小沓纸条拿到分类桌，“啊，我现在想起来了——这个条目是我写的。‘latch-keyed’的意思是‘握有弹簧锁钥匙的’。”

“那么，如果某个人是握有弹簧锁钥匙的人，那人可以随意进出？”

“应该是。”

我读着首页纸条，爸爸的笔迹还写了好几种不同的定义。

没有监护人陪伴的；缺乏纪律的；指不安分的年轻女性。

“所有引文都来自《每日电讯报》。”爸爸边说边递给我一张。

“这很重要吗？”

“莫瑞博士也问过相同的问题。”

“问谁？”

“问出版委员会的人，因为他们想要缩减成本。缩减成本代表删减词汇。按照他们的说法，《每日电讯报》不是可靠的来源，它上面写的词都可以忽略不计。”

“《泰晤士报》是可靠的来源？”

爸爸点点头。

我看着他给我的纸条。

LATCH-KEYED (不安分的)

所有不安分的女儿以及穿着灯笼裤的少女，通常还有不知足的人。

——《每日电讯报》，一八九五年

“所以这不是赞美的意思？”

“这取决于你是否认为年轻小姐应该受到监护人陪伴、有纪律并且安分地待在家里做家务事。”他笑了笑，然后变得严肃起来，“总的来说，我认为它会被用于批评。”

“我把它们放回去。”我说。

我把纸条收拢。我走回分类格时，将不安分的女儿藏进裙装袖子里。这是个多余的句子，我想。

到了一九〇二年年底时，我已经对搜集自己的词汇很有信心。不过在累牍院，我还是负责跑腿，以及为几年前义工就已经贡献的成堆纸条添加新的引文。我发现对自己某些词的定义感到恼火。我想拿笔画掉很多处，但我没这个权力，所以那种诱惑只能被短暂地挡在门外。

“艾丝玫，这是你的杰作吗？”

爸爸把一份校样推过早餐桌，指着钉在边缘的一张纸。

笔迹是我的。从他的语气中没有任何迹象表明我的编辑是好是坏。我保持沉默。

“你什么时候做的？”他问。

“今天早上，”我说，眼睛始终盯着我的那碗麦片粥，

“你昨晚睡觉时把它留在了外面。”

爸爸坐下来看着我写的内容。

MADCAP (鲁莽的人)

经常用来谐趣地形容个性活泼或冲动的年轻女性。

“一登上舞台，她就是全世界最欢乐、最愉快、最鲁莽的人。”

——梅波·柯林斯《华沙第一美人》，一八八五年

我抬起头。爸爸在等我解释。“这个句子呈现出原本没有收录的一种意思，”我说，“我是从另一条定义底下把这句引文挪过来的，它根本不适合放在那条定义底下。我经常觉得那些义工的理解完全错了。”

“我们也这么认为。”爸爸说，“所以我们才要花这么多时间重写。”

我脸红了，因为我意识到爸爸把校样留在外面，是因为他还没有改完。“你会想到更好的写法，不过我想如果我先拟草稿，可以帮你省下一点儿时间。”我说。

“不，我已经改完了。我以为我的定义足够了。”

“噢。”

“结果我错了。”他拿起校样折起来。我们两个都沉默了一会儿。

“也许我可以提出更多建议？”

爸爸扬起眉毛。

“关于词汇被赋予的意义，”我说，“我在分类以及添入新纸条时，也许可以在一些首页纸条上写下建议，只要我觉得那些首页纸条……”我顿住，说不出批评的话。

“不够好？”爸爸说，“过于主观、有偏见、夸张、不正确？”

我们都笑了。

“也许你可以这么做。”他说。

莫瑞博士打量着我，我提出的要求悬在空中。

“你当然可以。”他终于说，“我期待看到你的见解。”

我已经准备好了一番说辞，以防他拒绝我，所以他爽快答应反而令我不知所措。我非常惊讶，呆站在他的书桌前。

“无论你建议什么，可能都会经过再次润色。他说：‘不过从我们定义词汇付出的努力来说，

你的观点是有所裨益的。”这时他倾身向前，嘴角的胡须微动。“我的女儿们最喜欢指出那些年迈的义工根深蒂固的偏见，我相信她们会很高兴有你站在她们这一边的。”

从这时候开始，我不再觉得自己是多余的，整理纸条面临新的挑战。只要我的建议获得采纳、列入分册，爸爸都会告诉我。随着信心的积累，建议获得采用的比例也增加了，我在书桌内侧做记录：每有一条我写的定义被采纳，我就刻一道痕迹。随着时间的推移，书桌内侧刻满了我的小小成就。



皮普·威廉姆斯

生于伦敦，长于悉尼。15岁开始写诗，现从事社会学与历史研究，并为多家媒体撰写专栏。曾与两位学者合作出版《时间炸弹》，研究澳大利亚的城市生活，以及旅游文学《意大利之夏》。目前与丈夫、两个儿子，以及各种动物居住在阿德莱德。

新书试读

来自新近好书的试读章节，由小鸟文学编辑部  
从近期出版物中挑选而来。祝阅读愉快。



图为电影《一个唱，一个不唱》(1977)剧照

《一个唱，一个不唱》

阿涅斯·瓦尔达访谈

鲁斯·麦考密克 (Ruth McCormick) /1978

我很遗憾在妇女运动中没有更多的理解。作为女权主义者，我们必须宽容，对彼此宽容，甚至对男人也要宽容。

——阿涅斯·瓦尔达

阿涅斯·瓦尔达的名字总是与女权斗争和政治联系在一起。在二十年的电影导演生涯中，她的作品涉及多种题材，如年轻美丽的女性在得知自己可能即将死去后才发现自己的力量和人的属性（《五至七时的克莱奥》），古巴革命（《向古巴人致敬》），一个人的幸福也许会导致另一个人的痛苦（《幸福》），创作过程（《创造物》），美国在越南的殖民主义（《远离越南》），美国黑人的斗争（《黑豹党》），文化产业、青年运动和罗伯特·肯尼迪遇刺（《狮子之爱》），希腊人反对军政府的斗争（《娜西卡》），一条街道上普通人的日常生活（《达盖尔街风情》），以及不同女性对工作、爱情、婚姻和家庭的看法（《女人的回答》）。

在这位好斗又充满活力的导演的作品中，始终贯穿着一种人文主义和乐观主义精神，这在她的最新作品《一个唱，一个不唱》中得到了淋漓尽致的体现。这部影片因其对两位截然不同的女性跨越十五年的友谊进行了温暖积极的描绘，而受到了众多女权主义者的欢迎，也因其对激进政治的回避而遭到了另一些人的攻击。影片上映后在法国取得了巨大成功，并有望在美国获得广泛且友好的支持。瓦尔达女士最近在纽约参加纽约电影节——以她的电影为开幕影片，接受了《影痴》(Cineaste)杂志编辑鲁斯·麦考密克的采访。

**麦考密克** 许多女权主义者，尤其是激进的女权主义者，都对《一个唱，一个不唱》有所指摘。他们说您塑造的角色与男性的关联太强，您对男性太仁慈了。还有人认为影片过于正面，批判性不够，太像童话故事。

**瓦尔达**：也许人们想要的太多了，但我理解您的意思。在法国，同样有激进的女权主义者对我说：“您对男人的憎恨还不够！”当然，我们需要激进分子，他们很重要，但我不认为女权主义电影必须贬低男性，或者必须表明，我们之所以被压迫是因为他们。真正的问题在于社会制度。即使社会机制是由男性建立的，但这些男性往往只是在传承他们被灌输的意识形态，它历经了数百年文明，其间，一直由男性担任领导者。

**麦考密克**：没错！而且男人们常常被自己的母亲和女老师教导事情本应如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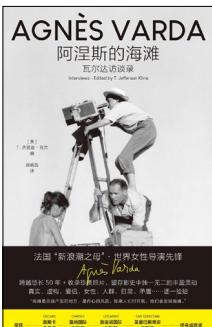
**瓦尔达**：我很遗憾在妇女运动中没有更多的理解。作为女权主义者，我们必须宽容，对彼此宽容，甚至对男人也要宽容。我认为我们的运动需要不同类型的女性参与，不应该只有一条路径或一种方式。那又将回到我们长久以来的状态。

**麦考密克**：您试图拍摄一部大众化的女性电影，一部所有女性都能产生共鸣的电影，而不仅仅是具备这方面意识的女权主义者，这样说对吗？

**瓦尔达**：是的。在政治上，或者作为女权主义者，人们有不同的着手方式。如果你想拍摄一部女权主义电影，你可以在体系外、在地下发力，那么你就能进行非常激进的表达，但即使传达的内容非常好，你可能只能影响五千多名观众。你永远无法触及最广大的女性群体。



《一个唱，一个不唱》海报



**麦考密克**我想到了玛格丽特杜拉斯和尚塔尔阿克曼(Chantal Akerman)。您可能是对的。您在《一个唱，一个不唱》中做到了吗？

**瓦尔达**: 在体系内工作，在常规的电影院发行，你就不再属于地下了。在法国，已经有三十五万人观看了我们的影片，许多其他国家也已经购买了版权，所以我想说，即使这部影片的含义和它的女权主义观点的强度只有那些激进影片的一半或三分之二，至少我们已经引起了许多人的思考，而且方向没有出错。我不认为我们是在为了拥有更多观众或挣更多钱而妥协，因为我本可以用大明星拍一部更轻松的电影。但我想拍一部诚实的电影，即便是为了发行这部电影，我也进行了很多斗争！

**麦考密克**: 可以想象，发行商会对《一个唱，一个不唱》有所顾虑。毕竟，这不完全是一部常规的电影。

**瓦尔达**: 我努力争取，因为我希望成千上万的观众有机会看到展现女性世界的电影，哪怕就这一次。正如莫莉·哈斯克尔 (Molly Haskell) 所说的“阳光下的女性”。我很喜欢这个说法！那才是女人应该在的地方，而不是总躲在阴影里。波姆和苏珊并不是逃避现实的女人，她们并不愚笨！也许她们不算激进，不会烧掉自己的胸衣，她们也没有很强的政治性，不会因为自己的感受而破坏周围的世界。正如我所说，女性有很多种，我们应该与所有女性对话。有些女性不想把男人赶出去。有些女性仍然想拥有孩子和家庭。

**麦考密克**: 也许大多数女性仍是这样想的！

**瓦尔达**: 重要的是，不要贬低这些女性，不要说“你真蠢，离开你的厨房，摆脱这一切！”我们真的想要一个仅仅由女性构成的社会吗？如果有些女性觉得她们必须远离男人，用一段时间甚至用一生去寻找自己的身份——她们实际上可能是女同性恋者，我觉得也完全没有问题。我可以容纳她们，她们也应该容纳我。我了解这些女性，我与她们共事过，我尊重她们，但我并不觉得一定要遵循她们的规则。每个女人都应该找到自己的路。如果只是进入一个新的规则体系，那么我们只是在走同样的路，就像几个世纪以来一直在做的那样。

**麦考密克**: 那么，革命性社会的要点就在于真正摆脱所有旧的规章制度？

**瓦尔达**: 是的。这是我的首要观点。我不希望有人利用我的电影或者我的立场，把我和其他女性对立起来，然后说：“我们终于找到了一个友好的女权主义者，她仍然爱我们，并且认为这个体系是好的。”

**麦考密克**: 反对派喜欢使其分裂后再将其战胜。他们总是会利用任何没有套用正统修辞的艺术家来反对妇女运动、激进运动或其他。

**瓦尔达**: 我绝对不允许自己被这样利用。这一点非常重要，必须重申，我不会利用运动来反对运动本身。那令人反感。我希望自己阐明了这一点。

**麦考密克**: 您是如何想到拍摄这部电影的？

**瓦尔达**: 这是一部女权主义电影，但它首先是一部电影。我处理的是图像，女性的图像，我把这部电影想象成一幅有背景和前景的画。前景是两位女性的形象，而背景则是一部非常特殊和具体的纪录片与 1962 年至 1976 年间法国妇女权利方面的法律和制度有关。大家都知道，在 1962 年，堕胎是非常困难的，是非法的，但如果你有钱，你可以去瑞士堕胎，否则就会很危险。如果一个男人和孩子的母亲没有结婚，他就不能承认那个孩子。经过一段我也参与其中的漫长努力——堕胎宣言、示威游行、审判，终于，在 1972 年，一个女孩在因堕胎被捕后被无罪释放。如今法律规定得到了修改，堕胎合法化了，也能获取避孕药，诸如此类。

**麦考密克**: 从这个意义上说，这是一部历史电影。



《一个唱，一个不唱》剧照

**瓦尔达**: 这是属于法国的一段特殊历史，在法国，甚至计划生育团体都与天主教会反对堕胎的立场作斗争，变得非常开明。我在影片中展现了这一点。我想说明的是，如果有人号召“要是你不喜欢，那就改变它！”，继而女性开始一起讨论和开展斗争，事情就真的会改变。法律和制度的演变构成了影片的背景。前景是这两位女性。同样，我并不想用太多

修辞上的手法。我认为，这样两个不同气质、不同背景的人物将有助于表明，我们能够以不同的方式团结起来，找到自己的身份。我带着宽容表达自己的关切，所以如果激进的女性不喜欢这部电影，没关系，但请不要误解它！她们也有权选择自己的路。

**麦考密克**: 您非常强调母性，这可能会让一些女权主义者感到不舒服。激进女权主义者最有可能认同的角色是波姆，她在决定离开大流士时，坚持要为自己生一个孩子。她把他们已经有的孩子留给了他，这是非常通达的做法，但为什么孩子对她如此重要？有些女人因为不想要孩子而感到内疚和自责。当然，您在影片中也尝试回答了这个问题，一位女性在观看该团体有关怀孕的表演时提出异议，指出他们似乎认为女人必须成为圣母(the Blessed Virgin)。

**瓦尔达**: 这就是我把这个情节放进去的原因。这个女人是对的，他们也是这么告诉她的，她不应该感到内疚，但如果你真的有了孩子，或者你想要孩子，那就享受这份快乐吧！

**麦考密克**: 换句话说，女性在怀孕时应该欣赏自己的身体。这不是胖，不是丑，也不是生病。您想说的是，如果一个女人想要一个孩子，那么怀孕本身就是一件美好的事情。怀孕的女人不用成为圣母。

**瓦尔达**: 对！如果我把怀孕当作与性有关的事情来享受那么它就是我的生活，牵涉我的身体！但许多反女权主义的女性并不这样认为。如果你选择要孩子，怀孕是一件自然的事，你应该享受它。我不是在建议按照教会所说的方式去享受它，即把它当作一种责任，或者是为了巩固国家或家庭。人们从未谈论过这一点，但实际上大多数女性在怀孕时更享受性生活，虽然我们并不了解真正的原因。我想这和很多因素有关。但我应该否认它吗？否认它会让我成为一个更好的女权主义者吗？一个女人理应在因怀孕而变胖时仍然欣赏自己的身体，这是她的特权。模特身材并不意味着所有，如果你想要这种身材，你可以之后再去追求。

我们不要把女性推向母性，让我们重塑母性！但我们要争取堕胎权和完备的避孕措施，这样我们才有选择的权利。这才是最重要的。这才是女性应该团结起来的地方。在影片中，当波姆去阿姆斯特丹堕胎时，那么多不同的女性和她同行，我试图借此呈现的就是这一点。

**麦考密克**: 西蒙娜·德·波伏瓦在她的自传中告诉我们，她曾一度决定不要孩子，因为它带来的责任太重，无法与她的其他责任共存。我和我认识的一些其他女性都很认同这种观点。这并不是说我们不爱孩子，而是因为社会的现状如此，如果没有大量的金钱，做母亲的责任就过于沉重，尤其是没有一个善解人意的男人时，以至于不可能同时成为一个好母亲和一个活跃于家庭之外的有创造力的人。

**瓦尔达**: 正如西蒙娜所说，“女人不是天生的，而是被塑造的。”我们不再是自身生理的奴隶。我们一直在为此奋斗。没有人会问，一个没有孩子的男人还算是真正的男人吗？爱因斯坦没有孩子，列宁和莫里斯·希瓦利埃 (Maurice Chevalier) 也没有孩子，但我们不会质疑他们的男子气概。女人也应该如此。我们都是人。

**麦考密克**: 关于您的影片，人们（包括女性和男性）不认同的另一点是，您让两位女性成功地找到自我，让她们的人生有所成就，这个过程有点太容易了。像苏珊这样受压迫的女性如何成为独立的女权主义组织者？生活条件稍好但也不算富裕的波姆似乎不费吹灰之力就能养活自己，成为一名女权主义歌手。您好像使得女性的生活和难题看上去比实际简单了。

**瓦尔达**: 99% 的电影都是这么反女性的，以至于当女性跟我说“您没有让她们处在水深火热之中”时，我不得不说：“您看，终于有了这么一部电影，里面的女性没有感到内疚或羞愧，不依赖外界，也不糊涂，她们与法律和制度抗争，实现价值并为女性的事业创造价值。您不觉得已经从中获得了很多吗？”

**麦考密克**: 当然。

**瓦尔达**: 那为什么有人来对我说：“女性的失业问题呢？女同性恋呢？那些长得不好看的女性呢？上了年纪的女人呢？”一部电影不是一个可以装下一切的篮子。它是一种娱乐，也是一种交流，如果你想与许多男人和女人交流，就必须找到一种流畅的交流方式。我试图展现女性从阴影中走向光明的过程。

**麦考密克**: 这部影片的确充满了光。

**瓦尔达**: 我试图表现这一点。影片从开始的黑暗、明暗对比、阴影和画廊中女性照片的黑白影像，再过渡到清晰。最后的场景是明亮且充满阳光的，但这并不是一个圆满的结局。

**麦考密克**: 您认为这是一个模棱两可的结局吗？

**瓦尔达**: 完全不是！只不过每个人都可以在湖边和朋友们享受两周的平静。这并不意味着斗争结束了，不意味着他们不会再回到计划生育、演出、示威游行，以及她们的角色和希望中去。这是一个美学问题，就像音乐中的赋格曲，有主题和对题，以一个尾声结束——

一个唱，一个不唱。你能感觉到它没有真的结束，但你获得了某种平静。

有人说我拍了一个愚蠢的大团圆结局，我不同意这一点。波姆孤身一人，没有丈夫，她必须抚养女儿。其他两位歌手也是孤身一人，还有一位有了男人。苏珊现在身边有一个男人，但她仍要承担自己的责任。她的女儿刚刚开始成长为一个女人。这不是愚蠢的幸福，抗争仍在继续！作为一名艺术家——不管这意味着什么，我关注的是画面、是文字、是梦想。如果说我有点理想化，那这就是我的风格！我不认为应该悲观，或者只是口头上说事情正朝着糟糕的方向发展。我们要抗争，但也要有梦想。我们需要梦想！我认为女性需要知道生活可以变得更好。生活可以很美好。

**麦考密克：**嗯，虽然没有发生革命但我同意即使一个公正的社会如今尚未实现但对女性、黑人和第三世界来说，情况都比 1962 年要好。

**瓦尔达：**是的，当然，以您的年龄足以看到这一点。我已经为之奋斗了二十五年！我开始为避孕而斗争的时候，现在那些为之发声的孩子还没出生呢。当时我们的人数很少，所有人都出来反对——右翼、教会，甚至是左翼，因为他们需要人们生孩子来为左翼投票！我们是属于左翼阵营的女性，但也不得不与法国共产党抗争，因为他们不希望自己的议员投票支持避孕！

**麦考密克：**我猜他们也是为了拉拢天主教徒的选票，不想把任何人拒之门外。

**瓦尔达：**当时，我仍然作为严格意义上的政治活动家进行抗争。后来，我开始意识到自己应该在文化领域进行斗争。通过阅读西蒙娜·德·波伏瓦等人的作品，通过与女性交谈，我开始理解这一点。他们会把亨利·米勒 (Henry Miller) 的作品奉为文学杰作，但当时没有人提及他是如何贬低女性，如何践踏她们尊严的。有哪个文学评论家提起过这一点？看看奥森·威尔斯 (Orson Welles)，大家都喜爱的电影制作人，他是个厌恶者！二十年前，谁会提到这个？他们只会说：“多好的电影啊！”有谁曾注意到他处理女性角色的方式是多么糟糕？

**麦考密克：**您很早就开始拍摄关于女性的电影，比如《五至七时的克莱奥》。有很多影片讲述了男人面对死亡的故事，但显然女人的生命并不重要——除了《黑暗的胜利》(Dark Victory) 和《一朝春尽红颜老》(No Sad Songs for Me)，它们认为垂死女人主要担心的就是她们所爱的男人，还没有任何影片讲述过女人必须重新评判自己的人生。

**瓦尔达：**是的，由于对死亡的恐惧，克莱奥意识到自己一直是一个玩偶、一个物件，于是她脱下华丽的衣服，摘下假发，换上朴素的衣服，走出去观察人。她不再在乎被人注视，而是想要与人产生联结，成为一个人。那是在 1961 年，当时还没有人考虑过女人感受的源头。1958 年，当我怀孕时，我拍摄了一部名为《穆府歌剧》的短片，它有关一个女人在怀孕期间的感受。这是一部强有力的照片。

**麦考密克：**存在少数由男性拍摄的关于女性的优秀电影，但我认为女性必须重新思考我们想要如何谈论自己。

**瓦尔达：**是的。我听到这些男性女权主义者说：“作为女人而言，她做得不错。”这是一种居高临下的家长作风，就像“作为黑人而言还算不错”一样。我们，包括黑人和女性，最近才经历了去殖民化，我们必须找到自己的路径，必须自己决定喜欢什么样的女性形象。我们不应该去附和众多男性艺术家的焦虑，他们试图把自己的问题推给女性，像莫迪利亚尼 (Amedeo Modigliani)、贾科梅蒂 (Alberto Giacometti)，尤其是伯格曼那样。

**麦考密克：**我刚好想到他。

**瓦尔达：**当然，我们爱他。但他把自己身为一个男人的焦虑放在了我们肩上。一个男人可以将他的恐惧、内疚和痛苦融入艺术，但作为一个女艺术家，我不会想着将我的焦虑投射到男人身上。我们必须打破常规，创造自己的形象。我不是要争什么，也不想要获得男人的力量！我甚至不为没赚到更多钱而感到可惜。我赚的已经够多了！比那些在工厂里工作的人挣得多，而且和他们不同，我喜欢我的工作。有些导演挣了那么多钱，演员们甚至更多，我觉得这令人不齿。

**麦考密克：**最著名的演员和导演都是千万富翁！当然，您也知道，比起艺术家，他们更像是商人。

**瓦尔达：**随他们去吧，这是他们的游戏。我不在这场游戏中。它的规则是由我并不信任的人制定的，这是场竞争游戏，女人们必须明白这一点。我不参与任何类型的男人的游戏，比如我比你强壮，比你聪明，比你富有。我不在乎这些。我很强大，且以自己的方式发挥聪明才智。我的价值观不同，所以如果影评人喜欢我的电影，也许他们能够在其中发现什么，可能是一些新的东西。

**麦考密克：**波姆的丈夫大流士呢？他看起来很不错，我们也理解在欧洲时波姆为什么会爱上他，但当他们到了伊朗，他又变成一个真正的“家长”。把他设定为伊朗人似乎为评

论那里的政治状况创造了合适的机会，但您并没有这样做。

**瓦尔达：**当大流士远离家乡身在法国时，他的思想是开放的。

**麦考密克：**他甚至挑了一个女权主义者谈恋爱！

**瓦尔达：**是的，他参加示威游行，支持女性，但当他回归伊朗的家庭时，他必须扮演好自己的角色。我并没有那么喜欢这个角色，但这就是他所处的环境，在这样一个地方，几乎没有办法摆脱这种环境。我想表现的是，人是如何随着所处的环境和交往的人而改变的。起初波姆陷入了困境，受到爱情的束缚，而爱情在《一千零一夜》般迷人的设定中会更加动人。想想建筑中包含的性意象，比如乳房和阴茎，您就能体会到波姆当时的感受。

**麦考密克：**她刚到伊朗的时候，感觉很不真实，像做梦一样。后来，当她开始觉醒时，我们看到了戴面纱的女人，看到了贫穷。

**瓦尔达：**这就是所谓的旅途。当你安定下来时，它就不再是旅途了。波姆走出了自己的世界，坠入了爱河，但她的世界不是为一个伊朗男人做炖菜！波姆必须摆脱困境！在这里，我起初想让它更政治化，指出她离开是因为伊朗这个地方和它的政治状态。但面对现实吧，几乎每个国家都有令人不快的地方。你去不了智利，去不了黎巴嫩。有那么些年，你去不了西班牙或葡萄牙。我有一半希腊血统，二十年来我都不愿意去那里。我发现蒙着面纱的女性形象对我来说意味着一些东西，随着波姆在性方面越来越开明，她发现自己身边这些女人在现实中根本没有性自由。因此，我想揭示对比之下的这种扭曲，她在谈论自己的身体和自由时，周围这些不自由的女性却被迫否认自己的身体。

这是一个政治观点。我认为没必要围绕伊朗的政治状况进行争辩。女权主义也是政治性的，因为它涉及制度和权力，女权主义展现了妇女是如何不需要这些制度，也不想要那种权力的。家庭精神、爱和交流并不是坏事——我喜欢与男人和孩子生活在一起，一起吃晚饭，一起欢笑，守护彼此，但婚姻制度、家庭制度正是国家用来压制我们的工具。影片中妇女们唱的一首歌里借用了恩格斯的观点：在家庭中，男人是资产阶级，女人是无产阶级。这是事实，我们必须与之斗争。

**麦考密克：**影片中的“兰花”(Orchidée)组合，她们真的去小镇演唱了与恩格斯和妇女解放有关的歌曲吗？

**瓦尔达：**是的。片中的歌词是我填的，曲子也非常好，以一种与传统情歌大相径庭的方式演唱出来。菲利普斯公司正在发行影片的原声带，专辑中的歌曲更具政治性，因为它们不像电影里那么碎片化。

**麦考密克：**这些歌曲在法国受欢迎吗？电影呢？我猜想在法国，小市镇是保守主义的大本营。

**瓦尔达：**是的，她们结交了很多朋友，表现得很棒。我的这部影片在法国的小城镇也取得了很好的成绩，在那里，人们通常只能看到经典的美国电影和大明星的作品。它在乡下的表现也不错。即使在乡下，我也在观众中遇到过一个激进的女人，她对我说，“我不喜欢您的电影，因为您太关注男人了”，还有个男人说，“我不喜欢您的电影，因为您对男人关注得不够”。就是这样，两种观点都有。男人们觉得遭到了背弃，因为尽管片中的男人并不坏，但对他们的刻画真的不多，但故事本身就是这样。在女人的一生中，长期来看，男人并没有那么重要！

“One Sings, the Other Doesn't: An Interview with Agnès Varda,” from Cineaste 3, no.3 (1978).



鲁斯·麦考密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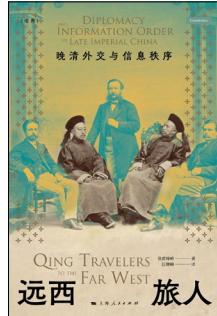
《影痴》 (Cineaste) 杂志编辑。

新书试读

来自新近好书的试读章节，由小鸟文学编辑部  
从近期出版物中挑选而来。祝阅读愉快。



题为 *Binchun and the Tongwenguan students at a French salon, 1866*



在 1917 年一个冬日午后，张德彝将儿子召集在病榻旁。他预感自己可能命不久矣，口述了临终遗折，准备呈给 1912 年被废黜、当时年仅 12 岁的宣统帝溥仪。张德彝说，近七年间，“临餐忘食，终夜失眠，病体缠绵，医药无效，现复日加危笃，自知不起，伏惟皇上冲龄睿智，典学方新，重道亲师，庄敬乃日强之本；遵时养晦，殷忧启圣之基。此则臣耿耿愚衷，不能自己者也。涓埃未报，溘露已零。”

72 岁的张德彝，是一位名副其实的清朝遗老。在清朝灭亡后的几年里，他固执地在其北京宅院内留存了一份花名册，里面记录了曾来京向已故的光绪帝（1871–1908 年在位）行最后致敬礼的前清朝官员的姓名。他哀叹，国丧本应天下缟素，而整个辽阔的大清国中，却只有他一人庐守清陵，为光绪帝守丧三年。

在熊熊燃烧着革命热情的 20 世纪初，张德彝的同代中少有人会在意这些话，但这位长者并不是一位恪守传统的守旧派。他一生的绝大部分时间都在异国他乡度过，并且是清帝国首批派往欧洲的使节之一。1847 年，张德彝出生于盛京（今辽宁沈阳）一个一贫如洗的汉军旗人家庭，幼时由母亲对他进行家庭教育，7 岁时，由舅父资助，送他到一所私塾学习。在他 15 岁的时候，满洲、蒙古和汉军各旗都在招募年轻人到新成立的同文馆就读。张德彝凭优异的成绩被选入同文馆，成为 10 名学员之一，并开始接受成为一名英文译员所需的培训。凭借着语言天赋，张德彝以最高分通过了学校的首次资格大考，并被授予八品官职。蒙古八旗的学生凤仪得分略低于他，被授予九品官职。1866 年，在大考结束不久后，海关总税务司赫德上奏，带领几个学生前往英国进行一次家乡游历。总理衙门建议张德彝、凤仪以及他们的同学彦慧随使团“前往各国，探其利弊。”从此，张德彝先后出使欧洲、美国、日本等地达八次之多，并于 1903 年升任为清朝的驻英公使。

张德彝出生在第一次鸦片战争后，同治中兴正值他的青少年时期。由于年纪尚小，他无法体会到两次鸦片战争对清朝外交关系的彻底改变。作为同文馆学生，英文学业是一份让他得以在官僚机构的底层谋生和立足的职业。根据同文馆规定，驻外使馆人员可以重新进入同文馆，并在其中担任教师和翻译。由此，张德彝整合出使所学到的实践经验和笔录的日记文稿用于课堂，以培训未来的译员和外交官。同文馆和驻外使馆之间的这种互惠关系为受训学生和在职外交官提供了至关重要的联结并使得先前使团积累的知识，能够通过课堂传达给未来的外交官。张德彝从一名学生译员到驻外公使的职业历程并非独一无二。最终正式担任驻外公使的清朝外交官中，共有 14 名出身于学生译员，其中包括 4 名同文馆的旗人，所以相当一部分的清朝外交官之所以能脱颖而出，与传统的成功路径不同，得益于从外语的才能和海外随使中获得的经验。从张德彝的经历，我们可以看出外交官的职业轨迹和个人倾向左右了他们建构西方信息的形式。

### 珍奇的收集者

作为一名新手翻译官，张德彝在出使时坚持依照传统条目的记录形式撰写日记。他先从日期和天气开始记录，然后是当天主要活动的总结，最后是他返回住所的时间。他偶尔也会写一篇类似于人类学家田野记录的特“记”，即一种以独特和客观的笔调，对其工作中所触及的方方面面，进行经验观察式的写作。这些特“记”，被交叉引用并分散在每部日记中，也有助于自己从零散的记录中总结规律，为笔记添加可读性。张德彝的兴趣范围广阔，覆盖了从日常生活的平凡细节到最为古怪奇异的机械设备，却几乎不谈及任何严肃正经之事。他对参观美国国会之事仅用两句话草草略过，却不惜笔墨，描述弹子游戏与赌博下注的规则。他从不放过任何能详尽阐述男女求爱的礼数与舞宴艺术的机会。作为年轻人的张德彝，其观点、兴趣与情感均与使团中级别较高的官员们大相径庭，同样地，他对西方社会的描述和解释自然也与他们迥然不同。

张德彝将自己的第一本日记命名为《航海述奇》。他以“述奇者”的身份写作，遵循了清

## 非虚构 150 年前，他们认为 这是与中国和平共处的 一种平行文明

皇甫峥嵘 | 新书推荐

一本晚清外交风云录

《远西旅人》深入探讨了晚清时期中国人对西方的认识与外交信息体系的构建过程。作者通过考察六位出使欧美的使臣的书写模式，揭示了从 1860 年代初到 1895 年间清朝如何逐步重建与西方列强交涉所需的外交信息体系。本书突破了传统学科界限，结合外交史、文学史、思想史与信息史，详细解读了晚清外交官如何书写“西方”，并分析了这一过程中信息秩序的演变，为理解晚清时期的中西关系提供了新的视角和深刻的分析。

书中不仅结合了传媒学理论，剖析了使臣们如何运用不同体裁和传递方式构建西方叙事，还探讨了信息在阅读集团中的演变和重新利用。同时，本书将宏观叙事与微观历史相结合，展示了晚清土人信息采集的多元性、内外张力，以及使臣自身文化、思想、社会关系对其信息整理方式的影响。

全书分为八章，从清朝政府对国外信息采集的局限开始，逐步展现了出使大臣的身份转变、驻外使臣的制度化、文书流通的电信化以及江南私人出版业对清政府信息掌控的颠覆性。最终，在甲午战争前夕，晚清土人对于西方形成了与官方意识形态相交错的共识与话语，这一观念变革与使臣们构建的信息秩序紧密相连。

经上海人民出版社授权，我们节选了第三章《学生》分享给读者。

代文人墨客中的传统，通过大量收集材料和文本的写作来“质疑、探索和建构”自我。通过标题突出他的历险故事是由海洋起源的，张德彝请读者抛开惯有常识，并随他一同进入一个充满不可思议元素却又真实的世界。“奇”通常用于描述引起惊奇、出奇或离奇之物，著名诗人屈原（前 340—前 278）用这个字来暗示他自己不寻常的儿时抱负（“余幼好此奇服兮”）。述则是一种以最简约朴素的形式呈现真实的记录方法。张德彝将“述”与“奇”相结合，由此向其读者示意：书中记录的所有物体对象、事件活动和经历体验都来自现实生活中的生活。正如他在《欧美环游记》自序中所写：“前寰海诸书，固已言之甚悉，但所言征实者，不过十之二三。”



作为一名还在接受训练的学生，张德彝独树一帜的写作风格选材，使他能够容纳比传统使节日记更广的内容。如果说使团里的官员均在试图将西方融入他们现有的概念框架之中，张德彝则不同，他宁愿让读者沉浸在一个充满无穷无尽奇闻异物的盛宴中，并不急于给予解释。直至 1870 年他第三次出使前，张德彝的日记中，对中国与西方国家之间的外交冲突很少提及。

就举他经常描写的一类事物为例：游戏。这并不是一个符合传统的题材，因为晚清的教育通常不鼓励体育运动和户外游戏，父母和老师会称赞那些对同龄人交往或出去玩耍兴趣索然的孩子。视察欧洲的清朝官员通常将盛行于西方的体育运动解释为国家培养军事力量或磨练个人意志的手段。譬如，志刚仔细观察了孤儿院的孩子在游戏场上彼此背抱的方式，认为这让人看起来“以为嬉戏”，实则是为了练习在战场上背负伤兵。1877 年，郭嵩焘在前往伦敦担任驻公使的航程中，看到德国军官以跳蛙游戏玩耍，又用前额和肘部击碎核桃，不由得肃然起敬道：“彼土人才，可畏哉！可畏哉！”相较之下，张德彝对游戏乐在其中的原因在于它不但具有休闲娱乐性，还对个人有实用价值。即便他曾经想到过这些活动在国家、军事上的效用，但也并没有在写作中提及。

他对所有年龄阶段的各种形式的玩具和游戏都十分着迷，比如客厅游戏、滚铁环、抽陀螺以及跷跷板等。在笔记中张德彝花费大量笔墨翻译介绍了数十种游戏：其中包括弹子球游戏规则、力学锻炼三十余式以及关于如何游泳的十四要点课程。他特别喜爱一套西式儿童积木，以至于花费数页详细记述每个木块的形状与尺寸。又有一次，张德彝独自漫步在巴黎郊区塞纳河畔讷伊，并进入了其中一家赌场，他不仅在观摩中记住了许多赌局的设置和规则，还在回来后将其一一记录。他的上司，即管理使团的官员对他这样的“不务正业”很少干预，也许将其视为语言练习。

张德彝在其日记条目中对这些游戏描写的细致性和准确性，让人感觉很可能打算将其规则带回中国传授给家人和朋友。虽然张德彝并没有说明为什么对各种游戏和运动如此上心，但他似乎展现出对体育的偏好。他最长的一篇日记包含了关于“泅水”课的记录，并以一系列对现实的关心作为开头：“泅水一技，虽近于戏，则历练胆识，一则拯救危险……或有谓泅水不利于疲弱者，而医生云：“长习此技，不惟增长臂力，且能辟除厉疫。”

张德彝通过从大众生活中收集的事实、轶事和小道消息，呈现出一个与其同时代人所描绘的西方形象截然不同的另类西方。而在 1868 年他第二次出使海外时，张德彝开始将记录日记视为一项严肃的工作，他甚至开始改变个人习惯，决心不再把时间浪费在漫无目的的闲逛上，而是以学习有价值之事为目标，度过每一天。当使团成员抱怨他与轮船上的日本乘客谈论过多时，他解释道：“明对以生斯世也，随处皆足征学，无人不可责也。古人云：‘游不废

学’，良有以也。”这些观点在福泽渝吉（1835–1901）的早期作品中得到深刻的共鸣。福泽渝吉，日本著名教育家《西洋事情初编》的作者，曾以德川幕府外交使团译员的身份随使，并致力于“学习外国文化中最寻常的细枝末节。”在纽约时，张德彝被带到一位年轻的非洲探险家面前，这位探险家告诉张德彝：他曾在沙漠中坚持完成了一段艰苦卓绝的旅程，却在返回后沉迷于饮酒赌博的颓态之中。张德彝由此发出了一段呼吁：

人之生于世也，苟不著书立说，以传后世，则为虚生。况足下游历既远，见闻又多，已有成书播传遐迩。倘能继此不惮梯航，则异国他邦，尽入美囊佳话矣。

不管这些对话是否原原本本如他所记，但在这段描写中间接地表达了他的心愿：让自己的日记成为对后人有用的记载。

这种对平凡琐碎的热爱与对著书立说的激情，一直伴随着张德彝走过漫长的外交生涯，但它的应用却随着时间推移而不断发展。多年来，随着在外交部门角色的持续变化，他作为一名学生的稍许不成熟观点逐渐被职业外交官的专业习惯所取代。张德彝以其敏锐的社会洞察力、惊人的记忆力、对细节的关注程度以及精湛的记录能力，协助清朝在英国、法国和俄国建立驻外使馆。这些从他在 1877 年清朝在欧洲建立首座使馆时就显现出来，当时张德彝就已经是一位经验丰富的旅者，他负责处理使团的各种杂务：从签订公使馆居所的租赁合同、管理外国仆人、与来访者保持通信、传送并接收正式和非正式电报以及参加众多宴会和舞会。与此同时，他还收集了公使认为有用的各种信息情报。完成上述这一系列的职责，日记作为信息储存的机制，涵盖了与使馆运作有关的方方面面，其作用非常寻常。所以，作为“述奇者”，张德彝的角色并非一成不变，而随着他漫漫职业生涯中责任的转移而逐步演变。

### 大同世界的旅者

在 1866 年远航开始仅仅几天后，张德彝和同窗们就克服了羞怯，用笛声为船上法国人的歌唱伴奏。在 1866 年的蒲安臣使团出使期间，据《布鲁克林鹰报》报道，使团译员凤仪说：“如果他的父母也能来的话，他希望可以在美国度过余生。”早期清朝使团缺乏严格的行为准则，经常唱歌、玩耍、喝酒或与外国人交谈，这表明清朝使团成员享有远超同时期日本使团成员的自由度。德川幕府晚期派遣的使团成员，一举一动都被指定的督查员所监视。与使团的官员相比，学生更卓越的语言能力和并不繁重的公务职责，让他们与外国人的交流沟通更加惬意自得。比如，在巴黎参加了一场多国宴会后，张德彝写道，他坚信世界各地的人都属于同一个大家庭。“然衣服虽诡异，而喜则亦喜，忧则亦忧，情无或异；风俗虽不同，而好则皆好，恶则皆恶，性实大同。”他很感激能有机会“得又良朋”，海外朋友们的陪伴使得他“耳目为之一新”，“则晤言一室，把臂言欢，非未天假之缘也，此乐何极！”

这种世界主义的精神，是对跨越文化、政治分歧之共同人性的笃信，在其早期出使时期，这种精神为年轻的张德彝提供了如何描绘他与外国人交往的写作框架。在有些情况下，它甚至可以表现为对公然种族侮辱的超乎寻常的宽大与容忍。例如，在使团抵达巴黎时，张德彝的辫发招致一位英国小年轻的嘲笑，这位英国人大笑着对哥哥惊呼：“阿兄！看猪尾甚长。”哥哥则叱之说：“威良！可谓少不更事矣。汝知泰西于百年前亦有辫乎？只少短于此耳。再，汝言华辫为猪尾，则我面为猴脸矣。”同样，当一个美国女孩看到他“憨笑不止（出门则笑声大作）”时，张德彝记录了她母亲的难堪尴尬和连连道歉。在这些叙事中，通过将成年人指定为训诫之人，张德彝授予了西方人能够自我纠正其幼稚行为的能力。

他愿意宽恕个人的冒犯过失，并认为中西冲突的根源在于个人沟通不畅和互相误解，而非种族主义的恶意中伤。即使在面对出于政治动机的诽谤造谣时，他仍保持沉着与庄重。例如，法国外交部官员曾向张德彝求证，新闻上关于“中国公使将三车老鼠带至华盛顿，并每天命其华仆再购两篮老鼠”的报道是否属实。这位法国官员问道：“如为详确不知如何烹调？乞明以教我。”张德彝淡然地反驳说：“天下各国人民，或遭兵燹，或遇水患，食鼠容或有之。然我国钦差在此，即有食鼠一说，不知购自何处，尚望再为访之。”据张德

彝的记载，法国人当即承认这一定是报纸编造的无稽之谈，并感谢张德彝的指正。当遇到一位英国女士向其求问中国溺女之谣传时，张德彝也采取了同样的回答方式，且同样温文尔雅地引导这位女士为轻信讹闻而道歉。

同样，在面对中国人对外国人失礼之处，张德彝也用类似的技巧缓和紧张局面，比如，一个法国人曾直截了当地问他，中国人为什么用“鬼子”来称呼外国人。张德彝再清楚不过，这个称谓是一个由来已久的形容外国人的贬义称呼。有学者认为，“鬼子”最开始使用，可能在18世纪晚期。该词被广东人用来称呼英国商人，这大概因为广东人厌恶英商工作至深夜的习惯，故而对他们以鬼作比。张德彝可能对“鬼子”一词的起源一无所知，但他不可能不熟悉这个词的用法。他的对策是当场编造一个词源典故。他告诉这位法国人，“鬼子”实际上是汉朝时与中国贸易的一个中亚国家“龟兹”之名的讹传。其实“龟兹”应读作“秋慈”，但后人仅凭流传的书面文字，错记了其原始读音，以致该词听起来像“鬼子”。他向法国人保证，这类错误如同将英国人误认为俄国人，或将日本人误认为中国人一样，仅此而已，别无他意。但当张德彝被问及这个称呼为何仍在使用时，他只能将这个问题抛诸脑后，反问为何西方人称他的国家为“斋那”“吉那”“支那”，而不是“大清”“中国”。

刘禾将张德彝编造的词源解释描述为谴责洋人对中国与“支那”之间的混淆。虽然张德彝的这番话带有批判的语气，但他言论的重点似乎不是指责欧洲人称他的国家为“支那”。张德彝似乎想使其所造词源被西方人认真对待并借此改善其同胞的仇外形象。对他来说，称外国人为“鬼子”确实是让人所厌恶与不齿的。实际上，在描述此事的整篇日记中，张德彝极力避免直接写出“鬼子”两字，而是以同音字“桂子”取而代之。若将此举置于他其余试图减少文化冲突的努力之背景下考量，则张德彝为“鬼子”所构建的词源解说很可能将原本的带有种族主义贬低洋人的词汇经过重溯词源，化解为一场语言误会。

因此，张德彝的世界主义精神不仅体现在他对跨文化共同人性的坚定信念上，也体现在他旨在改善中西方彼此认知的细微言行中。张德彝的世界主义精神在他那一代其他外语学生身上也可以看到，但每个人的表现有所不同。福州船政局附设求是堂艺局的法文学生陈季同，在自身文学热情的驱使下，以法国人最能欣赏的方式描绘中国形象。庆常，一位来自汉军镶红旗的天主教徒，对清朝的外交政策采取了日益消极的态度，并最终放弃了使臣一职，隐匿于欧洲社会。张德彝以“珍故收集者”的镜头，将看上去不可一世的西方各国瓦解成无数个细小的发现，这既不是极宏大的叙事记述，也不是简单化的刻板印象。当我们把这些小碎片重新拼装起来时，浮现出来的暗示是：这是与中国和平共处的一种平行文明。



皇甫峰峰

美国华盛顿大学东亚研究系学士，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分校历史学博士，现任纽约州斯基德莫尔学院（Skidmore College）历史系副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为近代中外关系史、外交史、国际法学史。

新书试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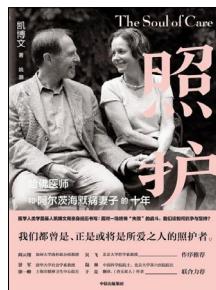
来自新近好书的试读章节，由小鸟文学编辑部从近期出版物中挑选而来。祝阅读愉快。



题图为电影《依然爱丽丝》(2013)剧照

关系洗牌,或角色调整,几乎是重病一定会带来的人际互动改变。

全球著名的医疗人类学家和跨文化精神医师凯博文教授 (Arthur Kleinman) 在其著作《照护》(The Soul of Care: The Moral Education of a Husband and a Doctor) 一书中,描绘自己在妻子罹患阿尔茨海默病后的心路历程。妻子原本是他生活中的照护者,当她逐渐进入无法独立生活的病况后,他成了妻子的引路人。十年来对患病妻子的照护,更让一辈子投身照护领域的凯博文,衷心体悟“照护是以关系为中心,给予照护和接受照护是一种分享礼物的过程”。



然而,这个以关系为中心的过程,却有一个现实的主轴,就是关系的变化。就像在人际方面凯博文曾经历过的一种现实,他写道信赖已久的朋友不见人影,……而萍水相逢之人,却能出乎意料地成为我们的重要帮手。”

当确认自己生病,和一位老同学说起时,我才得知他的父亲十多年前也曾罹患同样的病,治疗后一切安好。在与老同学的交谈中,除了他以其父的经历给我打气的对话外,令我印象深刻的还有他父亲病后的关系洗牌:原本经常往来的朋友很多不见了,倒是本来不常见的,却可能前来探望、照护而走得近了。

虽然不一定所有人的经验都和凯博文或我同学父亲的类似,但日常生活中的关系洗牌,确为常态。

我的病中经验也有相同之处。听闻我生病后,有些许久未曾联系的老朋友陆续主动问候,不少前来探望,一时间无法探望的,则经常通过社交软件问候,或传递各种好玩新鲜的信息,以表慰问。有些朋友很关心,但担心太久没见突然联系很突兀,还会通过其他朋友先来打声招呼。

其实,我在治疗闭关中,最为开心的就是朋友来探望或陪我聊天。通常,是不好意思太过打扰人,但很期待朋友主动问候。我想,很多病人可能都是如此,因为对照护关怀的需求大,难免担心不留意便期待过多,而对他人造成困扰。

另一种现实则是,口头表达关心的人,不一定会想到具体行动;会以行动落实关心的人,也可能不会说什么。无论如何,亲友如果真心愿意关怀病人,主动问候或陪伴聊天都会是重要且具体的照护方式。

其他也很常见的现实是,听闻他人重病,很多人并不晓得可以如何表达关心,更不知道该如何和病人相处。有人因此保持沉默,甚至不敢靠近病人。只在背后议论的人性也很常见,这种反应始终离病人的状态很遥远。他人罹病时无法给予支持协助,即使病人康复后,已走出疾病状态,也可能仍留在标签化疾病的原地,永远把别人当病人,更遑论那种诸多病人口述和自传中,都描绘过的乘人之危而落井下石的言行。

重病,像是一面关系与人性的放大镜,可以让病人看清楚周遭人情的形态。不过,同样值得病人注意的是,有时也不必相信被放大的琐细好像真的那么糟糕。但这是病人得自己走过的人情冷暖,无论旁人在意与否。

\*\*\*

因他人对自身疾病的反应而引起的尴尬矛盾,也很常见。有些人即使表达关怀,却可能做出相反效应的言行而不自知。我自己也遇过不少这类情形,刚开始的确令我错愕,但后来觉得,那不一定是个体的有意之举,更可能的原因是,我们的生活教育缺乏生命哲学的伦理及应对之道。如今回想,许多都成笑话了。

有一天,我接到一位同侪来信问候,我相信她的诚意和关心,可是她却写道:“不知道你怎么了,原来真相是你罹癌了。”她用“真相”两字,可能道出了八卦议论的后台,也可能说明了她的探问过程。无论如何,乍见这样的用语时,我还真是愣了一下;而在回复感谢并说明近况后,就再也没有收到回音。我与另一位同侪提及此事时,他的回应是:“她



只是来确认消息的。”我会心一笑。

诸如此类显得颇为无厘头的关怀方式，很值得多谈以为提醒，有些情境甚至被拿来当成卫教中的“经典”地雷。

例如，“别跟癌症病人问的问题或说的话”，是相关书籍、文章和医院卫教中提供给病人亲友的常见建议。只是，信息虽然很常见，却不易被主动或认真看见。



电影《遗愿清单》剧照

《纽约时报》在 2016 年有篇报道，《不要跟癌症病人说的话》(What Not to Say to a Cancer Patient)，台北和信医院将之整合编写为《十个不要对癌症病人说的话》，很值得参考，在此列出，也加上一些我的思考以为调整顺序和补充说明：

一、请“扼杀”你的“好奇心”。不要过多询问病况和病人身体细节，也不要主动提问病人预后的评估。这些问题都只是不断对病人明示暗示他的疾病很严重，不断把病人拉回忧虑疾病的关注上。病人需要的不是一再回答非照护者的问题，而是放下与休息。

二、不要在病人面前高谈阔论，比较你听闻的癌症病人景况，尤其不要轻易地说谁谁谁得了同样的病走了或复发了之类的负面话语。没有两种癌症是相似的，每个人的身体条件和处境也不尽相同。

三、不要对癌症病人说：“你应该感到很幸运得的是这种癌症，而不是其他什么更严重可怕的病。”这种论调低估了病人经历的恐惧与辛苦。

四、不要对癌症病人说：“我知道你的感觉。”因为你不可能知道。这种说法，不但不会让病人开心，也很难让病人信任你，甚至可以说，基本上这只是句风凉话。

五、请别自以为幽默，对本来想减肥却一直没成功的癌症病人说：“至少你终于减重成功了。”要知道，化疗病人体重变轻，是令病人压力很大的事，那对治疗可能有所影响。

六、不要对癌症病人乱报偏方、健康食品或养生疗法，说谁谁谁吃了有效。病人的钱最好赚！请勿增加病人的财务负担，甚至可能因此影响治疗，造成不必要的健康副作用。

七、不要对癌症病人说“你之所以会得癌症，都是因为生活习惯不好。”责备病人并没有帮助。事实上，许多因素都可能影响罹患癌症的风险，得了癌症还真的往往只是运气不好。连医师都搞不清楚的癌症起因，亲友就不必捕风捉影，乱说一通了。

八、不要一直对癌症病人说“一定要积极治疗！癌症的治疗，一路上可能崎岖不平，时好时坏，所以不要一直鼓励病人无论如何都要积极面对治疗。天天被“加油打气”，令病人更感疲惫。

九、不要让癌症病人单独承受痛苦感觉，即使说“我不知道该说什么”，都比完全不说话或回避病人来得好，那样可能会令病人感到更大压力，甚至觉得被遗弃。癌症病人有一种说不出的孤独感，“有交谈比没交谈好”。“陪伴”是非常重要的心理支持，也是病人恢复健康的关键。

十、不要直接跟癌症病人说：“人生难免一死。”

这种哲学家口气的话毫无帮助只会更令人泄气。茫茫人海中，准备好随时可以上路的人，毕竟寥寥无几。人到临终之际，大概也不会想被说出这样的话的人探视；大多数的病人，都还在期待康复乃至奇迹出现。

以上这些“禁忌”不少我都亲身体会过，而且，地雷绝对不止十个。如今重看这些禁忌提醒，不觉莞尔。然而，当时身为病人的我有时的确感受不佳，不知如何应对。

\*\*\*

亲友的良言与陪伴，即使在寒冬都令人如沐春风；但是，少根筋的亲友付出的关怀效果，偶尔却可能与要病人安心休养的目的背道而驰。

在我的经验中，最感无奈也倍感疲累的，就是要一再重复回答简报自己的状况，以安慰亲友的担忧或好奇。偶尔遇见缺乏疾病常识但好奇心过强的天兵，更是令我哭笑不得。

所以，我一般不会向我并不想费力诉说的对象主动告知生病的事，便是害怕会有后续被追问的麻烦。

有一回，两位朋友一起来看我，当我简报一般的淋巴癌治愈率高，个案管理师还安慰我六个月后就当没发生过这件事了”时，其中一位竟说：“淋巴癌不是很严重吗？那个谁谁谁不是扩散到淋巴很快就走了？”我正不知是该和她认真做卫教，还是把她的话当耳边风时，幸好另一位朋友就要她闭嘴了。

另有一回，有位天兵试图给我个震撼性安慰，直说：“还好你得的是癌症，不是心脏病，要是心脏病，几分钟就走了，就没机会了！”

另一位天兵得知我的病况，竟在电话那端翻开医学教科书，念一段给我听，然后还很困惑地分析各种概率，我俨然成了考试标的。

另一个天兵看到我使用的牙刷和器具都用开水烫过消毒以避免细菌感染时竟对我说“免疫力是可以锻炼的，你这样弄得太干净不好，无法锻炼免疫力。”显然是无法区分因化疗而受抑制的免疫力与正常人体的免疫力之别，想当然耳便轻率断言。

我也曾遇过这样的处境：一位朋友知道我得了癌症，我都没怎样，她却当场哭给我看，好像我就要走了一样。

在治疗期间，某天两位朋友来探望我，两人坐在我对面，表情凝重，两双眼睛盯着我一双眼睛不发一语，我觉得既好笑又无奈。为了减轻他们的心情压力，也为了让自己摆脱沉闷，我只好全程靠着自说自话度过被探望的时间，结果朋友离开后，我感到疲惫至极。

还有一个朋友一再对我叨念：她有个朋友得了乳腺癌，大肆找朋友到家里开派对，要我学习她“看得开”“找乐子”的态度。这又是一个天兵，对不同癌症、不同治疗的副作用全无基本概念就胡乱出点子，也像在暗示病人看不开，说教意味浓厚。

也有人怪罪我为何不早点跟他们说我生病的事，但其实我们原本可能并不常联系。甚至，以此方式表达关切的朋友，多仅止于该次“确认”或“问候”，却少有其他后续关怀。反应强度与互动表现不成比例，有时令人困惑。

不过，尽管这些言行回应都像出自天兵，多数人的初衷实属良善。显然的问题是，好奇心或语无伦次，是很多人听闻病情或探望病友时，最常出现的互动盲点。多数情况下，亲友们即使关心重症病人，但几乎都不会花费时间自修疾病与治疗常识，也少见对病人具体需求的真切理解，多是基于刻板印象来面对病人或提出各式问题。在此常态下，时不时，病人就在不经意中成为亲友们认识疾病的白老鼠。

如果旁人有所学习，对于病人来说还可谓利人利己，结果终究能皆大欢喜。最无奈的情形是，病人以身为靶子，亲友仍始终练不成箭，那真是令人无言以对。

\*\*\*

社会对于疾病的刻板印象，以及缺乏生命哲学的日常教育等现实，常让重病之人除了应付自己身心的变化外，还经常在应接他人抛出来的意外怪招，有苦说不出。

我回想母亲失智症发病初期，一定也吃了不少类似的苦头。

母亲从来就是有些面向聪明干练，有些面向则不大灵光。因此，尽管母亲在谵妄前就已陆续状况百出，但家人并未意识到母亲可能生病了。相处距离太近，也很容易将日常生活中的摩擦用来解释母亲的奇怪反应，以为母亲是在生气或找麻烦，是老化强化了原本的糊涂或脾性不好之处，出现传闻中的老人偏执。

那段时间，母亲与家人都不知道，彼此正一同走进陌生的黑暗隧道，眼睛因尚未适应而盲目，经常在没有意识到的摸索中，不断犯下理解与对待的错误。在莫名的冲突中，困惑呵斥、生气吵架、质疑受伤、拂袖而去、焦虑挂念、怀念平和往昔，是家常便饭。

生老病死苦虽是人生常态，但一般而言，我们似乎只知如何迎接他人的新生，对于老病死苦就算不至于退避三舍，也多是避而不谈，很不熟悉。也许，因为人生充满了病与苦，尽力逐乐、避免受他人老病死苦的影响，成为人之常情。

然而，根本的问题是，我们可能因为回避他人的老病死苦，就变得比较安心喜乐吗？

老病死苦看似日常生活中的非常事件，其实正是寻常的人生光景。而且，随着医疗进步、整体寿命延长，老病死苦都可能成为延长赛，但多数人则是对此显得无知或盲目以对。

在我成为医疗人类学者以前，我也曾多次犯过这类盲目错误。三十多年前，我的父亲罹患胃癌，胃部切除过半，只能吃粥或流质食物，母亲总是以吻仔鱼炖稀饭给父亲吃。当年不懂事的我，以为父亲仍和我们同桌吃饭，就表示父亲不介意我们“正常”饮食，因此尽管我也会帮忙准备父亲的饮食，却常肆无忌惮地在他面前继续吃香喝辣。

父亲癌症复发前免疫力大降，当时我在外地求学，常打电话回家问候。有一天父亲接电

话时,以故作镇定的口吻跟我说:“我长带状疱疹了。”

当时的我不明白那意味着什么,只知道那时正有一位政界名人也因罹患带状疱疹而上新闻,一时之间不知所措的我,竟然回应父亲:“你也跟人家赶流行啊?”我企图用自以为是的幽默来掩盖自己的慌张,印象中,只换来父亲在电话那头的沉默。这件事令我后悔许久。

不仅我们的家庭教育缺乏生命哲学,以及照护的灵魂和伦理探索,连相关的学校正规教育也颇为匮乏,整体社会多以为那属于医疗或宗教的范畴。我在长年的教学经验中也发现,少有年轻人会主动关注医疗健康议题,如果有,也多是因为自身或家人的疾病之苦。

然而,并不是所有社会都如此看轻照护伦理的教育。听幼教领域的朋友说,丹麦给零至三岁托儿所设定全国一致的“课纲”有六个主题,其中第一个主题“社会技巧”,堪称“安慰教育”,就是教导幼儿如何与朋友相处、互相倾听,以及在朋友难过时,该如何安慰他/她。

认识老病死苦的生命伦理与合宜应对之道,该是日常教育的一部分,而非只有专业助人者才需要理解的事。

如果将与病人的相处和照护比喻成战事,一般人通常是被迫匆促上阵,不教而战。在战场上才来锻炼新兵,损伤该有多么惨重?战事中的存活率或创伤后遗症,可想而知。若能存活,才能成就“老兵”。

凡人皆有生老病死苦,我们通常都有关心喜爱的亲友,何况自己也是肉身之躯。离苦得乐是人生终极境界,陪伴病苦者得乐也是寻常的生活处境,两种关注都很重要,其实互不矛盾。

就像医疗人类学家凯博文写道:

照护会让我们疑惑,让我们焦虑……;有时候真的令人不愉快;……可能还会让我们陷入崩溃。然而,照护也是我们能做到的最重要的事情,它从照顾他人出发,但最终却是照顾到自己。借由付出照顾,我们会认识到原来自己也需要得到照顾。……也许在最后,这会将照护的灵魂转变为对灵魂的照护。

\*\*\*

疾病是一面放大镜,它让我们看见真正在意并希望珍惜把握的关系,平常可能看不清楚,此时,重要的存在却会被突显出来。

治疗期间,由于并非随时适合接受探望,我很期待亲友日日传来的好玩信息或影片让我解闷。看到有趣的,我便立刻转发给病友,只因明白病中之人都欣喜于有人惦记与分享。

第一次住院治疗期间,我和邻床一位罹患白血病必须接受骨髓移植的年轻人成为朋友,我最常传信息给她,以为打气,若获得回应,便能得知她是否安好,不需言语,只要看到“已读”也能令我安心。遗憾的是,某天起,我传的信息就再也没被读过了。至今我仍留着我出院时她写给我的谢卡,我诚心为这位乐观开朗的年轻女子向上天祈祷。

病中之人需要的不一定是见面探望,电话或简讯也都是很好的方式,可以让病人免于社交孤立的感觉。治疗期间,有些朋友持续以飞鸽或简讯传递挂念问候,偶尔接到这些朋友的不定时来讯,总令我深感温暖与开心。像是彭芳谷教授每周来电,虽然老人家都是简单问候,但高龄长辈的挂念,总让我倍感温馨与感激。阿琯隔阵子就寄来美丽的明信片,都是她出国搜集的纪念品,她把珍藏寄给我,就像是传递特别的问候与祝福,每回收到我都贴在墙上,就像看到老朋友的笑容一样。

有位远在他乡的学生无法来探望,却说出最令我动容的打气话:“老师,你的存在就是对我们最大的安慰。”

同事牛角话不多,甚少用言词表达关心,却随时准备趁天气好转和我的免疫力回升时,带我出门兜风。

好友点点平常忙得虽不会主动来电,但只要我传信息,几乎都是立刻回复,尽量不让我等待,甚至还细心留意我可能合用的衣物用品,购齐后一次远道送来。

哥一日照三餐甚至五顿的问候,在我半年的治疗期间未曾中断过。甚少做家事的他,还曾在我疲累躺下时,帮我擦地清洁。如此坚定的手足之情偶尔也让我热泪盈眶。

我的学弟阿雄,他的拍片工作非常忙碌,但在我心情最低落时,仍排开时间到医院陪我回诊,甚至当我逐渐恢复公开活动,更常驶过大半个台北盆地来接送我。无须言语,就给予我温暖的照护和拥抱。

老同学野兽辗转听闻我生病,很认真地当一回事,主动联系曾经有过化疗经验的远方老友小莲,因为他认为也许小莲能提供我必要的信息及协助。我非常感谢两位久违同学

的主动联系与关心。小莲在我治疗期间的远距离陪伴与经验分享,非常令我受用,甚至开启了我对宗教与生死的思考。那样的对话,似乎只有曾经身历其境的人才敢于、才有信心提出。

一位学界前辈是虔诚的天主教徒,经常远程传递好看的相关信息给我,当他知道我在思索人生与宗教的问题时,便主动帮我联系一名并不相识的神父。神父很忙碌,却仍常在电话的那一端问我,还寄了许多好看的书给我。当神父来电和我讨论读书心得时,我说第一本选读的是《神啊,你是来整我们的吗? 上主的美善 vs. 邪恶的苦难》(Where the Hell Is God?),神父笑了,说他也猜我会先挑这本来看。那是一本有趣的书,有故事和思辨,却不太说教,后来我也向其他正值困顿的朋友推荐此书。

在我开始治疗时,本来常住新竹的老师接下新的工作重任,原以为开学后就无法经常返回台北看望我。可是,老师一直挂念我,当他得知亟需高蛋白饮食的我不会烹煮肉食却未找到人帮煮晚饭时,便常在下班后赶回台北煮饭给我吃。当我在治疗后期心情陷入低落而变得被动后,老师更是尽量赶在太阳下山前到来,领我走出屋内晒太阳、散步。

老师的话一向不多,以前相处时,通常是我说话;当我变得沉默寡言后,他经常不知道要跟我聊什么。老师很有意识地不跟我谈工作上的事,要我完全放下、清静、休息,多是描绘他在捷运或高铁上看到的人事物,或把今日国际新闻说给我听,但都是三言两语就报告完毕。

有一次吃饭时我们大眼瞪小眼,闷到快发慌的我,居然请老师跟我说笑话。记得老师先抱歉地说了一句:“我不太会讲笑话欸。”然后想了好一会儿,终于说了一个他在福建的田野故事,内容涉及一对兄弟之间对话时不雅的闽南语口头禅,老师当时在一旁听得惊奇发噱,他们彼此高来高去却浑然不觉有何不妥。老师不好意思地边说边笑,一个笑话说得出现好几个顿号,记得当时那真把我逗乐了,每每想起那个画面还是会笑。

时至今日,我仍衷心感激这些亲友的照护,不论次数与长短。他们的照护并非基于期待我可能的反馈。事实上,绝大多数我都无法立即回报,只能放在心里,期待来日方长。他们就是单纯的诚心照顾,如同牛角所言:“只要你好起来。”也像老师说的:他不愿见到(他心中)像我这样优秀的年轻人倒下,他要把我拉起来。这些亲友,尤其是老师伸出的救援之手,真的把我从谷底拉了起来。

他们不一定知道自己的照护付出,就算只是简单的言行,都在我辛苦的治疗之路上产生了重要的正面作用。这些令我感激的亲友都是我生命中的贵人,老师对我的照顾更是恩同再造。

\*\*\*

生命诚可贵,是因为有这些美好。良好的照护形塑的关系,是神奇的疗愈。

我相信,如今母亲的心里一定也有着和我同样的感想,尽管她不曾用言语这样表达。她更加频繁的笑容、一日比一日开朗的生活举止,一定都是接受良好照护后的直觉化反应。情绪是照护结果的最佳反映。

母亲与家人都已走出不了解病况的黑暗隧道。在进入隧道之初,母亲常成为家人之间冲突与误解的原因。如今,因生病而糊涂的母亲变成非常可爱的老奶奶,是把家人团聚在一起的混凝土。当前,母亲和家人的关系与互动之美好,几乎可以称为家中的黄金时期,亲子关系如此,婆媳关系如此,家人之间的关系也如此。

我常想,这一切,如果不是因为母亲的病,如果不是家人共同度过了体悟生命的边界,不一定都能把重要的人事物看得那么清楚。

重病除了是面放大镜,也像罗马神话中的门神雅努斯(Janus),他常被描述成有前后两张面孔,回顾过去、展望未来。重病就和这位门神一样,一面是毁灭性的,把很多过去的延续都打断裂,另一面则是建设性的,代表着新的开始与转型。

断裂与疼痛的那一面终究会过去,但喜乐与重建的那一面却可能迎向新生的关系。而且,感激和愉悦的情绪将可能超越记忆的时空,长长久久。



刘绍华

人类学家，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博士，台湾“中央研究院”民族学研究所研究员。研究领域主要从疾病与医疗的角度切入，分析国家与全球卫生，理解当代社会变革的本质与倾向，以及身处变化中的个人生命经验与转型。著有《我的凉山兄弟》《柬埔寨旅人》等。

新书试读

来自新近好书的试读章节，由小鸟文学编辑部  
从近期出版物中挑选而来。祝阅读愉快。



题图为电视剧《无痛杀手》(2023)剧照

## 非虚构

# 本应帮人止痛，为何成为药物成瘾的始作俑者？

帕特里克·拉登·基夫 | 新书推荐

一个资本但又不仅仅关于资本的故事

在 21 世纪初期，奥施康定这种止痛药，在美国曾经掀起一股药物成瘾狂潮，其造成死亡人数高达 50 万人。而这场惨剧的始作俑者，却是一个慷慨而又神秘的家族——萨克勒家族。

这个几十年如一日地为文化、教育和科研等领域捐献了数十亿美元的家族，留名于各大著名文化机构——哈佛大学、大都会艺术博物馆、牛津大学、卢浮宫和北京大学，但谁能料想，这一切都是建立在麻醉品为他们带来的巨额利润基础上。

《疼痛帝国》的作者帕特里克·拉登·基夫在亲自走访 200 多名相关人士，查阅上万份相关资料的基础上，为读者讲述的这个关于奥施康定、毒品大流行和萨克勒家族的错综复杂的故事，揭露了资本对学术的操控、对权力的蚕食、对公共利益的蔑视，通过此书，读者既能得以一窥暴利行业的商业逻辑和慈善公益背后的资本逻辑，又能看到有良知的人们如何艰难地赢得这场“歌利亚之战”。

经格致出版社授权，我们节选了第十九章《新千年的巴勃罗·埃斯科瓦尔》分享给读者。



为了左右媒体叙事，尤德尔还从外面聘请了公关专家埃里克·德岑霍尔。德岑霍尔本来是政府工作人员，后来转行成为危机管理顾问，他擅长一门邪恶的技能——清除不利报道，“安插”有利报道。德岑霍尔处理客户委托的业务，是出了名的谨慎，他更喜欢在幕后运作，不留下自己插手的痕迹。但《商业周刊》有篇报道称，埃克森美孚公司也是他在这一时期的客户，他提供的服务包括策划了一场声援埃克森美孚公司的示威活动，在这场发生于国会山的活动中，数十名抗议者挥舞着标语，上面写着“别再满世界抱怨，资本主义棒极了”。

2001 年底，德岑霍尔写信告诉霍华德·尤德尔：“我们为普渡工作的头一个月非常忙碌。”他特别引以为豪的是在《纽约邮报》安排了一篇评论文章，指责“农村地区的药物成瘾者”和“自由派”炮制了一场关于奥施康定的虚假争议。文章刊出后，德岑霍尔把它发给了尤德尔、霍根和弗里德曼，并承诺自己可以扭转负面舆论。“报道开始出现反转了。”他写道。

德岑霍尔与精神病专家萨莉·萨特尔密切合作，此人是保守派智库美国企业研究所的研究员。萨特尔在《纽约时报》健康版上发表了一篇文章，她在文中指出，出于对阿片类药物的过分恐惧，美国医生不敢给病人开他们急需的止痛药。萨特尔写道：“当你对一个吃止痛药上瘾的人稍微有些了解，你通常会发现他是个前科累累的瘾君子，曾对药物、酒精、海洛因或可卡因上瘾过。”在这篇文章中，她引用了一个未透露姓名的同事的话，以及《分析毒理学杂志》上的一项研究，但有些事实她却只字不提：这个同事实际上在为普渡工作；这项研究是在普渡的资助下开展的，研究报告则由普渡员工撰写；她提前给普渡的一名管理人员看了她的文章（他很喜欢它）；普渡每年向她在美国企业研究所的研究团队捐赠 5 万美元。

德岑霍尔在提交给尤德尔的进度报告中还提到，他与“调查机构”在“项目的诉讼方面”一直有合作，其中尤以克罗尔公司最为密切。克罗尔公司是一家成立于 20 世纪 70 年代的私人调查公司，后来转型为一家给高端客户提供“企业情报”的国际性“影子公司”。当时，每个月都有十来起针对普渡的新官司，尤德尔坚信，避免诉讼的唯一办法就是对那些胆敢起诉的人重锤出击。他警告那些可能提起诉讼的有魄力的律师说，他会在“每一个司法管辖区的每一场官司”中与他们斗争到底。尤德尔解释说，原告律师起诉上市公司时，往往手握“筹码”，他们可以“不断施压”，激起媒体的愤怒，直到该公司的股价岌岌可危。因此，对上市公司来说私下调解通常比打官司要便宜得多——这就形成了化解官司的强大动力。但普渡不是上市公司，尤德尔洋洋得意地说。它的所有者是萨克勒家族，他们显然对自家产品的不利报道无动于衷。所以“他们没法用这个筹码来要挟我”。

普渡沾沾自喜于他们的斗争姿态，2003 年，尤德尔甚至发布了一篇题为“65 比 0”的新闻稿，炫耀普渡解决了多少起涉及阿片类药物致死和成瘾的案件，仿佛这是高中篮球队的比分。他说：“看到原告的诉讼请求被驳回，我们为这些案子全力辩护的决心就更加坚定了。”

克罗尔公司私下搜集的情报对尤德尔这样的反击大师非常有用。普渡曾找到玛莎·韦斯特的医院记录，用来抹黑她，如今，普渡又故技重施，对所有试图向普渡追责的人紧盯不放，不遗余力地挖掘他们的黑料。2002 年，前销售代表凯伦·怀特在佛罗里达州对公司提起诉讼，声称奥施康定的营销有违法之嫌，她因为不愿参与其中而遭到不当解雇。普渡断然否认了她的指控，反驳说怀特其实是因为没有达到“销售指标”才被解雇的。

事实上，销售指标正是怀特诉讼案的关键。当这个案子开庭时，怀特的律师告诉陪审团，她觉得有两名医生在经营黑药房，所以拒绝拜访他们，之后却被普渡打击报复。其中一名医生失去了联邦政府发放的开具麻醉药品的许可证，因为他办公室里有个护士非法开药。另一名医生被指控以药物来换取性交，为此被吊销了执照。但按照怀特的说法，当她向普渡的主管抱怨这两名医生时，主管说她应该继续拜访他们，因为他们可能会开出大剂量的奥施康定。怀特在诉状中坚称，她不敢按照公司的指令向医生们施压，要求他们开出“大剂量”的奥施康定。“我们必须去拜访……那些乱开麻醉药品的医生，”她在证词中解释道，因为销售代表正是靠着这些医生才得以跻身“销售冠军”的行列，“如果普渡的销售代表知道……哪个医生乱开处方，形同黑药房，他们往往不会把这些医生上报给普渡，因为他们从这些医生身上赚了很多钱。”怀特称，对普渡制药的上上下下来说，销量就是王道。“这家公司满脑子想的都是要赚尽最后一分钱，”她说，“把奥施康定卖出去，就是这么回事。”

在作证期间，怀特一度谈到她作为推销员的工作范围，但普渡的一名律师突然转换了话题。“女士，你是否服用过违禁药物？”

这个问题让怀特措手不及。“你问我做过什么？”她说。

“服用违禁药物。”

“没有。”怀特说。

“从来没有？”

“没有。”她重复道。

“有没有服用过‘飙’？”

“没有。”

“吃过被叫做‘神力’的东西吗？”

“没有，”她说，接着又补充道，“我不记得了。”

“所以你今天的证词是，你从来没有那样做过，”律师说，“对吗？”

怀特的语气变了。“我不记得自己做过没有。”她说。随后她把话讲清楚：“我上大学时可能服用过这种东西。”

普渡一直在调查凯伦·怀特的过去。“你是否记得自己上大学时服用过‘飙’，也就是人们所说的‘神力’？”律师问道。

“记得。”怀特说。

“‘飙’是违法的，对吗？”

“对。”

“你能给我描述一下吗？”律师追问道。“它是药片形式的？”

“我觉得它是药片形式的。”怀特说。

当案件进入庭审阶段时，怀特的律师提出动议，请求陪审团将怀特年少轻狂的证据排除在外，因为普渡可能会利用这些证据抹黑她，降低她作为证人的可信度。不过，抹黑原告正是霍华德·尤德尔的招牌战术。就像当年对待玛莎·韦斯特那样，普渡揪住了一个对公司行为合法性提出质疑的人，想方设法诽谤她，说她是个反复无常、极不可靠的瘾君子。

凯伦·怀特并没有向普渡狮子大开口。她要求普渡赔偿 13.8 万美元的工资和福利损失，这笔赔款比起普渡为了打赢官司而花费的律师费和调查费，不过是九牛一毛。法庭上，一群顶尖律师坐在普渡的桌子后面。再看对面的桌子，怀特身边只有孤零零的一个律师。“普渡的营销系统是腐败的，”怀特的律师对全体审判人员说，“它被金钱和贪欲腐蚀了，而这位女士拒绝与他们同流合污。”不过，陪审团最终还是站在了普渡这边。

“我当然是处于弱势的一方。”怀特后来说。但她并没有错。在诉讼中，她列出了自己在普渡工作期间注意到的 13 名医生。其中 11 人最终因为乱开处方而被逮捕或是吊销执照。

面对媒体的监督，萨克勒家族和普渡同样采取了强硬的态度。罗宾·霍根负责普渡的危机公关，他对那些跟他打交道的新闻工作者表现出明显的敌意，告诫记者们谨慎报道，因为“我们会密切监视他们”。2003 年 10 月，《奥兰多哨兵报》围绕奥施康定及其引发的不满，刊登了题为“奥施康定遭炮轰：止痛药导向死亡之路”的重磅系列报道。撰写系列报道的是《奥兰多哨兵报》调查记者多丽丝·布洛兹沃斯，她表示，过量服用奥施康定的人并不都像普渡声称的那样，是前科累累的“瘾君子”。她在报道中说，事实恰好相反，也有“意外成瘾”的情况，疼痛患者完全按照医嘱服药，但还是上瘾了。

布洛兹沃斯花了九个月的时间来撰写系列报道。她试图从调查人员那里获取他们所掌握的普渡营销计划，但普渡却把她告上了法庭，以内含“商业机密”为由，阻止这些资料的公布。《奥兰多哨兵报》的系列报道问世时，看似会对普渡造成重大打击。布洛兹沃斯将矛头对准了普渡辩护词中的核心主张——如果患者手中的奥施康定是医生开的，而且他们在服药时谨遵医嘱，这些患者就不会对奥施康定上瘾。她发现普渡的说法站不住脚。

不过，普渡安排危机管理顾问埃里克·德岑霍尔来处理这个案子。德岑霍尔为客户提供服务包括对一切不利报道进行仔细检查，因为就像他指出的那样，即便是知名记者，有时也会“百密一疏”。当德岑霍尔和他的同事着手调查时，他们发现了布洛兹沃斯报道中的漏洞。事实上，被她描述为“意外”上瘾的人当中，有两个人以前滥用过药物。德岑霍尔团队对布洛兹沃斯披露的过量服药致死的案例作了严密核查，核查结果表明，许多死者体内可能存在奥施康定，但通常也存在其他药物。既然如此，为什么单单挑出奥施康定来说事呢？尤德尔扬言要以诽谤罪起诉《奥兰多哨兵报》，并表示自己掌握着“铁板钉钉的实际恶意证据”。但普渡到底没有和《奥兰多哨兵报》对簿公堂，而是要求对方撤回布洛兹沃斯的系列报道，这一要求最终得到了满足。

当然，《奥兰多哨兵报》系列报道的主旨是真实的：疼痛患者确实对奥施康定上瘾，在某些情况下，他们死于服药过量。但布洛兹沃斯报道中的漏洞给普渡的公关人员提供了他们所需的弹药，他们对她穷追猛打。有个支持普渡的记者针对意外上瘾的“谎言”写了一篇文章，发表在《石板》杂志上，指责布洛兹沃斯散布恐慌情绪和不实信息，并声称现实中死于奥施康定的人“只有瘾君子”。结果，布洛兹沃斯从报社辞职了，最后彻底离开了新闻行业。普渡的一名发言人承认，公司对于有机会“澄清事实”感到满意。

普渡的另一个攻击对象是巴里·迈耶。迈耶继续为《纽约时报》撰写关于普渡的文章，他的报道对普渡来说是毁灭性的。2001 年底，他决定将他的报道扩充为一本书。有一回，他乘火车去斯坦福德，在普渡的办公室跟弗里德曼、戈登海姆和尤德尔会面。这三个人都很热情，给人留下了不拘礼节的第一印象。弗里德曼告诉他：“直到 2000 年初，我们才意识到问题的存在。”在谈到美施康定时，戈登海姆说：“我没听说过哪个瘾君子寻找这种药物来吸食。”迈耶对普渡正在开展的促销活动很感兴趣，该公司推出了“新人优惠券”，即患者可以在首月免费获取奥施康定。

“今时不同往日，”迈耶说，“这个国家过去也许不知道奥施康定会遭到滥用，但现在我们对此一清二楚。”迈耶想知道的是，既然普渡意识到了奥施康定的危险性，“你们为什么还要继续发放免费样品呢？”

“我们的职责是教医生如何治疗疼痛，如何使用我们的产品，”弗里德曼说，“我们觉得自己应该能够做到这一点。”

当迈耶开始筹备他的新书时，尤德尔给他写了一封措辞严厉的信，提议他在出版前将书稿提交给普渡，这样尤德尔就可以对其进行审查。迈耶拒绝接受尤德尔的提议，于是尤德尔写信给迈耶的出版商罗代尔出版社的社长，表达了他对作者偏见的严重担忧，并再次要求审查文本。“长期以来，我们两家公司——以及创立它们的家族——为了获得当之无愧的良好声誉不遗余力，”尤德尔写道，语气中带有一丝威胁，“如果这本书贸然出版，没有经过仔细审查以确保其准确性，那么两家公司都会受到严重损害。”

迈耶和其他记者在报道奥施康定时几乎从未提及萨克勒家族。但这并不意味着萨克勒家族就可以高枕无忧了。公众或许还没有把萨克勒的名字与奥施康定联系在一起，不过，当萨克勒家族的朋友和熟人读到负面新闻时，他们自然明白谁是涉事公司的所有者。2001 年，杰伊·韦特劳弗在读过一篇负面报道后，给他的朋友理查德·萨克勒发了邮件：“坚持住，理查德。记住你是个善良的好人。没有哪个记者或是律师能夺走你的美德。”

“多谢你的支持，”理查德在周六午夜过后回信说，“这种污蔑纯属扯淡。”

第二天，理查德继续回复道：“我想听听你的看法。我认为媒体出于恶意，将瘾君子塑造成受害者，而不是加害者。”认识理查德的人可能已经对他的抱怨有些厌倦了。但韦特劳弗愿意做一个富有同情心的倾听者。“他们是罪犯，”理查德接着说，“他们凭什么得到我们的同情呢？”

“我觉得大多数药物滥用者都不是邪恶的罪犯，”韦特劳弗回答说，“我相信，当你不那么生气的时候，也会有同样的看法。”韦特劳弗指出，这些人过得“比我们艰难得多”，“他们值得同情。”不过，他还是安慰理查德说：“你并没有做错什么。这是最重要的……深呼吸，理查德。你的仁爱之心会帮助你渡过这个难关。至少在末日审判中，它就是你所拥有的一切。”

理查德从不害怕跟人争论，尤其是这次，他想再争上一争。“我明白你是什么意思，但我们不同意你的观点，”他写道，“这些瘾君子明知道滥用药物是重罪，却偏要这么干。他们胡作非为，完全无视对社会、家庭和自己的责任。”

这时，韦特劳弗开始对他的朋友失去耐心了。他写道：“住在市中心贫民区和肯塔基州边远地区的穷人几乎从来没有机会考虑他们‘对社会的责任’。他们只能过一天算一天。”他们的“犯罪动机不是贪婪，也不是仇恨，而是一种极强的药瘾。我敢打赌，绝大多数药物滥用者都不想成为瘾君子。”

“别打这个赌。”理查德回复说。他明确表示，瘾君子想要上瘾。“他们一次又一次地让自己上瘾。”

理查德是个聪明人，他可以坚持自己的想法，无论是在情感还是认知方面，都不受现实的影响。2002 年，另一个当麻醉师的朋友联系了他。这个人告诉理查德，在他女儿就读的私立贵族学校，奥施康定被认为是“一种人造毒品，有点儿像海洛因”。麻醉师说：“我不得不说，你有望成为新千年的巴勃罗·埃斯科瓦尔。”

萨克勒家族的人普遍觉得他们无需道歉和赔偿，理查德并不是个例。这个家族的两大阵营——A 级股东和 B 级股东——往往需要费一番工夫才能达成共识。但他们一致认为奥施康定滥用与萨克勒家族无关。试图撇清关系的不只是萨克勒家族，普渡上上下下的员工也都忙着推卸责任。罗伯特·里德是普渡的高管，曾负责过奥施康定的新药报批事宜。有一回，他给公司高层的一些管理人员发了封电子邮件，向他们讲述了银山医院的情况。这是康涅狄格州的一家精神病院，离普渡总部很近，专门治疗药物滥用综合征。里德建议，也许普渡的某个人应该加入银山医院董事会。这将是一次巧妙的公关行动，同时也传达出了一个信号：尽管普渡可能会打击那些成瘾者，但这并不意味着萨克勒家族或普渡毫无同情心。感兴趣吗？里德问大家。

“虽然我觉得这是个很棒的机构，但我现在的工作已经安排得够满了。”迈克尔·弗里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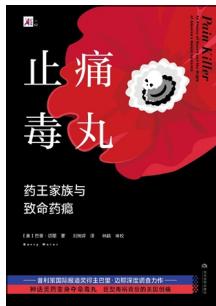
曼答道。

随后霍华德·尤德尔给出了一模一样的回复：“虽然我觉得这是个很棒的机构，但我现在的工作已经安排得够满了。”

“同上。”保罗·戈登海姆写道。

里德发现无人响应，便直接向凯西·萨克勒求助。“凯西，你想让普渡的人加入银山医院董事会吗？”

“罗伯特，”她回答说，“只要对咱们公司有帮助就行。”



2003年秋天，巴里·迈耶出版了他的新书《止痛毒丸：“神奇”药物的成瘾与死亡之路》。这是一部开创性的新闻作品，对奥施康定的影响和普渡的罪行进行了无情评判。“就麻醉的功效而言，奥施康定无异于核武器。”迈耶写道。普渡的高管们“似乎不能或不愿采取有效行动，尽管环境或负面舆论迫使他们采取行动，但他们拖了很久才出手”。只是到了那时，已经“太晚了”，他写道。这种药物已经引发了“一场灾难”。

当迈耶的书出版时，他供职的报纸正面临着创刊152年以来最大的挑战之一。纽约时报社发现，有个名叫杰森·布莱尔的年轻记者一直在偷偷打破新闻行业的所有规则：布莱尔杜撰人物，所引用的当事人原话也是编造的，明明没去过的地方，却谎称自己去过，而且抄袭别人的作品。这对《纽约时报》来说是个特大丑闻，引发了许多关于新闻机构的反思。对不同的企业文化进行比较，不失为一项有趣的研究。普渡制药绝不会承认错误，更不会真心忏悔，请求宽恕。然而，纽约时报社既没有掩盖布莱尔的违规操作，也没有将其简单地看作一个坏蛋犯下的孤立罪行，相反，该报一时陷入了对自身存在的焦虑，其核心价值遭到了动摇。该报的两名总编辞职了。有人把整个过程比作“踩到地雷”。

突然间，受人尊敬的《纽约时报》变成了不可靠的漫画、深夜电视节目的笑柄。在接下来的反思阶段，纽约时报社组织了一个由25名记者组成的委员会，就报纸如何杜绝此类事件进行了探讨，并列出了建议清单。其中一项建议是，出版商应该任命一名监察员，充当行业内部的裁判，对记者和编辑的狂热冲动予以把关。2003年10月，该报任命了首位“公共编辑”——一个名叫丹尼尔·奥克伦特的资深记者。

奥克伦特不是报社记者。他来自杂志界。但正如他所说，他的工作将是严格审查《纽约时报》的报道，弄清楚“呈现给读者的是不是真相”。

巴里·迈耶专心写作《止痛毒丸》的那几个月，没有在报纸上发表过关于奥施康定的文章。但在2003年秋天，电台主持人拉什·林堡承认，医生给他开了奥施康定和其他止痛药治疗背部疼痛，他却对这些药物上了瘾，迈耶就根据他的经历写了一篇文章。随着新书的完稿和出版，迈耶似乎又恢复了正常的工作节奏。

迈耶的回归让普渡的领导层忧心忡忡。多年来，他们一直在抱怨迈耶以及他对奥施康定的报道，声称迈耶用“耸人听闻、歪曲事实的报道”抹黑普渡。2001年，尤德尔带着一帮普渡的管理人员来到纽约时报编辑部，试图越过迈耶，直接向他的上司投诉。但令尤德尔大为沮丧的是，编辑们都支持自家记者。就像尤德尔的同事抱怨的那样，这家报社“根本不理会我们”。迈耶并没有停止对奥施康定的报道。

如今，纽约时报社实力大损，奥克伦特正琢磨着如何烧好新官上任后的三把火，让尤德尔和他的作战委员会瞅准了时机。他们直接找到奥克伦特，约他见面，挤进他在15楼的小办公室。他们提意见说，不该允许巴里·迈耶继续为报纸撰写关于普渡或奥施康定的文章，因为他已经出版了相同主题的著作，二者之间存在利益冲突。尤德尔指出，迈耶在报纸上发表的任何东西其实都是在为他的新书打广告。

普渡方面提出的理由不过是个似是而非的借口——当你找不到其他理由时，就会提出这种借口。但可以确信的是，如果普渡能够迫使迈耶停止报道，该公司的处境也许会好得多。纽约时报社并没有什么大型企业团队负责奥施康定的报道。迈耶自己就是一个团队。如果普渡能把迈耶摆平，他们就会拥有更大的自由度。

尤德尔回断言《止痛毒丸》的出版意味着性质恶劣的利益冲突。他引用了纽约时报社的明文规定——“员工绝不能让人觉得他们可能会通过新闻事件的影响获取经济利益”，并要求禁止迈耶继续报道奥施康定。和普渡的人会面后，奥克伦特发给迈耶一张清单，上面列出了他的报道存在的问题。迈耶火冒三丈。在他看来，事情是明摆着的：经历过布莱尔的丑闻后，纽约时报社变得胆小怕事，普渡便充分利用这个时机来牟取私利。

迈耶收到奥克伦特的问题清单后不久，纽约时报社总编阿尔西格尔把他叫到了办公室，讨论撰写关于止痛药的报道对他来说是否合适，毕竟他还有一本相同主题的著作正在销售。当然合适，迈耶大声说。他是这方面的专家！他对这个新闻事件了如指掌！他有专业知识！他有信源！他在那篇写拉什·林堡的文章中提到自己的书，并不是平白无故的。一直写到第11段，他才提到普渡。“这太让人沮丧了，”迈耶多年后回忆说，“我觉得这不公平。”

奥克伦特发表了题为“哪怕坚持原则，你仍有可能受伤”的专栏文章，他在文中表示，他发现迈耶的报道大体上是准确和公正的，但他认为其中确实存在利益冲突。奥克伦特承认，有些人可能会认为普渡“小题大做”。但他总结道，“一旦涉及冲突，哪怕只有最轻微的迹象，也要设法消除”，如此一来，报纸的“声誉”将得到最好的维护。

“你不能写阿片类药物。”阿尔·西格尔告诉迈耶。纽约时报社禁止他继续报道止痛药。很久以后，奥克伦特指出，在撰写有关普渡的专栏文章时，他刚入职纽约时报社，还是个经验不足的新手。他承认，从那以后他经常在想，“我是不是犯了个错误”。奥克伦特说，迈耶当时勃然大怒——“气疯了”。在迈耶看来，奥克伦特被“玩弄于股掌之间”，纽约时报社的领导层则因为担心报纸遭遇诚信危机而陷入瘫痪，任由自己被恶棍公司胁迫。普渡制药存在严重的不当行为，迈耶几乎可以肯定这种不当行为就是犯罪。两年来，尤德尔和萨克勒家族的其他亲信一直试图打压他，阻止他揭露普渡的所作所为。现在看来，他们总算成功了。



帕特里克·拉登·基夫

《纽约客》杂志的专栏作家，其撰写的《什么也别说》曾荣登《纽约时报》《华盛顿邮报》《芝加哥论坛报》和《华尔街日报》的2019年度非虚构类图书榜，被《娱乐周刊》评为“近十年来十佳图书”，并获得2019年度美国国家书评人协会奖。他的作品还获得过古根海姆奖、国家杂志奖和奥威尔奖。他还经营着一个名为“变革之风”的播客节目，在2020年《卫报》的排名中名列榜首。

#### 新书试读

来自新近好书的试读章节，由小鸟文学编辑部从近期出版物中挑选而来。祝阅读愉快。



文内图片由出版方提供；题图为科塔萨尔与邓洛普

## 小熊对狼说的话，一切话语都永远定格

高速公路就是我，你，我们，你的舌头寻找我的舌头并放松下来，蜗牛与蜗牛交缠，你的舌头滑向无限之地，在嘴的尽头延长，破碎时间的碎片，长长的热沥青带，此时我也是一只蜗牛；你伸出舌头而我是悬崖，我吞下它，伴随着无尽的灼热，你的面颊融入我的，你的头发，你惊讶眨动的双眼，它们还以为自己在外面，当内心火热时睁开眼，它们会挠痒痒，你滑向手肘，我吞咽着你的臀部不停地吻你，第一个吻。潮湿的黑暗微微张开，为你腾出空间，在你的腹部，一千只蜗牛在螺旋中严肃地舞蹈，我也是另一个蜗牛壳。

我们总是拥抱到无法呼吸，去寻找更远的呼吸，你被淹没，但并未从你所在之处消失，你的双眼直视着我，目光成了两个、上千个倒影，你渴望我。我像寻找珍珠的渔夫一般，舌头，这条被俘获、伸展、拖着我们永远无法解脱的渴望的舌头，整个身体越来越消瘦，滑向更深更昏暗的地方，弥散在你暴烈的温柔之中。我们还在一直一直寻找，如何不掉入它的、你的、我的舌头之外，如何不跌出一路通往那里的眩晕，永远相同的道路，但有缓慢的、令人眼花缭乱的路径。

一束转瞬即逝的光，一辆卡车，一声喇叭；我们让它们全部窒息，相互封住的嘴，外界在另一侧崩坏。我们在只有潮湿、热量和闪电穿过的夜晚创造了空气，我仍然吞下你的手肘，另一侧臀部，你的性器在我体内温暖而充满活力地滑动，我也占有了我，你会进入你自己，因为在拒绝返回表面之前，无论时间刚好来得及或者来不及，窒息已经毫无疑问地开始了，旅行中的静止已经将我们淹没在这蜂蜜和肉桂的气味中，风穿过法夫纳在夜里翻滚，小睡，一千个手势到达我们身边。我们又成了蜗牛，躲在无翼鸟背上，会有到达的那一天吗？当我们的身体交叠，在舌头下游走，当你成为我胸前扑打的鸟儿，成为我看不见的那侧皮肤上盘绕着我胸部的蛇，没有一个细胞逃脱，从那一刻起自内部被包围。黑暗中点缀着绿色的星星，必须，必须返回，像溺水者一样呼吸但我们已经窒息了，在两张嘴被紧扼的暴力撕裂开之前，身体永远无法恢复。呼吸，但是那样微弱；你再次加入，要拿那些颠倒的身体怎么办呢？它们像手套一样翻转，从握住它们的手上滑落；你加入，就像海豚在海里，我们无视海底与水流，滑动着，面对彼此，融入、拥抱彼此，就像破浪的鲨鱼撕开某种现实所剩之物，寻找这种节奏之外的东西。

从旅行的开始，所有旅行的开始，计算由一座高峰到另一座的不合理时间。

在筋疲力尽的潮湿停歇中，在安宁中，在毛茸茸的蜗牛中，你少年的面容在最后的疲惫中闪耀，倦怠的手已被下一次无法预知的退潮推动，描绘我的身体，胯部，乳房，臀部，还有这幅画，是你送给我的礼物，你曾送给我独一无二的礼物，我可以完全地抛弃你，甚至抛弃带我们摆动的梦之湖。

你不止一次用破碎的声音对我说：“你那么年轻。”你是对的，但是什么幕布蒙蔽了你的双眼，你没看见我和自己的内心度过的这么多年，它的年龄要大过……

“别跟我谈时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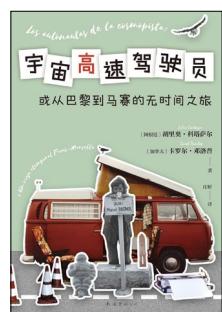
但是没错，我们得谈谈，我们不是孩子了。我们存在，我们存在于时间之中，就像存在于这趟旅途之中：在它之内。你没有看到不存在四个、三个、两个时间吗？我曾多少次掉进黑暗的深渊，以至于学会了在黑暗中行走。还曾一千次、一万次砍掉九头蛇的头，却并未自欺欺人地认为能够阻止它们继续邪恶地生长。那么多年里，无论是否相信某种新生是为了让死亡沐浴在阳光下，而其他的新生是为了让死亡染上暴力的色彩，我们还是认出了彼此。

此刻，伟大的海狮，我们在平静清澈的水面划船，只为那些被恐怖、折磨和战争搅动的等待我们的海岸景色而心意难平。但我们的波浪只会形成巨大的波动，伴随我们疯狂的节奏呼吸。光明，和将要把我们推向尽头、永远推向尽头和更远处的黑暗的激情。我在那里紧紧地拥抱你，仿佛我们的肌肤将因紧贴而溶解，让我们成为隐形的存在。

你的声音是那么清晰，可当悲伤的幕布来临，当旅行一开始你就又一次质疑它的结局时，我要如何沉默，又该如何开口？悲伤来得恰好，我的爱意也恰好在远处成倍增加。就算黑暗再强大，也不可能让我回头。

你，还是你。

努力地在大片黑水中游泳，就能学会在黑暗中漂浮。最糟糕的黑暗之中的浮标。屈辱的晚年、卫生的噩梦已被排除，所剩之物不是为了现在，也没有更多可能的孤独。难道你还不明白，一年前你没有死去，这是生命何等的厚礼？到此为止。出发。



如果你愿意用孩子般的双眼去探索，那么未来的时间仍充满未知。

甜蜜的困惑，大地在阳光下颤抖，而你在我身体周围震颤。

就算到马赛我们也不会离开高速公路，亲爱的，到哪儿都不会。除了螺旋，没有其他返程路线。



在拉库库尔德，云雀的奇妙站点。

## 云雀的站点

两只云雀梦幻般地  
飞向迷雾。

——约瑟夫·冯·艾兴多夫《余晖》

站点很无聊吗？对我们来说，它们越来越精彩，我们感受着、体验着，它们就像一个个小宇宙，我们的红色驾驶舱每天像未知小行星一样降落其中。比如位于蒙特利马尔的拉库库尔德小宇宙本身就是一个小国家，是从巴黎出发后我们发现的第一个云雀之国。

当然，云雀是我们猜的，我们对鸟类并不熟悉。小熊对此持保留意见，但我出于真诚的理由对此非常确信。正如您将看到的，诗歌，尤其是音乐，还有童年记忆即将发挥作用。当然，我在郊区度过的童年时光里并没有云雀，但有家人说过，云雀总在飞翔时歌唱，几乎没有鸟儿这样，这个特点让我在想象中赋予了它特殊的威望。另外《少儿宝藏》里也有很多关于云雀的知识，那是我取之不尽的现实储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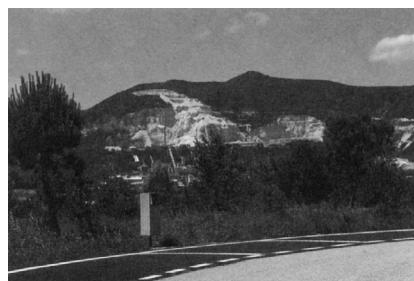
在拉库库尔德，旅客只看到一片空旷，而云雀已经将这里变成了它们的天堂。



高速公路上挤满了旅客，但对快乐的探险家来说，拉库库尔德空旷而孤独。



“条顿骑士团”，总有一种威胁的意味，对于那些感觉自己……



.....被奇怪的力量监视着的人来说。一位孤独的“条顿骑士”守护着山岭

我们在巨大、空旷的拉库库尔德站点扎下营地，法夫纳上方是一整片明澈的天空，从下午开始，天空中到处都是上下飞舞着歌唱的鸟儿，歌唱着飞到最高处，歌唱时美丽的翅膀迎风颤抖着，歌唱着飞下来，栖息在树上时仍在歌唱。它们一直在歌唱，当然是云雀，虽然事实上也许并不是，但当我愉快地听着云雀在太空中歌唱的时候，这重要吗？

云雀的问题总是引起争论，虽然我手边并没有牛津版的莎士比亚（法夫纳的空间有限，小可怜），但我记得维罗纳恋人的爱情之夜，还有罗密欧和朱丽叶关于窗边歌唱的鸟儿是夜莺还是云雀的讨论。可以确定，拉库库尔德没有夜莺，所以在我们周围飞翔、歌唱的就是云雀；这个结论似乎相当有莎士比亚的风格。

我仰面躺在“花样恐怖”中，跟随一只云雀飞高。它是一只快乐的小棕鸟，绕着大圈越飞越高，一边歌唱一边向上，它的歌声饱满，虽然变化不大但色彩丰富，它似乎诞生于无尽的喜悦，仿佛除了不间断地歌唱，除了为自己的生命庆祝，它没有其他存在的理由，没有理由或本体，没有地狱或天堂。它几乎成了空中的一个点，迎着风一动不动，翅膀在透明的悬浮液中颤抖，歌声从中萌芽，然后令人惊艳地下降到此处。它小小的喉咙，脆弱的小身体，如何成为百米高空中音乐的源泉，然后如此清晰地栖身于我如此难以置信的耳中？

在接触的那一刻，完美共鸣，有关沃恩·威廉姆斯的交响诗《云雀高飞》的回忆袭来。我在这里听不到它，原因和我没法在这里读莎士比亚一样，我无法将乐曲的旋律与此刻从天而降的旋律相比照，但曲名已经证明云雀会在向上飞时歌唱，由自己的歌声带上天空，我认为没有任何一种鸟像它一样。

然后它甜蜜地、有些不情愿地飞下来，停在一根树枝上，卡罗尔在它身上看到了凤凰的影子，它的身体不可思议地向下弯曲，空中的海马，翅膀扇动得越来越慢，直到变成一只平平无奇的枝头小鸟，一只看起来像麻雀或椋鸟的小东西。啊，我多希望雪莱能在这里（《致云雀》不就是他的手笔吗？），不过前面说过了，在拉库库尔德站点我没有一个英国朋友。无所谓，它们就是云雀，这是高速公路上唯一有云雀的站点。它们之所以选择这个站点，是因为这里天空又高又远，也许还因为有一天我们会为它们庆祝，云雀不过是无休止的庆典，我们也是如此，只是以更神秘的方法庆祝，我们也试图让词语变成音乐，我们也想成为云雀。

## 关于梦在高速公路上的变化

我们无意将修普诺斯所掌控之事也纳入调查中，我们认为两个人白天对各站点的调查已经足够。或许正因如此，我们一开始没有注意到这些变化：我们习惯于一觉醒来就互相讲述梦境，或者在某个意想不到的时刻说出梦境的闪回，我们到高速公路上之后依旧这样，并未注意到任何明显的变化。但离开巴黎四五天后，我们发现了最初的变化，并且变化日益明显。

如果必须总结这些梦与静止时的梦 \* 有什么区别，我们会说它们描绘事物和事件的精度提高了，图像的“立体性”。我们的梦越来越不像伦勃朗，越来越像凡·艾克或罗杰·范德韦登。当我们相互讲述梦境时，无论是讲背景还是故事，都能说出让人惊奇的精准细节。当然，对此我们无法核查，但这几天我和卡罗尔的描述都具有细腻的质地、精致的颗粒、鲜明的色彩、完整且精确的形状。当我们梦见曾经了解或现在认识的某个人时，他的每一个特征、手势和语句都逼真得惊人。如果他是由梦创造的，那么可以说这样的创造具有立体的轮廓和特征。

我们想知道为什么梦境的改变如此无法忍受。在诸多假设中，有必要考虑新的刺激，该假设认为共鸣器官本身无意识，因为感官接收到了新的信息，所以共鸣器官内发



探险家怀疑垃圾桶里藏着麦克风。  
他们一直在监视我们！

生了深度变化。也许坐飞机旅行或者在酒店过夜也会让梦的质量发生变化，但由于这些都是短暂、独立的经历，很少有人意识到这一点。另一方面，我们在一个仅有部分被修改的刺激系统中度过了三个星期（根据站点的地形和性质，具体刺激量可能略有浮动），并且通过每晚重复，最终直接催生了一种梦境，我们不得不对此投入注意力并进行观察。

我所说的刺激系统还包括其他难以验证的东西：卡车和它们的灯光、噪音，它们永远在高速公路上行驶这一点，还有它们在法夫纳庇护我们睡眠的站点到达、停车又重新出发这一点。苍白的读者知道，我们在高速公路上待的时间很短，可一旦进入停车场，我们就会开始看到、听到和我们一样来小憩或是过夜的卡车。我们已经说过，一些站点的停车场会在晚间变成转瞬即逝、奇异迷人的城市，有十到二十辆重型卡车，更不用说像法夫纳这样的拖车或露营车，那里混合了来自各个国家的车牌、语言、气味和声音。我们关上法夫纳的舱门，它的帆布顶篷映出移动的前灯，就像无尽的魔法灯笼游戏，而机械噪音仿佛是高速公路持续轰鸣中最清晰的一种。这种从未聚集在我们身边却引发了梦之剧场变化的刺激是什么？为何这种我们日常生活中前所未有的刺激会如此精细地勾勒出梦境的轮廓，而不是让它们更为模糊呢？

这些问题没有答案，但我们也喜欢上了不同的梦境，我们越来越喜欢它，即使梦中一切正常物体都以恐怖的形式出现。不用说，一旦回到巴黎，我们就会去关注在熟悉的家庭氛围中发生的事情；如果这种梦境像我们担心的那样一去不返，我们将不得不考虑更多样化的新探险。毕竟世界上到处都是站点，或许诸多梦境就在那里等待我们，值得我们踏上旅程，之后永不回头。



#### 胡里奥·科塔萨尔

阿根廷著名作家，拉丁美洲文学爆炸代表人物。著有长篇小说《跳房子》，短篇小说集《动物寓言集》《游戏的终结》《万火归一》《我们如此热爱格伦达》等。科塔萨尔被认为是 20 世纪最具实验精神的伟大作家。

#### 卡罗尔·邓洛普

加拿大作家、摄影师、社会活动家，1946 年出生于美国，后移居加拿大。1977 年结识科塔萨尔，1981 年两人结婚。1982 年在巴黎病逝。

#### 新书试读

来自新近好书的试读章节，由小鸟文学编辑部从近期出版物中挑选而来。祝阅读愉快。



小鸟文学出品  
卷四十四，2024.8  
可以留档  
请勿商用  
有事联系  
[info@aves.art](mailto:info@aves.art)